

湖南

HUNAN WENSHI

文史

42

199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42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2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丁江 高原

责任编辑/彭德才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印数12,000

版次/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

定价/2.5元

湖南文史

1991 2

目 录

(总第42辑)

伟 人 风 范

忆父亲毛宇居与毛泽东的情谊.....毛远涛(1)

回忆高文华二三事.....李 肇(7)

革 命 史 话

回忆新四军驻湘湘通讯处.....周 里(12)

解放前夕攸县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攸县人民警卫大队的建立和发展贺湘楚(21)

回忆南岳黎明前的地下斗争欧阳镇 旷 炯 董建华(29)

我在解放前的一段革命经历.....谭一天(41)

告别故土 奔赴新区

——数千冀南干部南下湖南纪实赵 畅(46)

2A38/65

七十年湖南统战工作述略.....何醒初 唐伯国 (60)

烽火忆往

抗战时期印緬战场上的一支中国坦克部队孙志明 (80)

从湖南出发——兰姆伽改编——列多集结——进入野人山
——鏖战瓦拉那——强度南三河——沙地亚整训——“第
二条战线”——乘胜追击——战车兵节

记宁乡杜家山抗日阵亡将士.....张祖寿 (91)

湘籍民国将领

李明灏将军与黄埔军校二分校.....刘冬松 (94)

国际军事情报专家杨宣诚.....黄曾甫 (99)

我所知道的肖作霖将军.....陆印泉 (106)

中国文化学会——创办内外杂志——北战线《阵中日报》
——办经纬出版社——南京的《大通报》——追随程潜
起义

回忆陈采夫将军.....肖汝贤 (124)

湘籍文化人

我的父亲钱歌川钱宁娜 (129)

革命回忆录

“归去苍凉”

- 康濯逝世前后 张 杨(132)
- 台湾名教授许君武先生传略 许谔博(140)
- 赵启霖传略 易孟醇(144)

军 事 史 料

- 蒋介石长沙阅兵与唐生智反蒋 张季任(149)
- 讨赵湘军第六军战斗见闻 田士清(153)
- 回忆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时期 高中凯(159)

文 坛 旧 事

顶风斗雨向太阳

- 记劲草社和《孩子的世界》 牧 牧 郁青 若文(167)

往 事 钩 沉

- 回忆留俄始末(1926—1928) 肖 范(180)

启程赴苏——旅途花絮——进入中大——优厚待遇——多
边型的学习——党派闹中大——恶浪荡苏联——群雁汉关
飞——傲骨斗严寒

徐君虎智斩祸苗译式文(192)

五十年前湘西历险记译天萍(199)

建 国 后 史 料

回忆我的右派生涯周守忠(206)

打入另册——羞归故里——风雪边城——归去来兮

忆父亲毛宇居与毛泽东的情谊

毛 远 涛*

1959年6日，毛泽东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来到毛震公祠，对里面过去放祖宗牌位的地方鞠了三个躬，而后对身边的一位银须飘拂的老人说：“1927年元月，你们在这里集会欢迎我。”那位老人诧异地道：“主席，你还记得？”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你当时还在欢迎会上致词哩。”

“是的。”老人抚着银须，琅琅背诵起来：“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毛泽东听着，爽朗地笑了起来，那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情景仿佛浮现在眼前。他转身对陪同他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介绍说：“我1927年元月在韶山考察农民运动，他们曾在这里欢迎我作报告。”老人连忙朝罗瑞卿点了点头，说：“主席的记心真好！”

这位老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堂兄及幼年时的塾师，我的父亲毛宇居先生。

父亲派名毛泽启，号宇居，亦作禹居、蕊珠，别号“守一子”，又号“韶麓散人”。家住湘潭县韶山冲菜家塘（今属韶山市）。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卒于1964年9月29日。他比毛泽东长13岁。他的曾祖父毛南方（我的高祖父），与毛主席的曾祖父毛四端系嫡堂兄弟；我的祖父毛福生与主席的父亲毛顺生系五服内堂兄弟。我们家与主席一家，来往密切。

*毛远涛，湖南韶山人，毛宇居之子，现任株洲南方动力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经济师。

父亲过去攻读古书较多，善于写作，人称他为“韶山一支笔”。解放前，他基本上以教私塾为主要生活来源，因而与当地交往较多，深受大家的尊敬，也曾与少数上层人士有往来，这也完全是为了应付门面。1940~1941年，他曾主持修纂了《中湘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并为族谱书写了序言，目前该谱存放在旧居陈列馆。为了生活和出路，他曾奔走他乡，并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自己生活清贫、忧心万千的情绪。诗曰：“马牛生活我生忙，漫走川滇觅稻粱。鹤守残梅撑傲骨，雁飞中泽罄中囊。关怀群侪多摩擦，话到和平费考量。世事沧桑从变化，祇愁书味不留香。”他为人耿直，通情达理。他在1941年重阳节，给侄儿毛远翔的一个笔筒上题词道：“外象园，内象空，园而且空，是之谓玄，同竹君子能如此，宜其明体达用而无所不通，吾今以此为师兮冀，朝夕瞻仰以磨砢，又岂得小之日笔筒。”

由于他和毛主席有着亲密关系，所以他对中国革命斗争十分关切。抗日战争时，我就看到他从地下工作者手中借阅过寒主席的《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1945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到湘潭时，父亲曾多次向南下的堂侄毛远翥谈论时局战争，并询及延安和毛主席的情况。

解放后，父亲可以说倾注全力，向来韶山的客人介绍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和生活，称赞他的才华和反叛精神。1950年他曾系统地向当时的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锐介绍了毛主席少年时的情况。尽管他在认识上不能完全摆脱旧的观念，但对来访的中外客人总是感到欣慰、高兴，并予热情接待。他在72岁高龄时，特地写了一首诗：“南岸茅庐主席家，风光尤是朴无华，往来过客人言籍，此地频开革命花。”“有询先世事如何，木石居今去壤歌，积厚流光越时代，发扬光大起山河。”可见，父亲对主席的爱戴之深。

父亲和毛主席之间，不仅有着师生情感，更有亲如手足的兄弟之谊。由于他在韶山冲属于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主要是古书、诗词等），毛主席幼年曾就读于他门下。毛泽东幼年时渴望求知，酷爱“杂书”，父亲故意点一些深奥的古书，如《诗经》、《春秋》、《左传》之类，让毛泽东背读，他都能应付裕如。因此，尽管他就读时间不长，父亲就十分钦佩主席的才华。不仅如此，主席还能以经书作武器，对一些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据说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老人，经常责骂他“不孝”，他针对父亲粗暴和刻薄的特点，对父亲说“父慈子孝”是经书上讲了的，可见“父慈”在先，“子孝”在后，哪有父不慈而子孝呢？弄得他父亲无言对答。1910年毛泽东要求去湘乡东山学堂继续读书，受到他父亲毛顺生的阻止，我父亲曾极力在顺生老人面前劝他送子读书，并详细介绍了毛泽东读书的天资非同凡俗，终于获得了顺生老人的同意。同年秋天，毛泽东便去了东山学堂就读。

父亲冒着危险，珍藏了有关毛主席的不少文物。较突出的有几点：一是1919年主席的母亲病逝时，主席沉痛地写了《祭母文》及挽联，交给我父亲保存。父亲历经艰险，妥善保存，直到解放时才交给人民政府。二是大革命时，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来挖毛主席家祖坟，企图挖断他家的“龙脉”。我父亲知道后，先是组织家人将毛主席家的祖坟铺平，同时栽了两棵森树，以作标志。国民党抓到我父亲，逼他带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便将他们带到滴水洞口边，往左边一转，上了龙头山，结果挖了一座地主家的祖坟。三是收藏了1938年5月26日毛主席给我父亲的复信。信云：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到。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

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

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警的搜查，这些手稿，父亲都是放在墙壁缝隙中保存下来的。此外，他经常照看毛主席旧居，还常对毛楚雄及周外婆（毛泽覃的岳母）给以照料，确是按照主席的嘱咐，“看成一家人”。毛楚雄在1944年前后，也在我父亲门下就读。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他便常向有些人介绍：“这是当代伟人毛泽东的侄儿。”更为可贵的是，父亲与毛国翘等人主持修纂《毛氏族谱》时，曾在“毛泽东”的条目下写了“闾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在“毛泽民”的条目下写了“琳珎齐名”四个字。虽然寥寥数字，但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光彩。

解放后，1949年10月他给毛主席写信，不久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主席在信中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关心和问好，信云：

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国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韶山，一下车就向身边的人说：要把我大哥接来。当时也把我母亲和妹妹接到了宾馆，受到了主席的亲切接见，并照了相。我父亲还陪主席视察了家乡

的田园生产，一路上谈笑风生。主席在游泳时，见他站在岸上，便问：“你怎么不下水？”他答：“主席，我老了，不能游。”主席风趣地说：“你坚持锻炼，游一次，起码多活20年。”逗得大家都笑了。晚上，主席设便宴招待乡亲们。大家坐定后，他端起酒杯，向我父亲敬酒，我父亲连忙起身相迎，感谢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主席当即回答：“敬老尊贤，应当应当。”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深挚的感情。

解放后，我父亲曾三次到北京。

第一次是1950年9月，是由主席派人直接送信到我家的。他们阔别几十年后，相见十分亲切，主席握着他的手说：“来客啦，来客啦，快请坐。”并向他询问了家乡的情况。当天在主席家吃饭时，主席将儿子岸英、李敏、李纳等兄妹叫到跟前，向父亲一一作了介绍，并对他们说：“这是从韶山来的，是你们的伯父。”这次主席还安排我父亲和他参加了国庆一周年观礼和宴会，陪他参观了名胜古迹，又派员陪我父亲乘飞机观看了古长城。因父亲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主席又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看他牙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

第二次是1952年冬，韶山小学要扩建，父亲受家乡委托，专程进京，请主席题写校名。到京后，他汇报了情况。主席十分高兴地说：“这好，现在需要人才，教育要发展。你是教书出身的，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当提到写校名时，主席说：“写什么名字好？”父亲说：“我们只是办小学，就写韶山小学吧！”主席想了想说：“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一次不就写全了？”随即写了几张“韶山学校”校名，供家乡人民选择。这次父亲到京曾多次在主席家吃饭。有次吃完饭，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晚我们回韶山，看看你自己吧！”实际是在主席家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解放了的中国》。这

部电影是在苏联帮助下拍的我国第一部彩色片。该片的部分镜头是在韶山拍的外景，多处有父亲镜头。

第三次是1958年8月。时当湘潭大学正在筹办当中，父亲受县委之托，又一次赴京请主席题写校名。抵京后，开始住在前门的“惠中宾馆”。主席知道后，即派人接他安排在和平宾馆宿食。他详细向主席汇报了办校的筹备情况和来意，主席询问了筹备及办学的很多问题后，说：“近年来许多人请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读书的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给你们写了，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吗？”父亲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东山学校一张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没有意见了吗？！”主席笑了笑，就答应了。过了几天，他秘书将主席亲笔题写的两纸校名及一封便函送到和平宾馆，交我父亲带回。信函云：

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亦烦转致。

毛 泽 东

九月十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日理万机，然而他对他们的师长和家乡人民仍然关怀备至，情意深长。这对我们后代是一种深刻的教诲、巨大的鼓舞。

回忆高文华二三事

李 莹*

高文华同志原名廖剑藩，是湖南现存的少数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是广大党员衷心敬爱的领导人。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解放初期任省委副书记。我是他领导下的一名小兵，几十年来与他保持着相当亲密的关系。本文所忆述的，是我和他接触中了解和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我认识高文华同志，是1937年下半年在延安中央党校。他先到那里，编在第五班；我后去，在第十班。当时他化名赵诚学，我改名李占先。我们见过面，谈过话。不久，他就离开了党校。1938年2月，我被分配回湖南。长江局写的介绍信是“面交高文华同志”。一见面，原来是熟人。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益阳人。因为我的未婚妻赵耀南（德坤）是益阳人，他要我利用这个关系到益阳去开展建党工作，还谈了益阳的一些情况，交待了工作任务。我于3月上旬把未婚妻叫到长沙来，我们结了婚，一同去到益阳。工作开展比较顺利。不久益阳县委成立，我被指定为县委书记。我当时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缺乏领导工作经验。文华同志每隔一两个月就来益阳检查一次工作，进行具体指导。他还利用他自己和他父亲廖若冰老同志的关系，帮助我建立一些社会联系，包括同几个上层人士如老同盟会员曾传范等的联系（与曾老建立关系，对后来促使国民党

*李莹，原湖南省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文史委副主任，现已离休。

当局逮捕和镇压大恶霸、汉奸曹明阵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华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益阳党的工作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发展。以后我在邵阳和湘西工作，也都是依靠以他为首的省委的领导。

1937年至1941年这个时期，湖南党的工作由比较顺利变得极为艰难。以高文华同志为首的省委，对这一时期的问题都处理得很好。在条件顺利应该发展时则放手发展；当反共高潮到来，中央和南方局提出“隐蔽精干”的方针后，又积极而稳妥地撤退暴露了或可能暴露的同志，为党保存了大批骨干。

解放初期，高老以省委副书记兼任省工业厅厅长，还一度兼任厅属小厂矿管理处处长。这恐怕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他不是工人出身，对办工业有兴趣，有经验，更主要的是他有一个为湖南的工业化打基础的雄心壮志。他办工业的指导思想是：大力发展小厂矿，利用其投资少、周转快的特点，积累资金，然后再搞大型工业。这无疑是一个适合当时湖南具体情况的正确方针。他调我到小厂矿管理处任研究组组长（当时我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任研究室主任），并要我至少给他推荐两位同志（真是求贤若渴啊！）。我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推荐，又不愿随便推荐，实在有负他的重托。我在那里工作了近两年，与高老接触更多。他工作起来，简直是废寝忘餐。有时我们开会，从下午开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人端几碗面充饥。他经常到下面检查工作，事前多由我带工作组到拟去的单位作调查研究，然后他下来解决问题。我大略估计了一下，他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下面跑。那时交通不便，许多地方不通汽车，他就和我们一道步行。每到一个地方，立即开始工作，常在深夜12点以后才得休息。他的肺结核病初愈，为了把我省的工业搞上去，如此奋不顾身地操劳，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激励。

这段时间，高老给我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思想十分敏锐，记忆力特别强。工业厅所属几十个厂矿企业，每个单位多少投资、多少计划任务，以至多少职工，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不须翻笔记本（我从未见他带笔记本），就能准确地说出来。省里定的各项指标，也是如此。这是常人所不及的。

高老调中央工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也很少通信，但彼此之间的感情并没有淡化。我每次去北京，总要去看望他和贾璉大姐（后来是刘德君同志）。他每次来湖南，也照例约我们夫妇去他住处见面谈谈。几十年来，我经历过不少领导，我对他们都很尊敬，但象我与高老这样始终不渝地保持着私人友谊是不多的。据我所知，许多同志对高老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人们为什么对高老如此爱戴？主要是因为高老具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令人崇敬。他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了筹措党的经费，解决干部的吃饭问题，他曾把自己唯一的儿子卖掉。此事已是众所周知，我就不多说了。还有另一桩鲜为人知的事情：1938年高老任湖南省委书记期间，他的母亲在益阳因身患重病，痛苦难忍，加以生活困难，竟至投塘自尽。以高老当时的地位，要设法照顾一下自己的母亲，并不是办不到的，而他一心为革命，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家庭的问题，以至造成那个悲剧。事后他也不免感到遗憾。高老具有彻底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真正做到了能上能下。他1935年就是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资格不可谓不老。可是他从不以老资格自居，任凭党把他安排到什么岗位，他都欣然接受，积极工作。高老的这种高风亮节，在世风日下的今天，更觉弥足珍贵。

高老原则性强，对干部既放手使用，又严格要求，发现谁有过错，都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我也受过他的批评。当我们受到批评时，丝毫没有抵触情绪，反而感到是一种爱抚。高老

对于干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在这方面我的感受是特别深的。1938年他母亲去世后不久，当他了解到我邵阳乡下还有一个寡母和三个年幼的弟妹，生活十分困难，而党组织又实在无力给我帮助时，曾深情地对我说：“你自己想点什么办法吧，不要让我家里的悲剧在你家重演。”仅这样一句话，使我感动得流泪了。后来我为桂林文化供应社的青年新知丛书写了一本名为《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曹伯韩同志在该社当编辑，也是党内同志介绍的），得了80元稿费，解决了家里一段时间的生活问题。1939年下半年我被调到邵阳工作，省委也驻在邵阳。一天，高老约我去他家吃饭，贾大姐弄了一钵子粉蒸肉，我和他们全家都吃得很香。我意识到，这是他知道我生活苦，让我去打一次牙祭。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平日是很少吃肉的。还有一次是高老调京以后，我第一次到北京开会，去看望他和贾大姐，在他家吃过饭后，他们拉着我上街，为我的四个孩子每人买了两件衣服给我带回，对我说：“你们孩子多，工资不高，一定有困难，这几件衣服，送给孩子们，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吧。”多么深重的情意啊！从以上几件事，充分体现了高老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心换心，情还情，我对老领导也不是漠不关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估计高老可能受到冲击，趁女儿赴京之便，要她去看看高老，问问情况，她先到我告诉她的高老原来的住址（苏州胡同某号）一问，说已经搬了家；再到水产部打听，回答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就没有办法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听说高老曾饱受折磨，身体很不好，我忧心如焚。直到1981（或1982）年高老偕德君同志来长沙，看到他身体尚健，才感到宽慰一些。

高老和我们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我们对他非常尊重，但没有一般下级对上级的那种畏惧和拘谨，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十分随和的同志关系。地下工作时期，我们都把他看作老

大哥，叫他“老高”；他也把我们当作小弟弟，以“小李”、“小×”相称。这种亲昵的称呼，一直继续到解放。近几十年来，因为大家都年事已高，“老高”也就变成了“高老”，“小李”也就变成了“老李”了。然而我们的友情却始终未变。记不清是1953年还是1954年冬天，高老调京后第一次回湖南。一天下午，他来到我家，说：“今天晚上就在我家吃饭，你去弄一条鱼，弄点冬苋菜，我很久没有吃到益阳家乡口味了。”我们高兴地照办了，还买了一瓶白酒。我夫妇俩，还有我爱人的姐姐，和他四个人围着炉子，边吃边谈。大家兴致很高，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了许多往事，也谈了一些别人的故事，直到深夜才尽兴而别。这次无拘无束的家庭小叙，充满了真挚的友情，使我们至今难忘。

高老自奉节俭，饮食衣着都很简朴。他好客，但从不用公款请客。他虽身居要职，却从不摆架子。解放初期，领导干部都配备了一个警卫员，时刻跟随着首长。高老对此很有反感，说是个“封建尾巴”，一定要割掉。不久他的警卫员果然不见了。

以上仅就我的亲身经历，忆述一些琐事，从一个侧面反映高老的高尚品格。至于高老对党的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就无须我来评论了。

回忆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

周 里*

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底，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统战部副部长王涛（对外用八路军代表名义，对内任湘南特委书记），到湖南改编湘南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一部分。他和谢忠良、刘伟文、萧林等同志来到湖南郴州，同湖南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黄少谷、保安司令欧冠（后陆瑞荣），接洽将湘南中共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编入新四军问题。经过谈判，达成协议：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团结抗日；在郴州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下山整训，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整训期间供给由当地政府负责。

1938年2月，在郴州中山北街设立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湘南特委书记王涛兼任通讯处主任，公开工作人员有余稼生、张子芳、彭太保等。通讯处对外是新四军的留守机关，对内是湘南特委的地下党组织秘密联络点。当时我们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在郴州、桂东、耒阳分别设立新四军后方留守机构，但国民党当局只同意在郴州设通讯处。在桂东曾设新四军驻沙田留守处，不久撤销。在耒阳只许设《新华日报》分销处，实际上也起通讯处的作用。

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的主要任务是：将湘南的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后，料理新四军后方勤务，做好新四军将士家属工作；

*周里，又名周礼，当时任中共湘南特委组织部长、湘南特委书记。后任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

宣传抗日救亡，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支援前线；同时为湘南特委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工作，提供有利条件。当时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新四军通讯处设立后，湘南特委就可以利用这个合法机构作掩护，半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党的工作。

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长征后，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湘南地区活跃着由原湘南特委领导的三支游击队。

一支是蔡会文（已牺牲）、游世雄等领导的活动在桂东、汝城和江西上犹、崇义一带的湘粤赣游击支队，我曾在这支游击队任政治部主任。1937年10月，新四军负责人项英、陈毅派人送信给游世雄，指示游击队集中待命，并派人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谈判，准备改编新四军。游世雄等随即到桂东桃寮与国民党代表郭大为（郴州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黄存善，谈判随后又到汝城与郴州保安副司令胡凤璋和汝城县长会晤，商谈了游击队下山整编的有关问题，当时商定：以桂东沙田地区为游击队集中地点，60华里内由游击队设防。游击队下山集中时200余人，改称湘粤赣边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经过整训扩军，1938年2月从沙田出发赴江西时为300多人，后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王涛来湘南时，这支游击队已奉令整编，因此王涛没有去这支游击队联系。另两支游击队，则是王涛来湘南后整编的。

一支是李林领导的活动在宜章、郴县和广东乐昌、乳源一带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第一大队。后改称抗日红军游击队。当时我任湘南特委书记，有时亲自领导李林游击队活动，有时住在离坪石10多里的地方坳丘，开展地下党的工作。1938年1月，王涛来到坪石，住在一家饭铺里。这是他1931年至1934年担任湘南特委书记时的一个老联络点。王涛到这家饭铺来说要找周礼时，正碰到我的通讯员在饭铺里，他马上把王涛接来坳丘。

王涛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他告诉我们：国民党当局于1937年10月2日正式宣布，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他这次回湘南的任务是：把湘南特委领导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抗日前线；设立新四军通讯处，推动湘南的国共合作，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告诉我：“原湘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霞在牺牲前，给党中央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湘南特委还存在，由周礼负责，所以来坪石找你。”随即我们一方面集合游击队员，进行形势和任务学习，动员整编，一方面和国民党地方当局商定游击队整训地点和有关事宜。2月，我们这支分散在乐昌、乳源、宜章山区活动的游击队100余人在坳丘集中，开往郴县良田。国民党当局认为良田是交通要道，在这里整训影响太大，于是郴州保安司令陆瑞荣亲自打电话给我，一面表示慰问游击队，一面商量部队整训地点。经协商，部队再开往宜章赤石整训。当时我们和郴州国民党有关方面议定，为避免冲突，国民党军队撤离我们驻地30里，沿我们游击队从坳丘开拔到宜章、郴县所行道路两边让开15里。游击队到达赤石三望坪学校里住下，仍然保持警惕，战士们把学校围墙中的砖取下来做枪眼，作好战斗准备。经过整训、扩军，这支游击队扩大到170多人，于3月上旬开往耒阳江头继续整训。

另一支是谢竹峰、刘厚总领导的活动在耒阳、安仁一带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王涛和我们取得联系后，又到耒阳找到耒（阳）安（仁）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和游击队大队长刘厚总。他们先后同耒阳和安仁的国民党县政府代表谈判，达成协议，2月游击队从天门仙等地下山集中，到江头刘家祠整训。游击队集中时约100余人，经过整训、扩军，达150余人。

两支游击队在耒阳江头汇合，继续整训、扩军。一个多月

文作忠藏书

后，李林带领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刘厚总带领的游击队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二大队。两个大队共扩充到400余人。4月中旬，部队从江头出发，到灶市乘火车去江西。部队出发时，沿途群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烈欢送。部队到达江西新四军驻地后，改编为新四军军部特务营三、四、五连，李林任特务营副营长。刘厚总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后任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在1941年“皖南事变”时叛变。

我参加了3年多游击战争，于1938年2月依依不舍地离开共同生活和战斗的游击队，到郴州重新组成的湘南特委工作。新成立的湘南特委成员为特委书记王涛、组织部长周礼、宣传部长卢良、职工部长蔡坚、秘书长余稼生（后叛变）。耒（阳）安（仁）中心县委书记谢竹峰，郴县县委书记张春林，桂阳县工委书记谷子元，桂东县工委书记顾星奎，永兴县工委书记黄平，宜（章）乐（昌）县工委书记萧林等。我住在离新四军通讯处半里多路远的裕后街靠河边的原万胜旅馆旧址里。旅馆早已歇业，前门是国民党县政府开办的一个供销合作社。负责人是地下党员曹元养，掩护了我们的一些活动。

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认真做好前方将士家属的优抚工作。王涛等同志经常向家属们进行慰问，及时介绍前方将士英勇抗战的情况，鼓励家属们安心后方工作，积极搞好生产，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支援前方抗战。对家属们提出的要求，通讯处能做到的尽量满足。家属们也把通讯处的同志当成自己的亲人，家属有什么事情，心里有什么想法，都找王涛等同志谈谈。由于通讯处工作人员少，新四军将士家属分散在湘南各县，湘南特委和各地党组织都配合和协助通讯处做好前方将士家属工作。李林的爱人黄凤是共产党员，原游击队战士，因新四军不许带家属而留在郴县良田老家。良田离郴州50里，我多次去良田慰问她，有次去还帮她的姐姐开药方治好了病。由于通讯处

做好了家属工作，使前方将士能够安心抗战。

通讯处非常重视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5月，湘南特委和通讯处通过统一战线关系，由潘实岑、李达九等开明人士出面，集资筹办了牖智书店。书店设在通讯处楼下，负责人为地下党员左代远（后自首了）。书店发行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新华日报》、《观察日报》、《群众》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报纸。书店还举办了读者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介绍读者阅读进步书刊，举行读者座谈会。同时创办了《老百姓周刊》，贴在街头和交通要道，宣传团结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当时还成立了歌咏队，唱抗日歌曲，作抗战宣传。湘南其它县的党组织也利用各种关系，用各种名义，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培养进步分子和抗日骨干。如汝城开办星光书店，创办《星光》半月刊；宜章设立战地文化服务处分处；耒阳设立《新华日报》分销处；桂阳创办战时中学，等等。湘南许多青年到通讯处要求参军抗日，保卫国家。1938春节，郴州青年学生还组织了一支日货收缴队，收缴和烧毁日货。通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等活动，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又可以从中发现和培养信奉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组织打下思想政治基础。

1938年夏至1939年初，湘南特委多次在郴州万胜旅馆、汝城耕读村、郴县栖凤渡等地举办县、区、乡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各级党员干部。在万胜旅馆举办的两期训练班，培训县一级党员干部，每期15天，学员20人左右。主要由王涛和我讲课，讲党的性质、任务，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统一战线工作等。发给学员学习的有《共产党宣言》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

王涛的公开身份是新四军军官、军衔是中校，在公开场合

穿军装，到党训班讲课，就改穿便服，秘密绕道来万胜旅馆。他讲课深入浅出，很有针对性。一些学员多年参加游击战争，钻深山老林，或从事地下工作，秘密活动，消息闭塞，很少看到党的文件和革命书报；同时经历残酷斗争，眼见许多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充满阶级仇恨，因此听说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一时想不通。王涛就针对这种思想，讲抗日战争形势和国共合作抗战的道理，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大家提高认识，使大家的思想和工作，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坚持联合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

1938年秋冬，我们还通过民训员中的党员，在郴州、栖凤渡、良田等地举办民众训练班，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培养抗日骨干。

从1938年春天开始，湘南特委利用通讯处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秘密进行党的工作，积极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的组织。宜章、郴县、汝城、桂阳、耒阳建立了县（工）委，永兴有党小组。1938年党员发展到700多人，1939年发展到1400多人。开始发展党员，主要找大革命时期入过党的和参加过农民协会的积极分子。首先了解他们的历史、政治态度，只要没有叛变和自首，拥护共产党，工作又积极，合乎党员条件的就可以入党。我直接联系的栖凤渡支部，支部书记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女党员杨晓芝。随后我们又注意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我还直接联系城区铁路工人支部，支部书记姓李，是火车司机，广东人。郴县由特委委员张春林兼任县委书记，党的工作很活跃，先后建立了6个区委。杨晓芝还担任了栖凤渡区的区委书记。日军占领郴州后，党组织并发动群众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

当时国民党虽然与中共合作抗日，实际上却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不允许

宣传国共合作抗日救国，还派特务侦查和监视新四军通讯处，跟踪通讯处工作人员和来往人员。

革命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经不起考验，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威利诱下叛变自首。通讯处的秘书余稼生，就是被伪装参加抗日宣传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蒋介石引诱叛变的（据解放后蒋介石交代材料）。据我了解，余稼生在中央红军长征路过坪石时，就离开部队，曾在乐昌国民党政府里工作。当时我对他有些怀疑，我们每月只有4元零用钱，可是他却花40元买了一件呢子大衣，钱是哪里来的呢？有的同志对他经常打听别人的行踪，也引起怀疑。于是我和王涛商量，将他暗中清洗出党，不通知本人，并把他调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39年春，有天我和王涛出外散步，边走边商量一些事情，在苏仙桥附近忽然碰到余稼生。王涛问他是怎么回来的，有没有介绍信。他说回来和黄星结婚，没有带介绍信。后来，我们通过国民党里的内线，知道余稼生向国民党报告了一些我们的情况。以后牖智书店负责人左代远自首，和他也是有关系的。好在他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党员，不致影响各县党组织。我们随即向省委报告了这一情况。省委通知凡暴露了的党员，都要转移撤退。

1939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通讯处主任徐正坤和罗梓铭等六位同志，被国民党顽固派杀害。郴州形势骤然紧张。此时王涛已是省委委员，随即转移去长沙，由我担任湘南特委书记。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郴县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也在伺机破坏郴州新四军通讯处。幸亏县政府里有我们的人，事先得到通知，顽固派快要向我们下手了。特委的同志便都隐蔽起来了，我也住到郊区一个地下党员家里。王涛的爱人张子芳把一些文件烧掉了。王涛的一支手枪也由特委宣传部长卢良带走，藏在他住的民主人士潘实岑家里。大家做

忠作文

好了应变的准备。

这天上午，张子芳得到消息，顽固派要采取行动了，书店负责人左代远不知到哪里去了。通讯处和书店剩下张子芳和彭太保，张子芳还怀抱着生下没有满月的小孩。不到两个钟头，约一个排的国民党军警，包围了牖智书店。一个县政府的人问张子芳：“王涛哪里去了？”张子芳说：“到省里开会去了。”张子芳反问：“我们犯了什么法？”那人说：“你们进行赤化宣传，反对国民党。”他们打开王涛的箱子，里面是从延安带来的书。他们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便把书店的进步书刊没收，查封了书店。张子芳抱着小孩到书店旁边巷子里地下党员刘星家里暂避。彭太保把被军警丢在门外的行李铺盖，存放在斜对面豆腐店里。当国民党军警查封牖智书店时，一个地下党员的女孩子看到了这种情况，很机警地到我住的地方，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即通知郴州党组织注意隐蔽，并把张子芳转移到裕后街开鞭炮铺的地下党员谷安昌家里。

7月间，省委组织部长郭光洲曾来郴州，通知我转移到长沙，去省委组织部工作。国民党封闭牖智书店的第二天，我便通过铁路支部的同志，买了两张去长沙的火车票。在他们的掩护下，当晚我和张子芳分别上了火车。我们没有坐在一个车厢里，见面时也不打招呼，装着不认识，谨防特务跟踪。第二天我们到了长沙。找到省委后，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国民党顽固派查封牖智书店，同时破坏了新四军通讯处。通讯处和书店人员离散后，新四军驻湘南通讯处也就不存在了。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再一次发动反共高潮，并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极力反共，大肆进行清查共党活动。许多共产党员甚至新四军家属惨被杀害。家住郴县良田的新四军特务营副营长李林的受

人黄凤，也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英勇牺牲了。

解放后据郴州国民党特务交代，当时他们得到情报，说共产党在坪石一带和白石渡附近搞武装活动，有几十条枪，是湘南特委周礼领导的，想通过查封书店和捕人侦察周礼的情况，追捕周礼，结果连周礼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其实国民党特务的这个情报也是假的。当时湘南特委并没有搞什么秘密武装活动。直到日军进犯湘南后，宜章、郴县、耒阳、永兴等县地下党组织和党员，才领导成立抗日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军。

（黎风整理）

解放前夕攸县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攸县人民警卫大队的建立和发展

贺湘楚*

解放前夕攸县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在省工委的亲切关怀下，由县工委领导开展起来的。这支武装的建立，对于打击顽敌，扩大革命影响，鼓舞群众斗志，推动党的建设，开展群众运动，迎解、剿匪，稳定社会秩序，保证新政权的建立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一、建立发展过程

1947年下半年，经省工委同意，我们开始组织地下农会，经过一年的努力，地下农会遍及了峦山、凤岭、三江、皇图、洞井、新江、渌田等乡，和西乡的部分地方，同时在船员和城关镇一些手工业工人中也发展了秘密组织。会员4000多人，联系的群众达数万人，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涌现了一批先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此条件上建立党组织。1948年10月，在峦山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以后，又陆续建立了31个支部，并先后建立了黄丰桥、峦山、皇图岭、新市四个区工委。各区为开展武装斗争作积极准备，都建立了地下武装小组和情报站。

* 贺湘楚，当时任攸县人民警卫大队政委，现任省政协常委。

要搞武装斗争必须有枪。我们便策划夺取乡公所的枪支。当时正碰上乡长改选，县工委决定，派尹辉和谢恺初分别竞选雷山乡和凤岭乡乡长。利用了一些社会关系，两人都当选了。他们当了乡长，便把地下武装小组成员安排当乡警，把枪掌握在自己手里，决定农历端午节在这两个乡公所夺枪。在凤岭乡公所很顺利地将其七支步枪全部夺过来了。加上收缴民间零散手、步枪三支，组成20人、10支枪的武装队伍。由贺达尊率领驻扎于广寒寨。

1949年春，从江西上饶来湘接新兵的国民党第六十七军直属第一团（番号叫雄狮部队）团长邹继衍，副团长谭元育于农历五月上旬起义，番号叫湖南地下军湘东纵队，邹继衍任司令，谭元育任副司令，有70余人、40多支枪，编为三个中队。由醴陵开至攸县高枧中田村，沿途开仓济贫，宣传革命，颇有声势。皇图岭伞店老板有一个哥哥叫谢枝先，与邹继衍是老同事，而谢早就和尹辉有接触，受到尹辉的启迪，倾向进步，向邹介绍了与尹辉的关系。邹即派副官陈运桓（凤岭乡人，攸县地下党员文有燃的内兄）找到文有燃，再由文有燃带他到黄丰桥找到尹辉联系。我们决定和他们合作，把他们引上了我们的驻地广寒寨。双方于6月下旬在王家坊一农家会面，地下党方面由我和彭秀实、尹辉、贺达尊、李孟球出面与邹会谈。双方达成了三点协议：1、湘东纵队在省工委未派人来领导之前，接受攸县地下党县工委的领导；2、军事方面由邹继衍统一指挥，政治、情报工作和后勤补给由攸县地下党负责；3、为便于指挥，攸县地下党原有的武装编为湘东纵队第四中队，贺达尊任中队长。县工委派李孟球、谢宗裕、文有然等同志驻部队配合省工委派来的政工人员做政治思想工作。从此，攸县地下武装造的声势很大，号称有千把人枪。群众听了欢欣鼓舞，敌人听了很害怕。有一次我和彭秀实在罗培源陪同下只身潜赴新市桐梓坪

活动，当晚宏魁陂传出贺湘楚带600多人来了，吓得伪警察所连夜转移住地。接着，我们去夺柏市警察所的枪。由贺达尊派刘念华前往柏市警察所协助内线郭焕章开门，实行里应外合。傍晚时分，当我们接近警察所驻地田心村时，犬声四起，惊动了敌人。我部隐蔽在距敌岗楼约3米远的干圳里，听到岗楼内人声杂乱，知敌已有戒备，候至凌晨4点，内线仍无动作，看来难以得手，只好撤离。我们撤离后，伪警察所也立即逃跑了。这次虽然没有夺到枪，但把伪警察所吓跑了，拔掉了开展工作的障碍，也算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不久，省工委派曹伟如同志来传达省工委的指示，要我们与湘东纵队分开，湘东纵队开往萍乡东桥一带活动，将第四中队归还给我们，仍在黄丰桥一带活动。

当时，新市区工委策反了网岭警察所警长周锡和参加地下武装小组，并先后派出5名地下党员和农会会员在周锡和班充当警士。地下党员曾祥致、曾祥千又通过关系将其弟曾祥应安插在网岭联乡大队当中队长，掌握着步枪12支、手枪4支。县工委要新市区工委创造夺取伪网岭警察所的枪，并要曾祥应把他所掌握的队伍也同时拉出来。7月2日，新市区工委派人送信给我，说工作成熟，可以夺枪。我立即率贺达尊中队前往新市，晚上行军，白天隐蔽，在山间小路上走了两个晚上。3日午夜，在钟鼓岩小寺庙里休息，天亮我们刚离开寺庙，敌人就把寺庙包围了，险些被敌人吃掉。7月4日到达新市桐梓坪隐蔽了两天多，研究夺枪计划。7月7日在里旺冲口一农民家里，我和新市区工委的陈向民同志布置夺枪。由吕尧生、占端胜、刘保林等20余名便衣人员配合贺达尊中队执行任务。先派人到敌网岭警察所缴枪。贺达尊中队和便衣人员向警察所接近，伪警察所驻地侧面有10余座坟墓，当我们接近警察所时，警察所的人员已占领阵地，妄图顽抗。贺达尊和吕尧生立即向

他们喊话：“刘量才有手令，命令你们缴枪。”这时，警长周光友准备向我射击，周锡和等人不同意，就在他们争执之际，我们已冲至其面前，将18支枪全部缴获。曾祥应所带领的12支步枪、4支手枪也同时拉出来了。当晚部队到达峦山上陇，在上陇甩开追击之敌返回黄丰桥。

7月11日，彭秀实从长沙回到黄丰桥，带回省工委的指示：我们这支部队命名为攸县人民警卫大队，任命我为政委，为了便于我全力抓武装斗争，县工委书记职务由彭秀实接任。县工委即任命曾祥应为大队长。将部队编为两个中队，以网岭夺取的枪支和曾祥应带出的枪支编为第一中队，吕尧生任中队长，陈昌其任副中队长，吴夏村为指导员。以贺达尊所率领的原湘纵第四中队编为第二中队，洪扬勋任中队长，文增和任副中队长，贺连生任指导员，贺达尊调任大队参谋，部队以广寒寨为基地开展活动。

8月10日，我们正在萍攸边界活动时得知解放军已进入我县皇图岭地区。我们便立即向攸县进发，在皇图岭与解放军会合。14日攸县县城解放，我们和解放军一道进城，协助部队恢复县城秩序，解放军将缴获县警察局、自卫队的枪200余支全部交给我们，我们扩建了两个中队，共有300余人枪，以后在全县的剿匪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在斗争中成长

我们这支部队的建立，对攸县反动当局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他们采取政治瓦解和军事镇压等手段，企图把我们扼杀在摇篮之中。对此，我们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挫败了他们的阴谋，在斗争中成长起来。

当时，国民党攸县县党部书记长何明大和县参议员谭祝华，以长辈身份来做瓦解我们的工作。对我说，现在成立武装

队伍还不是时候，你们还是把枪交出来，等时机成熟了再搞。我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你们不要来这一套，我们不会上你们的当。就是把这些枪砸烂也不会交给你们。将他们训了一顿，他们便灰溜溜地走了。

1949年4月间，军统特务邓戈，奉衡阳警备司令蒋伏生之命回攸县，与原攸县县长余公倩相勾结，组织反共武装——茶攸安边区指挥所。将警察队、自卫队等地方武装统归他们指挥，并在官田、网岭、皇图岭、良坑等地设联防办事处，统管各地段的军事行动。攸县地下武装建立后，便是他们镇压的主要对象，我们和他们进行了多次战斗，粉碎了他们妄图消灭我们的阴谋。

农历五月下旬，官田联防办事处主任王定中害怕我们吃掉峦山龙会滩警察所，来到峦山安排他们撤到官田去。这一消息被峦山区工委侦悉，向我们报告，我们即与湘东纵队赶往峦山石桥里伏击王定中。可惜我们的行动被王定中发现，他们又缩了回去。我们便进驻洲家屋与他们对峙，他们不摸我们的底细，不敢进攻我们，我们也无力向他们发起正面进攻。后来，他们与湘东纵队接上了头，通过湘东纵队向我们提出要求谈判。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双方派代表在咸弦河边一条小船上谈判。谈判时，我方除有湘东纵队的代表外，尹辉参加了。我们提出的条件是龙会滩警察所立即撤走，官田的自卫队在峦山方向不得进入琴陂，在黄丰桥方向不得进入昭村，军事哨所只能设在寒婆坳以下。王定中接受了我们的条件，将龙会滩警察所撤回官田。这次虽未把龙会滩警察所吃掉，但峦山乡已无敌踪，峦山乡公所也被捣毁，于是峦山、凤岭两乡完全在我控制之中。

大约是6月中旬的一天，邓戈匪部一个中队进驻兰村，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地下工作人员谢南彪叛变投敌，并将我们藏

在杉山冲的粮食告诉了敌人。第二天，敌人派了两个分队来杉山冲抢粮。我与邹继衍决定围歼这股敌人，由邹继衍部从万新桥方向、洪扬勋部从杉山冲正面发起进攻，敌人急往丁家冲方向撤走，洪扬勋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又返回杉山冲。这时队员刘湘生、贺桂安不明敌情，进入杉山冲而被俘，当日押往兰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被杀害于兰村祠堂前。

7月7日，我们从网岭夺枪回到峦山上陇，队伍刚住下，敌自卫队四个中队尾追上来，我们仓促应战，拼死抵抗，边打边撤，撤到上陇的后面山上再转移到潦叶陇。在潦叶陇隐蔽了一天一夜，等到敌人退走后才从潦叶陇经峦山返回黄丰桥。在这次战斗中，有10个战士被冲散了，带着武器潜回新市，由陈向民收容隐藏下来，没有一个人有动摇妥协情绪。后来，彭秀实从长沙回来路过新市，陈向民把他们交给彭秀实带回队。经过多次较量，攸县的反动地方武装没能消灭我们，于是请来正规军一个团进山围剿。为了避免损失，我们转移到萍乡官陂洞一带活动，到8月上旬临近解放前夕，我们又回到了攸县，与解放军会合。

三、追剿邓戈匪徒

攸县解放后，邓戈匪部盘踞东乡广寒寨负隅顽抗，有1200余人、800多支枪，在章井冲、山关、排山一带打家劫舍，搜抢粮食，搜捕地下党员和农会会员，排山农会会员刘喜乃惨遭杀害。剿灭土匪成为攸县解放后的一项突出任务，这一任务当然地落在了我们身上。8月28日，我们进驻黄丰桥，监视打击这股土匪，派出便衣手枪组深入广寒寨附近的黄家坊、桔木山等地活动。9月2日匪连长向仕贤在黄家坊理发时被我便衣队员击毙。次日，邓戈派出匪徒100多人在王家坊烧房屋6栋，并将

理发员漆雪挂杀害。9月8日县工委书记彭秀实向南下中共攸县县委汇报了匪情，提出必须借助解放军的力量与攸县人民警卫大队配合，歼灭这股匪徒。县委立即派县委组织部长赵英俊到新市与过境解放军联系剿匪事宜，并由警卫大队派出一个侦察小组前往实地侦察，绘制地形图向解放军汇报。9月14日，解放军派了一个团在警卫大队的配合下包围了广寒寨。因正居高临下，地势险隘，工事坚固，不好进攻，由警卫大队派人带路从冲背狗窝里的羊肠大道攻入广寒寨。发现这时匪徒已逃走一空。我军即向深山进行拉网式搜剿，各个击破。这场战斗共缴获的枪支除一部分交解放军外，交警卫大队的有步枪364支、手枪10支、轻机枪一挺，俘匪营长廖坤、丁见衡以下440余人，物资200多担，我军牺牲战士姜明华1人，轻伤8人。因广寒寨洞深山高森林茂密，范围广阔，搜捕时有部分残匪漏网。邓戈本人先一日率200多人枪去南枫，第二天清晨听到广寒寨枪声，驰来救援，在山关受到我军阻击，大部被歼。最后邓戈率20余人枪退往湖南坳。为了乘胜追击，清剿残匪，县委又请示衡阳军分区独立团的一个排由一副营长率领配合警卫大队继续清剿。10月7日警卫大队第二中队在湖南坳缴获冲锋枪4支，轻机枪1挺，三八式马枪5支，俘匪徒5人，11日第三中队在峦山牛丫岭一祠堂内将匪营长谭仁生残部全部歼灭，缴获步枪57支，轻机枪1挺，俘匪徒50多人。匪首王定中（蒋伏生任命其为攸县县长）、匪营长王再全、张云波收集残匪300余人逃往良坑易家寨。警卫大队与军分区的一个排于10月17日包围易家寨，俘匪160余人，缴枪108支，余众溃散，王定中只身逃到良坪等地，11月中旬在芙蓉寨逮捕归案。匪营长王再全、张云波在追捕下无处藏身，于12月6日带手枪12支向我部投降。至此，除邓戈一人外，匪部全部消灭。攸县人民警卫大队改编为县大队。

攸县人民警卫大队在攸县委县的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彻底消灭土匪1000多人，赢得了攸县社会秩序的稳定，对攸县的解放作出了一定贡献。当时，解放军随军记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编在《湘中红旗飘》这本书里。赞扬了攸县地下党和攸县人民警卫大队的工作。

注：

关于国民党雄狮部队的起义情况和攸县地下党派人到该起义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情况，在1981年出版的《湖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第172页顺数第五六行（彭秀实、贺湘楚、邹乃山、尹辉四人合写的解放战争时期攸县地下党的斗争一文中）有所叙述。在1989年10月出版的《攸县文史》第六辑第10页顺数第7—10行倒数第一行（攸县地下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一文中）也有所叙述。两文对这个问题的叙述，都与事实有点出入。今后对这个问题的叙述应以本文为准。另外，上两文对武装斗争其它方面的叙述与本文有出入的，亦以本文为准。



回忆南岳黎明前的地下斗争

欧阳镇 旷 炯 董建华*

1949年2月至9月，湖南省工委为了加强对南岳地区的领导，先后从长沙分别派刘东安、谭安猷和熊家宽分两条线来到衡山及南岳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分别组建了南岳支部、国师支部、中学支部。南岳支部侧重发展社会青年学生，领导社会学运及农运开展策反；国师及其岳剂、附中支部侧重发展在校学生，领导其校内的学运。1949年6月，成立中共衡山县工委，统一领导上述几个支部和南岳地区人民做好迎接支前的准备工作，开展护校、护路、护仓库、维护社会秩序与左大凌的“反共救国军南岳纵队”周旋两个月，并改造了刘超部队，瓦解了“视导组”，终于消灭了敌人，获得了解放，保卫了“天下南岳”的安全。

一、开展学运与农运

南岳地下党支部根据县工委的决定，深入开展学生和农民运动。学运的主体是1947年8月由欧阳镇组织的“联兴社”为核心，其成员系非在校的高中毕业和农村知识青年。

1948年暑假，欧阳镇和进步学生谭玉明、旷炯为深入开展地下活动，在南岳寿宁宫后殿二楼设立了秘密点，名曰：“明明楼”作为绝密活动地址。“明明楼”成为学习和翻印《新民

*欧阳镇、旷炯、董建华，解放前均系中共党员，参加了当时的地下斗争。

主义论》、《中国往何处去》等重要文章的中心地址。我们在这里秘密集会，抨击时弊、议论国政。

1949年1月，欧阳镇在南岳镇北支街旷洪光家召开了“联兴社”会员大会。会上社员讲了农村开展“三反”的情况，欧阳镇讲了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和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动态，要求青年学生积极行动，组织农村“反内战”运动的开展，最后宣布解散“联兴社”，社员转入新组建的“南岳大学预修班”，以适应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一面学习艾思奇《大众哲学》和阅读《新时代》等杂志；一面按区工委的指示精神继续深入农村，把农运推向纵深发展。

1949年春，县工委谭安猷同志指示欧阳镇，要根据“隐藏身份，积蓄力量”的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大力宣传解放军的形势，翻印散发解放军战报和传单。欧阳镇回到“明明楼”，与旷炯商讨后，遂分头通知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在南岳关帝殿开会。到会的有40余人，把县工委讲话精神给大家作了传达，指出全国即将解放，要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

1948年10月以后，以南岳西街外镇岳桥附近的周家凹周家大屋为据点。欧阳镇等在这里创办的“南岳大学预修班”，一方面延聘国师教授刘重德等人到预修班授课，学习文化，同时组织青年学生开展宣传活动。其中以旷炯、覃玉明、王坤为骨干，自筹经费购置油印设备，自刻自印革命传单、布告及资料。内容有《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土地法大纲》、《约法八章》、《致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和党的有关政策，时事政治动态等等。传单和资料的标题因内容而异。主要的有专题介绍、学习心得、时事评论、号外等形式。散发传单的方式分为对外张贴及邮寄、私人传递两种。以张贴为主。张贴传单、资料总是深夜进行，从离南岳街一华里半的周

家四出发，冒着风险到祝圣寺、大庙、四牌楼、汽车站等群众来往较多的地方秘密进行。有的贴至军阀何健的芸园的围墙上或南岳管理局的门口。有时为了赶印传单、布告，通宵达旦。例如翻印谭安猷同志转来的中原军区文告《约法八章》和《致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共300余份。印出来的各种传单，从邮局发给南岳、师古、镇月、枫木桥等地的国民党军政机关要员，天未亮将《约法八章》张贴于四牌楼及管理局门口，天亮以后，街上市民看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反动派则惊慌万状，惶恐不安。在此期间，总计散发传单或资料达10余次，印刷3000余张。通过这一活动，对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教育城乡群众，团结进步力量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长白师范学院和山东震华学院相继迁来南师。两院学生，大都出身于官绅地主家庭，其中不少学生思想反动，仇共反共十分猖狂，他们来南岳之后就跟国师学生中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气焰嚣张，在南岳街头张贴署名“锄奸团”的反动标语和传单，用所谓“耳闻目睹”的事实，污蔑和丑化解放区的真象，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和南岳市民群众。为此，我们组织力量，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不仅撰写文章驳斥，撕掉复盖，而且把报刊上有关解放区的电讯稿和著名人士李书城《解放区见闻录》剪辑张贴出来，有力地戳穿了“流亡学生”们编造的谎言，教育了群众。

1949年，国民党制造了南京“四·一”大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青年学生尤为激烈，武汉、长沙等地都在积极酝酿组织声援活动。其时，南岳国师师生熊家宽、王向天、吴若虚、刘欣森等人正在长沙，耳闻目睹了这一切，深受鼓舞和启发。4月1日傍晚，吴若虚赶回国师，看到“民主墙”上已贴满了愤怒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京沪学生的大字报，

甚为高兴。当晚，吴若虚等抓住时机，深入宿舍，走访了许多同学，向同志们介绍了长沙等地的学运实况，并提出在4月15日罢课游行示威的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赞同。13日上午，吴若虚等人又分头到各中学串联发动，号召各校同学积极参加“四·一五”大游行。

欧阳镇得知国师发起组织4月15日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后，于4月13日到15日，一方面组织谭玉明、谭树春等人准备游行的小彩旗，书写标语、口号；一方面欧阳镇、旷炯分别通知师古、枫木桥、枚桥、石门、大金冲等地的进步青年如期到南岳参加游行。4月15日南岳大学预修班和各地赶来的青年学生成月韶、旷连璧、文庚臣等60余人，在事先约定的大庙门口集合后，由欧阳镇带领进入实小中山堂参加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约3000余人，礼堂容纳不下，许多人站在礼堂前面大坪里。国师代表、学生自治会理事刘欣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愤怒地谴责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屠杀要求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学生的暴行。接着国师代表周煦卿以沉痛的心情宣读了祭文，各校代表也先后致悼词，那慷慨的词句，悲痛的声调，使到会同学，不少人眼睛红润，尤其是女同学更忍不住内心的愤懑，低声啜泣，大会肃穆庄严的气氛，更加引发了人民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切齿痛恨。

会后，几千名青年学生，列队游行。队伍从实小出发，经祝圣寺、东街、南街，转入登山公路，再从西街至四牌楼、北正街。国师、岳云的学生游经北正街各自返校，附中学生经东川门返校。在游行过程中，学生挥舞彩旗，歌声四起，口号震天，旷光辉在游到四牌楼时，站在肉砧上，高呼革命口号，“反迫害、反暴行！”“要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血债要用债来还！”“打倒迫害学生的南京政府！”等口号声，与《反迫害进行曲》、《我们要活命》、《打倒独裁》、

《你这个坏东西》等歌声汇成一片。镇上居民，倾城而出，近郊农民，亦赶来街上支援学生的正义行动，围观者何止万人！

游行后不几天，在地下各党支部的领导下，各校学生自治会协商成立了南岳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油印的《生活日报》，由曾卓、李寿彰和熊清泉负责编辑出版。当时，李寿彰、黄显孟利用学生自治会仅有的一台收音机，收抄延安的“记录新闻”，在“方生社”办的墙报上和《生活日报》上刊出，及时传播我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

5月间，经县工委批准欧阳镇介绍旷炯、董建华、谭玉明入了党，成立了党小组，由欧阳镇任小组长。县工委谭安猷传达省工委“关于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大力开展学生运动，发动农民抗粮、抗税、抗征，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精神。党小组把抗粮、抗税、抗征列为主要任务。欧阳镇遵照指示精神，组织社会青年学生，发动农民群众开展“三抗”斗争。首先从谭安猷曾经在南岳实小开办的夜校组织起来的贫民和农民学员100余人作主力。由于有了群众基础，很快地把农民发动了起来，群众不交公粮，不交派款，青壮年农民抗丁逃往它方，有的外出做生意对抗征兵。后来把“三抗”斗争引到万福、止观桥一带。万福保长旷树才最反动，要抓旷正清等六名壮丁去当兵，旷正清在农民兄弟的维护下，和旷树才进行了理直气壮的说理斗争。南岳党支部还发动青年学生、农民积极分子，采取回避、隐藏等办法，结果没有征去一个壮丁。国民党五十八军向地方派粮派款和摊派其它物资时，在止观桥、日形山农民积极分子阳少龙、谭祖五、谭祖会、康江庭的带领下，与之周旋、抵抗。五月中旬，欧阳镇又到枚桥、枫木桥、店门前等地召集青年学生雷菊圃、旷鼎成、成月韶等人和农民积极分子30余人开会，会上介绍了万福抗征和止观桥抗粮、抗税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并将带去的油印传单，秘密张贴，揭露当局和国民党

五十八军征兵、征粮、征税危害人民的罪恶事实，进而号召大家“三抗”。结果凡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未征去壮丁和未摊派粮、款。

5月底，欧阳镇从谭安猷那里得到《解放军入城政策》、《土地法大纲》、《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关于工商业政策》以及《敬告全县人民书》、《解放之声》等资料，立即翻印，散发出去，稳定南岳镇工商界人士的情绪。

6月，国师教授疏散，南岳大学预修班停办。党小组认为必须要有一种更公开更便于团结广大青年的群众组织，领导南岳地区的民主运动。欧阳镇将这些想法向县工委谭安猷作了汇报。谭安猷认为党小组的想法和作法，切合实际，并提出要立即组织“南岳各界青年学生联合会”。欧阳镇回到“明明楼”召开了党小组会，分头下到枚桥等地，发动组织青年来南岳关帝殿，参加“南岳各界青年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6月6日各地青年学生，如肖文淼、谭笃信、文庚成、成月韶、杨如晋、刘吉才、李芳、袁镇炳等60余人到会，推举大学毕业、倾向进步的谭孚惠为主席，谭玉明为副主席兼宣传委员，旷炳为组织委员，谭树春为联络委员。会后，把拟好的十条标语、口号带回去秘密张贴、散发。其内容是：（1）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2）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派。（3）湖南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4）欢迎白军官兵起义。（5）湖南是湖南人民的湖南。（6）放下屠刀，立即成佛；负隅顽抗，死路一条。（7）白崇禧滚出湖南。（8）大家行动起来，保护南岳的文物古迹。（9）中国共产党万岁。（10）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最后，分别布置青年中的积极分子搞社会调查。

此外，董建华5月在南岳入党后，欧阳镇按区工委的意见，派董回乡。董于5月22日返回离南岳100余里的衡山高湖

地区开展工作。董建华回到高湖老家，遵照南岳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建立了“人民工作队”，董建华任队长。“人民工作队”由谭章生、黄志雄等8名进步青年组成，谭章生在社会调查、发动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宣传和组织农民抗丁、抗粮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董从南岳带去的革命宣传学习资料，部分翻印成传单，在群众中暗地传阅，对安定民心，孤立和打击敌人起了重要作用。董建华依靠群众，接管了公办杨林中心小学，并被推选为该校校长。中共衡山县工委书记刘东安与南下工作团，在石湾会师，成立了衡山县人民政府。董建华于8月18日奉刘东安之命，赶赴石湾，将自己从南岳返回高湖后的全部工作情况和工作队员名单向刘东安作了详细汇报。刘东安在听取了汇报之后，对高湖地区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勉励董重回高湖，把学校办好，主动协助中共草市区委会和区人民政府开展工作。

二、护校、护路、护仓库、护文物古迹

南岳不但中小学多，而且有国立师范学院，成为学运、护校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1949年7月中旬，平江、岳阳、浏阳相继解放，逼近长沙。华中长官公署溃退衡阳，鲁道源兵团重兵驻防南岳，形势日趋紧张。这时南岳地下党接到上级指示，说程潜、陈明仁有可能和平起义，要特别加强护厂、护路、护校斗争，警惕白军溃退时的屠杀和破坏。

为确保学校安全，各校成立了应变委员会。国师以校警班为基础，成立了治安大队，地下党员刘鸿藻被选为队长，组织学生日夜巡逻警戒。南岳各界学生联合会，串联各中、小学组织治安联防，一旦有事，鸣锣为号，互相支援。岳云中学护校发生经济困难，爱国老人、老教育家、校长何炳麟拿出自己的怀表和过冬的毛衣袍出当，得来的钱，全部交护校委员会作济

急之用，并督促财会人员筹措粮款，使护校工作得以坚持到底。南岳学运如火如荼，有效声援了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和沉重打击了左大凌在南岳制造的反共气势。

1949年7月，白崇禧指示鲁道源兵团，在衡阳、宝庆一带布防，国民党四十七军驻衡山、南岳一线，企图负隅顽抗，孤注一掷，形势十分紧急。欧阳镇根据县工委第一次会议决定，7月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泅水铁桥、公路桥梁，保护仓库、保护南岳的文物古迹。

党支部认真研究了保护妥归庵（南岳粮仓）万担粮仓库问题，决定组织青年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巡逻，同时对仓库管理人员进行了争取教育工作，要求他们对南岳老百姓的利益负责，并对仓库主任唐焱生，做了大量工作，要他靠拢人民，为人民做好事。其子唐震华是南岳学联会员，又同旷炯、欧阳镇感情较深，要唐劝其父为人民立功，结果达到了保护粮仓安全的目的。与此同时，还组织群众保护了镇月乡等大仓库和各保积谷仓的安全。

南岳是“文明奥区”，文物甚多。党支部专门研究布置了保护文物的工作。佛、道僧尼、信士、居民，在进步青年的协助下，严密监视敌人对文物的破坏活动，对道家的几尊微像金道君塑像，监护责任落实到人。党小组又张贴了标语，散发传单，号召各界军民，不分政治派别，凡是具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都有保护文化、古物的责任。我们的标语、传单张贴散发出去，获得了广大人民的赞誉和拥护。为确护大庙文物安全，欧阳镇向进步青年旷光辉等布置，要求组织监护的同学尹国学、道人李缘真等严密监视和保护寿宁宫等寺观的珍贵文物，受到了人民的好评。

三、粉碎敌人的“围剿”

1949年8月，“南岳反共纵队”国民党五十八军残部，加紧反共宣传，散布谣言，使群众对解放军心存疑虑。显然要在军事上粉碎敌人“围剿”，必须向部队、社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大力印刷与散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致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同时，从南岳党支传来长沙和平解放的消息，通过司令部部署各大队进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灭了敌人的威风，鼓舞了部队的士气。还在水桐皂、店门前、轿神垵等地要道上张贴标语，内容有：热烈欢呼长沙和平解放；坚决支持程潜、陈明仁两位将军和平通电；热烈欢迎湘军弃暗投明；赶走白崇禧，解放全湖南；左大凌滚出南岳；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

1949年8月初，“反共救国军南岳纵队”司令左大凌在南岳成立最后一届衡山县政府，自兼县长，康庆耕受编为南岳反共纵队第三支队，任支队司令，驻守印山与左大凌相照应，夹却增加了对刘超部队的戒备，时刻严防敌人对刘部实行南北进攻。

8月间，刘超部队在水桐皂整训，敌人妄图利用桐吓和诱降手段来收买瓦解这支走向革命的队伍。一天，衡山特工组长欧阳俊窜到刘超部诱降、“招安”，相约在菩提冲谭季远会家面。谭耀金约旷炯暗带两名武装便衣前去。

旷炯、谭耀金到达致远家，欧阳俊先发制人，启齿讲话：“贵部蛰伏深山已久，诸多不便，恐怕穿的、用的都成了问题吧！这样下去，时间长了，天气冷了，怎么过啊，哈哈！还不如把贵部全部官兵，带到郴州去与国军合作；况且，国军反攻在即，共军在湖南是站不住脚的。”继而又企图用封官许愿的卑劣手段，进行诱降，胡说“只要贵部到了郴州，番号国军

给，给养、衣服、武器弹药全由政府供应，兵源也由政府补充，当官的还可逐级甚至越级提升……”旷炯听不下去了，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制止了欧阳俊的胡言乱语，历数了国民党统治中国人民20多年来祸国殃民早被中国人民唾弃，其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必然覆灭的事实和道理。又说：“你们现已走投无路，不早日放下屠刀，投向人民，争取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反而继续与人民为敌，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欧阳俊！你如能主动弃暗投明，我们不仅欢迎，还可以给出路，你如果自甘灭亡，走上死路，我们也不勉强！”旷炯见特务毫无动静，大喊一声：“来人！”两个便衣武装人员，应声而入。欧阳俊见势不妙，仓惶向谭耀金打个招呼，溜走了。

在八、九两个月中，与国民党五十七军、左大凌“南岳反共纵队”，除多次小接触外，曾在印子山、大茶园、芋头冲、大武岭进行过三次较大的战斗。由于掌握了敌人的活动情况，更利用地形等优势，敌人的“围剿”不是扑空就是遭粉碎。

8月底，反共纵队配合国民党五十八军上山打劫、“清剿”，深夜在水桐皂山脚几个村庄，劫走猪、牛等及其财物，在返回途中进入了伏击圈，突然枪声四起，打死敌人两名，敌军只得丢下尸体和抢来的什物抱头鼠窜而去。当解放大军南下衡宝之际，10月6日凌晨，左大凌反共纵队伙同国民党五十八军残部向衡阳方向溃逃，妄图顺手一举吃掉刘超部队。敌分兵两路：一路由泮水岭上，一路从锯节坳插入，左右夹击刘超驻水桐皂的部队。由锯节坳情报员谭大发先行送来情报，深夜转移，部队撤出水桐皂，化被动为主动，化整为零，从司令部领导到一般人员，分到大队加强指挥和参战，把主力特务大队、第一大队布防在敌军退却必经之地的黄泥大坳左侧倒洞、红花峰一带，我军第二、第三大队埋伏在泮水岭灌木丛中。敌人找不到目标，慌忙用机枪反扑，用六〇炮袭击水桐皂竹山。扑空的敌人

垂头丧气向黄泥大坳的山道退却时，遇到了从竹林中伸出的火舌，刘超、旷炯等防守高地，居高临下，击败了敌人的进攻，打死打伤多人，其中有连、排长各一人，缴获了一些枪枝弹药，经过教育，按照我党宽待俘虏的政策，愿者留下，不愿者给路费释放，约一个半小时的激战，敌军的“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9月中旬，左大凌得知刘超部队第二次上水桐皂，派重兵袭击，妄图包围剿灭。敌人的布署，刘超部早已掌握，作了充分的准备，集中兵力，将战斗力较强的特务大队扼守上茶园的要道口，迎击薄弱的小股敌人，获得了胜利，其他两个大队埋伏远近山头，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战斗一打响，余敌陷入困境，乱不成军，慌忙撤退了。

刘超部队于10月6日下午9点到达南岳镇上，当先头部队抵达东街祝圣寺时，遭到了南岳特种警察所的抵抗，到晚上9点多，用轻机枪封锁祝圣寺前门扫射一阵之后，派20名尖兵冲入，警察被压缩在殿内一角，吓得蜷缩一团，举手投降，缴了枪枝。

刘超部队在消灭警察中队后，上街游行，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居民听到口号声、歌声、欢呼声，开门迎接，鞭炮齐鸣。南岳！古老的南岳，也是国民党在衡山的最后据点，终于在10月5日获得了新生！

6日晚10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四一三团到达南岳东街外东操坪，便派人叫镇长康铭去东操坪。这时，欧阳镇、旷炯、刘超、谭耀金等人立即去东操坪迎接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四一三团段政委、衡山县政府县长高怀亨、中共衡山县工委书记刘东安及谭安猷等人一起开会研究后，亲切接见和抚慰了刘超等人，肯定了他们识时务投向革命的正义行动。

刘超随即奉命带领部队移驻南岳汽车站附近，让解放军进驻南岳镇。当晚，解放军和南下工作团几位负责同志进驻祝圣寺。

刘超部队按照指示，移驻汽车站石庄、罗家大屋、阳家大屋，接受四一三团的整训改编。整训由四一三团政治处主任石岩负责，派出一名连指导员和五名干事做政治工作。石岩同志指示旷炯在整训中协助思想教育，做好清点人枪工作，保证人枪不得散失。通过10多天的学习，造具人、枪清册，大部分编入四一三团，一部分到地方工作，另一部分到衡阳军分区学习，极少数人资遣回乡。

刘超部队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举行起义，是经过我们党地下策反工作人员，在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指导下，在衡山县工委的具体领导下，依靠群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而取得的。

我在解放前的一段革命经历

谭一天·

1949年4月中旬，我从衡山道南中学回到衡山县城，结识了中共衡山县工委书记刘东安同志。刘东安系石湾黄桑乡人，中山大学毕业，受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之命，于1948年2月回衡山县开展地下工作，在县中任英文、音乐教员。在公开场合，他很少发表政见，但城府在胸，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喜欢他。我到衡山县城的第二天，拜访了刘东安老师。向他倾诉了过去的遭遇和在道南的情况和这次回来的任务。他聚精会神地倾听，最后说：“你的情况，我早就听朋友说过，在道南的情况，也知道一些，你想和县里发生联系，好嘛！舍远就近，有利工作。你写份申请和自传来吧！”当天，我就写了申请书和自传，后经衡山县工委批准，由刘东安、谭安猷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月21日晚饭后，刘东安约我到枇杷洲散步。他说：“草市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与几县交界，情况复杂，敌伪势力强大。你是当地人，群众基础好，有许多要好的同学，相信你能打开局面，开辟新区，做出成绩。”分手时，他给我一份社会调查提纲，交代了今后联系的方法。

5月下旬，组织通知我去踏庄康家大屋汇报。去前，我把同志们的自传、申请书放在一起，用厚纸包好，捆成一卷，各

·谭一天，当时系中共地下党员。

种社会调查材料包成一捆，放在竹篮子里，上面放一层糠，糠上再摆两层鸡蛋，装扮成“走亲戚”的。

接待我的陈宁坤、陈绍夫对我说：“一天，刘东安同志不能来，你有什么事，我代你传达。他有一捆资料，要我带给你，你有什么东西，我帮你转给他。”最后他说：“刘老师要你与我在城南办个补习班，具体时间决定之后，再写信给你。我说：“我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6月初，我收到陈宁坤的来信，要我于15日前赴县城。12日掌灯时分，宁坤陪同刘东安同志来到我的住处。

我与东安同志面对面地坐着，倒了一杯开水给他，问道：“托宁坤带给您的东西，收到了吗？”东安同志欣然回道：“收到了，全看了。我们同意接收谭鸿钧、刘纯一、谭峙等10来个同志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地下团）会员，同意你建立的‘大众社’为党的外围组织。草市的工作，进展很快，方法对头，成效显著，我们满意。”我说：“我们的工作，离党的要求还很远，请上级多指示指示！”

接着，把前段工作，向他作了详细的汇报。这次我交呈的材料有：《敌伪军警人员、枪枝、弹药调查表》、部分保《人口、土地清册》、部分《迷信公堂祠产清册》、几个同志的自传和几期《大众活报》。他根据我汇报的情况，作了详细指示。最后说：“这次调你进县城，以教书为掩护，主要是增强力量，开展青运工作。有困难吗？”我说：“会有困难，但能克服。”他说：“是的，工作会有困难，望你迎难而上……”说完后，从从容容地从裤袋里掏出一本《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给我，并要我和宁坤同志好好学学。

衡山城里，敌兵巡逻，日夜不断，恐怖气氛笼罩县城。

由于我的活动频繁，已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我发觉有人在跟踪我。25日晚上，东安同志突然来到我的住处。他镇定地对

我说：“一天同志！为了工作的需要，你明天就回草市去，这里的课先由宁坤暂代，以后另找别人接替！”

26日提前早饭后，我离开了城南小学，向草市进发。我在城南小学虽只有半月时间，但有一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东安同志与我的两次长谈，使我懂得了不少以前不懂的东西，学会了过去不会的本领。通过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使我增强了革命自觉性，也提高了我的政策水平。

8月8日，洙北，即湘江以东、洙河以北宣告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一三七师沿水布防，师部驻扎在珍珠乡富塘村罗家大屋。15日解放军已进驻攸县，攸县成了衡阳地委、衡阳军分区所在地。此时，洙南的草市一带还未解放，我们的地下工作仍紧张地进行。

9月12日，我接到了刘东安同志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要我速去石湾，并将一些材料带去，家中工作，委人暂管。

阅信后，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我和谭鸿钧、刘纯一3人去石湾，家中工作由谭峙负责。

9月14日，我们带着有关资料从梅子洲出发前往石湾。走到离鱼形南湾不远处，忽然前面枪声大作。情况有异，我们3人立即停步，打算弄清情况后再走。这时，有个人慌慌张张地向我们迎面走来。我们忙问：“前面出了什么事？”他说：

“听说是土匪围住了鱼形大屋，要活捉共产党！”他问我们到哪里去，我告诉他去石湾。他叮嘱我们莫走大路，并指点我们绕道而行。我们按照他的指点，绕开鱼形大屋向石湾方向走去。当天下午，我们平安地到达了石湾。解放了的石湾，是当时衡山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到处贴满了革命标语，贴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我们找到了刘东安同志，我把谭鸿钧、刘纯一介绍给他。东安笑着说：“我们神交已久。好久就想看

到你们，由于客观上的原因，今天才如愿以偿！”

东安同志又把谭安猷同志介绍给我们。谭安猷同志虽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但由于一个在南岳，一个在草市，相距百里，再加上地下工作纪律的约束，我们也还是头次见面哩！

晚饭后，刘东安同志来到了我的住处，告我：“县委决定，则你到地方干部训练班学习，学完后，即去工作。谭鸿钧刘纯一两同志，仍回原地，协助区里工作一个时期，以后再行安排。”

就这样我进了衡山县第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学习。干训班亦在石湾街上，负责人是谭安猷、牛占耀两同志。后期，杜春林同志也到干训班来工作。干训班于9月17日开学，学习时间10多天，学员只有40多人。其中有10位女同志，是代解放军一三七师培训的，一结业，她们都回部队去了。我和熊清泉、刘鸿藻、刘欣森、谭秉颐等同志，既是学员、又是干部。

此时，解放军从安仁插到衡阳近郊，迫使白崇禧不得不收缩阵地。原布在涑水南岸的国民党部队，一夜之间，不战而退。

10月6日凌晨，驻守在涑水北岸的解放军全面向南进攻，追击溃逃之敌。草市、杨林、南湾全部获得解放。同一天，衡山县城关和江北衡山属地也全部获得解放。当天晚上，我们在茶石乡李紫汉家举行了联欢会。大家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熊清泉同志一边热情奔放地扭着秧歌舞，一边唱起了长沙民歌《一根竹竿容易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0月7日，我们随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道从石湾进驻衡山县城。干训班学员驻在文庙——我的母校衡山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

县里开办第二期干训班时，我留班担任生活大队长，负责管理学员的生活。参加学习的有好几百人。办第三期干训班

时，组织上派我到县立中学担任教导员和“政常”老师，配合团县委派到学校搞公开建团试点的李衡嵩、刘萍同志，在师生中发展团员。

不久，刘东安同志找我谈话，他说：“在办第四期干训班时，准备调一批同志到干训班当骨干，草市地下团员（即“新建协”成员）中有哪些堪当此任。”我说：“草市地下团员都是‘大众社’的骨干，是草市地下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都有一定的领导经验，都可以调来当骨干，至于调谁来，则请组织决定。”

不久，谭鸿钧、刘纯一、谭峙3人被调到衡山县第四期地方干部训练班担任学习小组长。

当太阳照耀草市大地、衡山大地的时候，草市的地下工作者和革命青年，都先后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为解放华南、解放西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秦汉 整理）

告别故土 奔赴新区

——数千冀南干部南下湖南纪实

赵 畅*

1949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解放全国的伟大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即将全面崩溃。为迎接这一新形势的到来，根据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1948年底至1949年初，冀南区党委决定组织一个区党委、6个地委、30个县委、200个区委共4000多人（其中干部3500多人，勤杂人员500多人）的队伍随军南下，到将要解放的新区进行接管工作，以巩固新区，支援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夺取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进行思想发动 积极报名南下

1948年冬，冀南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组织部长会议，部署组织大批干部南下的工作。地委书记、组织部长会议结束后，各地委又召开了有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参加的会议，具体落实组织干部南下的任务。为了迅速和根好地完成组织干部南下这一任务，1949年春节前夕，县委先后召开了区委书记和全县干部大会进行动员。会上，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①讲清当前形势和组织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的伟大战略意

*赵畅，南下干部，现任省政协委员。

义，②讲清这次是成建制的组织干部南下，原则是现有的县、区干部二分之一的南下，二分之一的留下坚持工作，并动员组织一批勤杂人员随同干部南下；③发动组织干部南下的方法，是在学习讨论上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实行自愿报名和组织批准相结合；④根据当时干部对南方情况生疏和“宁向北走三千，不向南移一砖”的传统习惯思想，进行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号召干部个人服从组织，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经过发动和讨论，干部情绪十分高涨，参加会议的干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积极报名南下。我所在的冀南二地委夏津县十个区的区委书记、区长、建国会（抗联）主任和县委、县政府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踊跃报名南下。我当时是夏津县五区区委书记，这个区参加会议的26名干部，有25人报名南下，只有副区长王振升同志，因当时已有50多岁且身体多病，在我的劝阻下才没有报名南下。三天的干部大会圆满地完成了地委下达的南下干部任务。会后县委决定各区干部回区愉快地过春节，做好南下的准备。县委和区委书记留县继续开会，根据地委分配的南下干部名额，结合干部的具体条件和组成南下县、区班子的需要，确定南下干部的具体名单。为了保证干部质量和加强领导，县委书记、县长和区委书记、区长都定为南下县、区建制的主要领导成员。

1949年春节刚过，已确定的南下干部于2月中旬集中到县。经地委批准，迅速建立了南下县、区和县委、县政府的部科局领导班子。地委南下的领导班子，经冀南区党委批准也很快地建立起来了。

威县集中学习 完成南下新建制

1949年3月初，冀南全区南下人员，根据区党委的决定，以地委为单位步行到区党委所在地威县城东方家营一带村庄，

进行整编，参加学习和军事训练。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冀南南下区党委组建六个地委，每个地委组建5个县委，每个县委组建6至7个区委的建制。

冀南南下区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乔晓光、组织部长郭森、宣传部长高元贵、秘书长韩宁夫。

冀南区党委在原有的临清、夏津、肥乡、南宫、衡水五个地委，各抽出一个县的建制组建六地委南下。区党委确定从直属机关和各地委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六地委机关，从五个地委各调一个县或建制的干部队伍组成六地委五个县的建制。由临清地委的冠县、夏津地委的高唐县、肥乡地委的大名、广平、鸡泽三个县组成一个县的建制。南宫地委的威县，衡水地委的任县、冀县组成一个县的建制归属新组建的六地委领导。

冀南南下组建后的6个地委的主要领导成员：

一地委（临清）书记郭清文、副书记杨新一、专员梁向明

二地委（夏津）书记周惠、专员赵墨轩

三地委（肥乡）书记朱效成、专员袁崇德

四地委（南宫）书记柴保中、专员孙云英

五地委（衡水）书记陈登昆、专员张海峰

六地委（新建）书记王含馥、副书记王浩、专员李夫泉

冀南南下区党委决定，南下干部在南下途中实行军事化的建制，南下区党委称为南下支队，地委为大队，县为中队，区和县直属机关的部科局为班，原则上以一个区为一个班。大队长由专员担任，政委由地委书记担任，中队长由县长担任，指导员由县委书记担任，班长由县部科局和区的主要领导同志担任。每个大队所属5个县编为5个中队，地直机关编为一个中队。冀南南下支队按照6个地委的顺序，编为冀南南下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大队。1949年3月初至4月初，南下

干部在威县方家营驻地进行了军事训练和防空演习。学习和生活都是军事化，工作和学习安排得很紧，但广大南下干部和随同人员情绪都十分高涨。1949年3月29日上午，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在方家营镇西头广场举行了欢送南下干部的大会，南下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和冀南区党委宣传部长薛迅同志、冀南行署副主任范若一同志，分别代表冀南南下区党委、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讲了话，对南下干部和随同人员给予了很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到新解放区完成接管任务的信心。欢送大会后，所有南下人员积极做好南下行军的思想 和 物资准备，为胜利完成南下行军奠定了基础。

告别故土 步行到开封

1949年4月初，4000多人的南下大军，在冀南南下区党委的统一指挥下，以大队为单位从方家营驻地，先后于4月3日、4日开始向南出发，轻装步行，每个人的行装不得超过20市斤，每天行程60至80华里。在行军中有的同志脚上打了水泡，但没有一人叫苦，而当看到有些女同志走不动时，都争着为她们背行李，发扬了艰苦奋斗和互助友爱的精神。4月的北方气候还比较冷，为了防备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我们不得不选择凌晨前渡过黄河。记得4月11日凌晨4点多钟，我们顶着寒风，在濮阳以南，分批乘坐木船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黄河。为了照顾大家的休息，在黄河以南的东明县城休整了两天，于4月14日到达河南省的兰封县城，从兰封火车站乘坐火车于15日到达河南省会古城开封。我们大多数人是第一次坐火车，虽然是货车车厢，而且没有坐位都是站着，但每个人都是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心情。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行军，于4月中旬先后到达党委指定的河南省开封以南的附近村庄驻地。

到达驻地后，冀南南下区党委组织全体干部学习讨论了毛

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以及党对新解放区的方针政策，以提高南下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冀南南下干部原确定去江苏、浙江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5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改为一部分去湖北，大部分去湖南进行接管工作。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除向广大干部和其他人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外，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冀南南下的六个地委中，冀南南下的第五地委原建制的全体干部和区党委机关以及六地委的一部分人员共600多人，由王任重、高元贵、韩宁夫以及韩克华、苏钢等同志带领到湖北省新解放区工作。冀南南下的一、二、三、四、六五个地委共有干部勤杂人员3400多人，由乔晓光、郭森同志带领到即将解放的湖南省进行接管工作。由于武汉和湖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时已获解放，去湖北的干部于5月下旬和6月初离开了河南。去湖南的干部，继续留在河南驻地学习、待命。

进行组织调整 挺进湖南接管湘西北

1949年5月下旬至6月初，确定到湖南的五个地委，根据华中局和湖南南下省委的指示，在组织和建制上进行了整编和调整。确定组成两个地委的建制，待湖南解放后，分别接管常德和益阳两个地区，并抽调一个县的建制到湖南省邵阳地区工作。以二、四地委为基础和三、六地委的一部分干部组成常德地委；以一地委为基础和三、六地委的另一部分干部组成益阳地委。两个地委对所属南下的各县建制，也进行了适当调整和整编。

调整后的常德地委主要领导成员：地委书记乔晓光、组织部长柴保中（南下四地委书记）、副部长王东才（南下六地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后任办公室主任王浩（南下六地委副书记）、民运部长赵长春（南下二地委秘书长）、社会部长赵

正，专员王含馥（南下六地委书记）、副专员孙云英（南下四专署专员）；分区司令员田厚义、政委由乔晓光同志兼任。

调整后的益阳地委主要领导成员：地委书记开始为朱效成，6月下旬到达武汉后朱效成同志调支前司令部工作，由冀南南下二地委书记周惠同志任地委书记，副书记兼专员郭清文（南下一地委书记）、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杨新一、宣传部长秦雨屏、社会部长杜一夫（南下二地委社会部长）、地委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万达（南下三地委宣传部长）。专员郭清文、副专员孟信甫（南下五专署副专员）。分区司令员黄林，南下一分区司令员孙洪同志改任分区副政委，政委由周惠同志兼任。

经过整编和学习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并进一步提高和稳定了南下人员的情绪。1949年6月中旬，南下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干部和勤杂人员1900多人，由开封乘火车经蚌埠、南下至芜湖，从芜湖乘船沿长江向西航行。虽然南方的天气炎热，又有敌人的飞机干扰，但南下人员的情绪十分饱满。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南下常德地区的所有干部和人员，成建制的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先后进入被接管的县、市开展工作。常德地委、专署、分区机关共240多人（由南下二、四地委机关和广宗县南下人员组成）于1949年7月下旬进驻常德市。紧接着由地委委员、市委书记兼市长赵墨轩（南下二专署专员）、副书记董峰、牛迪义带领170多名南下人员（由二、四地委各县南下人员抽调组成）于1949年8月4日到达常德市；由县委书记霍俊峰、县长张勇带领冀南南下四地委的宁南、新河、柏乡、隆尧4个县的217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6日到达常德县；由县委书记卢青云（南下二地委宣传部长）、县长李铁峰带领冀南南下二地委的夏津、六地委的高唐两县的142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12日到达桃源县；由县委书记杨子云、副书记雷隆、县长丁少之带

领冀南南下六地委的任县、冀县、平乡三县14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5日到达临澧县；由县委书记张黎民、县长康日新带领冀南南下三地委的大名、鸡泽、广平三个县的142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3日到达石门县；由县委书记郭毅、县长杜梅森带领冀南南下四地委的巨鹿、南和两县的123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9日到达慈利县；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赵立春（南下二地委委员、分区政治部主任）、县长李志刚带领冀南南下二地委的清河、武城两县的183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2日到达澧县；由地委委员、市委书记兼市长栗汇川、副书记肖寒、副市长郝光华带领冀南南下六地委的威县141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3日到达津市；由县委副书记徐敬民（主持工作）、县长郝义武带领冀南南下二地委的故城、武城两县的141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8日到达安乡县；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纪照青（冀南南下二地委委员、组织部长）、县长石新山带领冀南南下二地委的恩县、平原、武城三县的15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15日到达南县；由县委书记史伦、县长赵吉甫带领冀南南下四地委的南宮县129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17日到达华容县。

去益阳和邵阳地区的南下人员，于1949年6月中旬，从开封乘火车到达武汉，住在汉阳进行学习和休整。在武汉一个多月的时间，除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进一步对湖南的情况做了了解。在我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胜利形势威逼下，国民党将领程潜、陈明仁率领官兵，于1949年8月4日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实现了湖南的和平解放。我们南下益阳地区的干部、勤杂人员1160多人（由冀南南下一地委机关和三、六地委机关人员组成），在地委统一安排指挥下，于1949年8月9日从武汉分乘6艘轮船（当时铁路被国民党破坏已中断）沿长江经洞庭湖和资江，经过6个日夜的航行，于1949年8月14日下午到达地

委、专署、分区所在地的益阳县城（1950年后改为市），受到了益阳地下党同志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地委和专署机关住在益阳县城学门口的国民党党部和国民党的督察专员公署住地，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住在益阳县城大码头对面一个大祠堂里边。到益阳地区各县的南下人员，除接管益阳县的南下人员住在国民党县政府和对面教堂内，其余五个县的南下人员分别住在豫章中学和一些祠堂之内。

我们到达益阳之后，立即组织了地下党同志，向南下干部介绍情况，以便做好接管工作和开展新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经益阳地委安排工作之后，去益阳地区各县南下人员，在各县主要领导同志带领下，于1949年8月下旬先后到达所在的县、区开展工作。由县委书记刘洪源（南下一分区政治部主任）、副书记崔强、县长宋子兴带领冀南南下六地委的冠县、

一地委的邱县、莘县三县的140余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28日到达湘乡县；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梁向明（南下一专署专员）、县长刘亚南带领冀南南下三地委机关一部分同志和永年以及一地委临清市的14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下旬到达汉寿县；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李瑞山、县长张继元带领冀南南下一地委的元朝、馆陶、莘县、邱县四个县的157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25日到达宁乡县；由地委委员、县委书记李哲（南下一地委组织部长）、县长候鸿业带领冀南南下一地委的清平、临清、莘县三个县的15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下旬到达沅江县；由县委书记王俊臣、县长曹广成带领冀南南下一地委的武训（堂邑县）、馆陶两县的19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30日到达安化县；由县委书记张力耕、副书记孔空、县长董早冬带领冀南南下三地委的曲周、魏县两县的144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18日进入益阳县开展工作。

由冀南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郭森同志带领区党委机关的一

部分同志10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中旬到达长沙，郭森同志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其他人员分配到省委机关和省直单位工作；由冀南南下第六地委社会部长、地委委员白连成、第六地委的县委书记尹之席带领冀南南下三地委的成磁、肥乡两个县150多名南下人员，于1949年8月中旬到达长沙，10月到达邵阳。白连成同志任邵阳地委委员、组织部长。由县委书记尹之席同志带150多名南下人员于10月下旬到达邵阳地区的新化县工作。

1949年6月间，当我们离开河南向湖南挺进时，冀南南下区党委考虑到女同志的特殊情况，考虑到新区还有发生战争的情况，决定将南下的女干部编成两个中队，留在河南学习待命。当常德、益阳两地区接管工作基本就绪之后，女干部才由冀南南下二地委妇联主任刘英同志带领，于1949年11月到达益阳地委所在地，并由各县派人接到各自分配的工作单位。

接管建政 积极开展新区工作

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省委的统一部署，我们南下人员在完成接管工作之后，迅速开展了以下五项工作。

第一、在进入新区之后，立即对国民党的旧政权进行了接管，并彻底解散了国民党的一切反动组织，迅速建立起县、区新的政权和党的组织，以领导各项工作的进行。由于湖南是和平解放，接管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对旧政府和国民党的工作人员，按照政策进行了安置。在这同时，我们以南下县、区的建制为基础，吸收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参加，很快地建立起县、区委党的组织和县、区人民政府。这对稳定新解放区的社会秩序和开展各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进行剿匪，肃清国民党的残余匪特武装，以巩固新的解放区，利于解放军乘胜南进，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略

任务。

第三、利用旧的保甲制度和发动群众相结合，开展借征粮食工作。主要是向大户（即地主、富农）进行借征粮食，以保证解放军向南和大西南进军的需要。

第四、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开展宣传发动群众工作。根据当时南下干部每个区只有15人左右，再加上县机关各机构也需要大量的业务人员。只靠数量不多的南下干部，是远远不够的，何况又有语言上的困难。因此，急需动员吸收在城乡的知识青年参加工作。根据这一情况，益阳地委在到益阳不久，于1949年9月举办了益阳干部学校。由地委书记周惠同志兼任校长，由南下的临清县委书记张风彩同志任专职副校长，并从地委机关抽调几个科长去益干校担任班主任，以加强对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地下党同志的积极协助下，很快地招进中学文化以上程度的青年学生1000多名，经过一个多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理论政策教育，被分配到县、区工作。培养这批干部，对加强基层工作，宣传党的政策，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特别是对推动当时的借征粮食、剿匪、肃清国民党的残余武装等工作，都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青年干部本身也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增长了组织能力。不少同志很快地担任了县的科局和区的领导骨干，为深入开展新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1950年初开展发动群众，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政权、乡农会的工作。依靠新建立的乡政权和乡农会，经过试点，普遍开展了减租退押和反霸斗争。把恶霸地主退出的稻谷很快分给了贫下中农，解决了青黄不接的粮荒问题，大大调动了贫下中农翻身求解放的积极性。主动参加废除保甲制度，民主选举人民的乡长，并纷纷要求建立农会、妇女会群众组织，为1950年秋冬进行土地改革打下坚实的

群众基础。

· 突击借征粮食稳定新区 支援大军胜利前进

我们进入益阳地区之后，人民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迅速扩大到国民党反动派所盘据的地区。人民解放军二野、四野主力部队，经湖南向两广和云、贵、川挺进。为了支援大军顺利南下，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地方必须及时保证对过境部队的粮食供应。新区工作千头万绪，我们把完成借征粮食保证支前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同时，还要解决国家工作人员、地方武装以及城镇职工、居民的吃饭问题，促进工厂开工、学校开学、商店营业，以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流通。因此，保证粮食供应，已成为当时巩固政权、支援野战部队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政治任务。

为了取得借征粮食的工作经验，益阳地区从直属机关抽调部分强有力的干部组成工作队，首先在宁乡、益阳两县试点。地委副书记兼专员郭清文带领工作队到宁乡县四区，地委副书记杨新一、秘书长万达带领工作队分别在益阳县五区的新市渡和邓石桥开展借征粮食的试点工作。这几个试点，在地下党同志的有力配合下，仅十天的时间便完成了借征粮食的任务。通过试点工作，及时总结出了在新解放区开展借征粮食工作的经验：

第一，通过地下党和新参加工作的地方干部，了解当地阶级斗争和群众思想动态，风俗习惯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深入发动群众。首先发动一些比较开明的大户，带头交够借征粮食，打开突破口。益阳五区新市渡十保稻子坪一户姓贾的大户，经过反复工作，一次交出20石稻谷。抓住这一事例，广泛宣传交待政策，推动了这一片借征粮食任务的迅速完成。第二，利用原有的保甲长和发动群众评议相结合。对保甲

长讲清能否很好地完成借征粮食任务，是使他们能否取得群众谅解的考验，对犯有罪行的保甲长，号召他们在借征粮食工作中戴罪立功。这些保甲长在党的政策感召和群众监督双管齐下的情况下，都基本能老老实实帮助工作队完成借征粮食任务。第三，我们刚进入新区，在新的田赋册未建立起来之前，以原有田赋册为基础，定出借征粮食数字。凡粮册上有名而实际上已无田地者不借；对贫苦农民，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少借征或免借征；对大户重点是屯积粮食的太户多借征。第四，在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地方，由工作队依靠地下党的同志，发动贫苦农民群众进行评议，定出粮食借征数字，然后发榜公布。如我们在益阳五区稻子坪、邓石桥两个试点，因有解放前地下党的工作基础，又有地下党员张志远、刘梦天、秦雨华等同志参加，评议借征粮食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

地委把借征粮食试点工作的经验在全区推广之后，1949年9月中旬借征粮食工作在益阳地区全面铺开。由于政策合理，受到各阶层大多数人的拥护。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推动下，经过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的努力，益阳地区终于提前完成省委交给的借征粮食任务，及时为过境向华南、西南进军的二野、四野主力部队，提供了数百万斤大米的给养。由于城镇大米的供应也有了保证，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借征粮食工作期间，地委领导周惠、郭清文、杨新一、万达同志等日以继夜地工作，每晚深夜听取办公室关于借征粮食进度情况的汇报。周惠、万达同志还亲自动手核对数字，并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办公室的同志根据地委领导的意见，整理成文字，经万达同志审阅后，连夜分头用电话通知各县的领导。工作紧张艰苦，有时是通宵不眠。1949年9月下旬，省委金明、周小舟、周礼、郭森等领导同志来益阳地委检查工作，对益阳地区提前完成借征粮食任务给予了赞扬，并肯定了我们的成绩和经

验，使大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渡过艰难岁月 迎来全国胜利

冀南南下干部从家乡出发，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行程三千里，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号召下，在冀南南下区党委和湖南省委的正确领导下，于1949年8月进入湖南的湘西北，发扬了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克服了南下征途和进入新区后的重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新区工作走上了轨道。在这胜利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以无限喜悦的心情与当地群众一齐走上大街，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1949年12月7日夜晩，国民党反动派100多人的残匪武装袭击了常德地区桃源县八区（桃花源区）区委、区政府，有15名工作人员被杀害。冀南二地委夏津南下到桃源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杨庚时、八区区委书记张秀江、区长滕万昌、区武委会主任李印广等9名南下同志壮烈牺牲，有两名南下同志负伤。1950年2月8日，残留在安化县的300余人的武装匪徒，袭击了益阳地区安化县六区（东坪区）区委、区政府，9名干部和战士惨遭杀害。从冀南一地委武训县南下到安化县六区任区委书记的韩侯、区长申林等4位同志，在和敌人作战中，英勇牺牲。为革命牺牲的这些同志，当时都是20多岁的青年，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党的培养成长起来的基层骨干。另外，还有的同志在开展新区工作中，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从冀南南下的一地委副书记杨新一同志，到达湖南后，任益阳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带领一地委800多名干部到达益阳地区后，在战争还未平息的环境中，抱病到基层开展新区工作，因患脑溢血于1951年6月18日逝世，时年35岁。杨新一同志是在白色恐

怖下的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担任鲁西北地委的人民武装领导工作，在发展壮大人民武装和对敌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忆起为革命牺牲的这些南下同志，至今犹感深深的怀念和尊敬。1983年春节期间，在湖南视察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省直部委、厅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话：“北方的同志南下到湖南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当中有的为了革命事业，牺牲在湖南的土地上，现在在世的同志虽然年纪老了，仍在为党为人民工作。我是湖南人，向南下的同志表示感谢！”这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到会同志的热烈欢迎。我们南下的同志，现在大都年过花甲，虽大多数人退出了一线工作，但都还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的建设和稳定，继续做出应有的贡献。



七十年湖南统战工作述略

何醒初 唐伯国*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开展统战工作，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传统。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在湖南从事新文化运动，即反复发出“民众大联合”的呼吁，孕育了他日后统战思想的基因。此后，毛泽东在发起新民学会和从事各种革命活动中，又提出“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①这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初步萌芽。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一新。湖南是全国最早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省份之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统一战线的主张，最早见之于1922年6月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和中共“二大”《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随后，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又进一步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形式确定为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建立和维护这种合作，是当时中共统一战线的主题。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在湖南人民革命史上有着光辉一页。

湖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是林伯渠、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夏曦、何叔衡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

*何醒初，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政研室正处级研究员、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

唐伯国，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烈。他们是湖南第一批具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双重党籍的跨党党员。1923年春季，中共湘区委员会即开始贯彻执行党的西湖会议作出的指示，在省内推进国共合作。但当时，湖南省内的国民党“湘支部”，成员不过数十人，党务处于停滞状态。中共湘区委员会要在省内实现国共合作，尚须从帮助国民党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入手。

1923年4月，刘少奇、夏曦从上海接受林伯渠和国民党中央参议覃振的委托，在湘发展国民党。“展开宣传工作，并从工学两界着手组织。”②不久，长沙、宁乡及江西萍乡即建立起国民党分部，国民党员数量增加到5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产业工人和青年学生。夏季，覃振回湘活动，又带来毛泽东给李维汉的信件，要求协助开展工作。7月，李维汉、何叔衡、夏曦与覃振及在湘老国民党员邱维震商议，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筹备处。9月，经林伯渠邀请，毛泽东以国民党总部派赴湖南筹备员身份从上海回到长沙，与夏曦等“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并决定“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阳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③1924年1月，湖南国民党组织推选谭延闿、程潜、林伯渠、夏曦等11名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召开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由此走向高潮。

国民党“一大”以后，夏曦受任为国民党湖南省筹备员，负责办理党员登记和发展党务。李维汉也到衡阳、宁乡、湘潭等地巡视国民党工作，帮助建立各县党部。到1925年夏，全省已有15个县市建立起国民党地方组织，党员总数2750余人。④在此基础上，国民党湖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

在国共合作形式下成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国民党

“一大”制定的方针政策，也接受中共湘区委员会关于发动民众，组织工农、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系列决议和建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及各县市党部中，许多左派国民党员忠实遵循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与中共党员保持良好关系。

在湖南，推进国民革命的一个关键，是争取湘军将领唐生智站在广州国民政府一边。为此，夏曦等中共党员对他多方劝说动员，并在其部队中开展宣传工作，终于取得成功。1926年6月，唐生智所部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随着叶挺独立团和由广东出发的革命军源源入湘，湖南成为北伐的重要战场。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互相推动，并使湖南迅速成为全国革命形势最为高涨的省份之一。

湖南在1937年至1939年间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随着剿共军事行动停止，经历了艰难岁月的湘鄂赣和湘赣边区20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得以下山整编，加入了新四军序列，继而奔赴华东抗日战场。1937年12月，徐特立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的身份回到长沙，公开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并与湖南省政当局取得联络；随后，中共中央派遣高文华等一批干部来到长沙，整顿和加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逐步半公开地开展活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湖南正式实现。

为推动全面抗战和国共合作，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曾来湘指导工作。一度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采取抗日和团结中共的进步立场，也愿意在湖南实现国共合作。这时，还有一大批湘籍进步文化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如田汉、吕振羽、翦伯赞等回到长沙，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湖南职工抗敌后援会等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在这一阶段，举凡宣传、募捐、护理伤兵、救助难民、支援前线、动员青年应征参军等活动，无不

由共产党员通过各种救亡团体或直接配合湖南省政当局掀起高潮。

湖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又一个内容，是中共湖南省委报经中共中央同意，成立了培养抗战人才的“塘田战时讲学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老朋友、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应邀担任学院院长；以前的革命对象、这时的省临时参议会议长赵恒惕，也应邀担任了学院董事长。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主持，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并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会议认为在今后长期的抗战中，“游击战争重于正规战”。因而接受周恩来等人建议，决定国共合作，在南岳举办“以训练军官能带兵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为宗旨的游击干部训练班。1939年2月，南岳游干班正式成立，蒋介石兼主任，汤恩伯、李默庵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一批八路军高中级军官被聘为军事政官，周恩来也担任了国际问题课程的讲师。

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湖南省委在这一阶段有了一个较为良好的环境，尤其在组织方面得到迅速发展。1937年12月，全省有联系的中共党员仅200余人；1938年7月，全省党员增加到近3000人；1939年5月，全省党员5000人。但从1939年春季起，湖南国共合作转入困难阶段。4月，塘田讲学院被强行封闭。6月，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发生。1940年2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撤离，徐特立也继之离湘。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性质、内容的完整表述，应该是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提出的：“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⑤而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

反对内战，投向人民，中共中央也有许多明确指示。如1945年12月，毛泽东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提出：“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毛泽东还强调：“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④1946年7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党内指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⑤战斗在国统区的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就是根据中央上述一系列指示开展统战工作的。

1946年8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统战小组，由省工委书记周礼直接领导，开始做争取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的工作。1949年元旦前后，程潜第一次通过他的代表，向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表明了和平愿望。

中共湖南省工委统战工作的一个特点，是不仅着力于争取程潜、陈明仁，而且着力于争取他们周围的一切进步分子，争取社会各方面、各阶级中的进步力量，并将这些力量集合到推动和拥护程、陈起义的总目标上来。应当指出，当年省工委统战小组的成员是党的统战工作的模范。他们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牺牲的危险，英勇机智地出入敌人营垒，周旋于社会各界人士之间，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方法，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并且善于统筹协调其中的某些矛盾，才得以打开突破口，使党的统战政策收到成效。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湖南省工委本身，也得到上层统战关系的帮助掩护。

解放战争后期，在湖南从事争取程、陈工作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湖南总支部及其一些县市组织，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派回的人员。这两个民主党派在湘的工作人员，一方面接受各自总部领导，一方面接受中共湖南省工委领导，共同开展统战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联系，还有一些中共党员加入民主党派，成为交叉党员。当然，所有这些组织和活动，都是以极其秘密的或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的。另外，中共湖南省工委统战小组还领导建立了一些外围统战组织。统战小组通过这些组织打开了省内国民党军警特中的工作局面，使和平起义增加了助力，减少了阻力。中共湖南省工委还直接领导长沙新闻界的统战工作，将一批党员安插到各报馆，特别是与几家官方大报的领导人建立了关系，从而使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变化的许多消息，能在这些报纸上较客观、真实地报道出来。湖南地方报纸对于反映社会情况和动员社会舆论拥护和平，发挥了相当作用。湖南省参议会是国民党的御用工具，但它毕竟挂着“民意机关”招牌。省参议会正、副议长及一部分议员已受到中共政策影响，再加上当时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湘系和桂系的矛盾，就使得一些有利于和平和进步的议案得以提出或通过。湖南省参议会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支持程潜，抵制蒋介石、白崇禧的作用。在谈到湖南和平解放时，还应当提到退居在湘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唐生智等人的贡献。唐生智较早地表明了反对内战的态度，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他不仅在程潜受到白崇禧巨大压力时出来支持和平运动，而且在程、陈起义时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身份领衔响应，扩大了起义的影响。后来，他还推动了湘南一些地方势力起义，对加速湖南全境解放发生一定作用。

中共湖南省工委的统战工作收到成效，湖南全省人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表现出巨大力量，程潜和蒋、白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烈。所有这一切都为湖南实现和平创造了条件。然而，对解放湖南问题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

席的正确决策和直接关怀。

1949年2月，毛泽东在华北当面委托湘籍民主人士章士钊，向程潜转达对他走和平道路的期望。说对程潜过去一度参与内战不咎既往，只要投向人民必当受到礼遇。3月，章士钊在南京将毛泽东的期望转告给了程潜。5月上旬，毛泽东在北平会见从湖南来的李达。当听到李达转达程潜的和平意愿和正在准备起义的情况时，十分高兴，当即调派在华北解放区参加工作的前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李明灏，要他速赴武汉，参加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争取实现湖南和平解放的谈判。同时，毛泽东还请章士钊急赴香港，就近协助做程潜的工作。6月，章士钊在香港会见了程潜的代表，即转达毛泽东的殷切之情，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关于陈明仁的一段谈话：“当日，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这是理所当然。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⑧6月下旬，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乔冠华，正式会见了程潜派去的代表，听取了情况介绍，并将情况电告中央。6月2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复电乔冠华，要他们认真进行争取程潜、陈明仁的工作。随后，中央军委将中央的决定和香港方面的联系转告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6月，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派人到长沙，通过统战关系建立电台、沟通了与程潜的联系。

与中共中央代表取得正式联系，是程潜决定起义的关键。

6月下旬，程潜慎重地将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备忘录》用白绫书写，委托中共湖南省工委转递。《备忘录》明确表示：为“避免战祸”，“减少人民痛苦”，“保持本省元气”，“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⑨6月底，中共中央收到程潜《备忘录》后，作出“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7月4日，

毛泽东亲自复电程潜，对程潜决心起义高度评价，对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部队予以整编等项意见”表示完全采纳。

程潜《备忘录》和毛泽东复电，是湖南实现和平解放的历史性文件。此后，程潜加紧起义准备，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也据此部署进军湖南。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⑩5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盛赞“先生毅然脱离伪政府，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钦。谨致祝贺。”^⑪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长沙，湖南新一页历史就此掀开。

二

建国初期直到1956年的湖南统战工作，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绩。

成绩之一，是建立了正式的统战工作系统。1949年9月，中共湖南省委成立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司令员兼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肖劲光兼任主任，这是根据当时省内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接管城市，对程、陈起义部队进行改编，在政权机关中安排起义和民主人士等而采取的决定。1950年1月，省委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改称统一战线工作部，由省委副书记金明兼任部长。继之，全省各直辖市和专署一级党的机关，也陆续设立统战部。1950年10月，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代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委员会职权，也代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讨论通过了实施土地改革的细则，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为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为争取财政经济状

况好转而斗争。这一次会议选举成立了湖南省人民协商委员会，由程潜担任主席。在此前后，各市、县也纷纷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各级协商委员会，对本地政治、经济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讨论。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和湖南省人民协商委员会，是全省统战工作的领导机关和大本营。

成绩之二，是对程、陈起义部队进行改编整训。1949年9月，部队进行第一次改编，使用了“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番号。这是应程、陈起义前的要求和根据部队情况复杂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也就是说，这支部队一时尚未完全割断同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军委对此表示了谅解态度。解放战争时期让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使用此种名义，全国仅此一次，充分说明中央对程、陈起义的重视和宽容，更说明中央在执行统战政策上的坚定性和灵活性。两个月后，起义部队进行第二次改编，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为第二十一兵团，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陈明仁仍任司令员，各军、师长也由原来的起义将领担任。是年冬，该兵团在湖南参加剿匪战斗，第二年又调广西剿匪，以后长期戍守祖国南疆，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成绩之三，是在政权机关中对起义和民主人士进行了妥善安排。解放初期，湖南曾设有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湖南省临时政府、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等临时政权机关，起义人士在其中都占有相当位置。如程潜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唐生智担任副主任，陈明仁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和军管会副主任等。同时，程潜还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委员和人民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4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在5名正、副主席中唐生智和程星龄是民主人士；50名政府委员中有22名民主人士。其比例之大，不仅居中南各省首位，在全国也是突出的。此外，还在省参事室、军政委员会、文物保管委员会安排了

200多名民主人士。对上层民主人士予以妥善安排，有利于新旧社会制度交替之际的稳定，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新社会建设和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湖南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以及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五反”运动等政治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中共湖南省委遵照中央指示，一方面坚决地依靠和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毫不动摇地完成各项斗争任务，一方面又尽量地保护和照顾民主人士，使他们顺利过“关”，同时还受到教育和锻炼。如为帮助一部分民主人士退押，湖南省财政于1950年拨出专款3万元。这样既满足了农民的要求，又使得民主人士生活上不致过于受到影响。在土地改革中，广大贫苦农民出于对地主阶级的义愤，要求对过去的剥削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种斗争自然牵涉到一些民主人士。为此，省委作出规定：凡系起义、投诚或支持过革命的民主人士，不论有过多少罪恶，只要现在拥护土改，都本着“既往不咎”的原则，一律保护，不交农民直接斗争。在镇反运动中，也同样按照上述办法，只要没有新的罪行和活动，对于有历史问题的民主人士，一概不予追究。又如在“五反”运动中，开始一段资产阶级受到较大震动，但后来定案退赃阶段，湖南长、衡两市划定的严重或完全违法户都不到1%，专辖市更在5%以下。中共湖南省委对民主人士接受教育锻炼采取了一些有效办法，如组织他们参观、参加土改、讨论反革命案例、参加检举揭发等等，使民主人士真正在思想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从而，在政治上进一步拥护中国共产党，在感情上逐步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致。这就为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做好了思想准备。对于解放初期各种政治运动中的统战工作，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其成绩。当时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又保护又改造，虽然在具体做法上有时失之粗糙，不符合政策

的情况也有所发生，但确实达到了团结的目的，湖南统一战线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1954年，湖南省选举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为保证在省一级最高权力机关中有足够的民主人士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就选举问题几次发出党内指示：关于候选人提名，则在政协会议上反复协商。结果，在这一届552名省人民代表中，有民主人士170名，占30%。次年，省人民代表大会进行本级政府选举，程潜当选为湖南省长；在49名人民委员中，有民主人士24名，占48%；102名厅、局级领导中，有民主人士23名，占22%。这些比例，在全国都居于前列。

此外，在取得的成绩中，还包括帮助各民主党派在湖南发展组织和开展工作，使在湘的民主党派由解放初期的两个增加到1956年的6个，即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成员由1950年的333人增加到1955年的1275人。民主党派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些组织，更好地团结它们所联系的人士。这一阶段，湖南还在实行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方面取得成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4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成立，加快了湘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共湖南省委十分注意对中共党员和干部进行统战政策教育，并经常检查统战工作。应当承认，解放以后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对于统战问题的认识，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存在着相当差距。一些中层，甚至少数高级干部，常表现出对于统战政策的抵触或怀疑情绪，而在基层干部中，关于统战工作的种种错误议论更有市场。为此，中共湖南省委几届主要领导人如黄克诚、金明、周小舟等，经常在重要会议上传达中央指示，强调统战工作，批评错误倾向，并从1955年开始，连续责成省委统战部对全省民主人士安排使用情况进行检查。这样，才使党内思想逐步趋向一致，保证了

全省统战事业的前进。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建设计划的实施，湖南从1954年起开展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和教育。这一宣传教育在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中引起很大反响，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湖南省私营商业的特点是：户数多、资金少、规模小；商业多、工业少，技术设备落后。当时，全省共有私营工商业194000户，从业人员51万余人，资金9831万元。经过1954年和1955年的工作，湖南已经为对资改造打下了一定基础；1956年1月，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湖南以不到半月时间实现了全省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参加改造的私营工商业者共计54000余人，定股金额2993万元。

1957年春季，根据中央决定，湖南在全省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不久，扩大到欢迎党外人士参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要求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当年4月，湖南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党内外200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随后，会议进入座谈讨论，实际上开始了湖南的整风运动。由于运动目标明确，省委领导人在听取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态度诚恳，党内党外对整风十分积极。5月，湖南召开省政协一届三次全会。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进一步鼓励和欢迎民主人士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出揭露批评，并强调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从这次会议开始，湖南整风运动迅速进入高潮。在各种形势的会议上，广

大党员、干部、群众，包括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向各级党组织和领导者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当然，也有一些人的意见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还有极个别人乘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攻击，在舆论界掀起了一股风浪。

如是，众所周知，湖南也同全国一样，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开展了全面反右斗争。全省当时划定的“右派分子”多达26600余人。

1958年，湖南统战工作在当时“左”的政策下，又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要求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交心”、“双献”，人为地掀起了“加速改造”的竞赛运动。以至一些党外人士不得不提出“争当左派”的目标，工商界则纷纷提出放弃定息的要求，知识界和其他各界民主人士也要求取消学衔、职称，或降低工资。这些做法，一时显得轰轰烈烈，实际却造成了思想混乱和加剧了关系紧张。继“交心”“双献”运动之后，全省又在知识界“拔白旗”，将一些学术上有专长、有权威的人士定为“白旗”批判，将致力于科学研究，热心从事专业工作的干部，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将许多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处理，甚至将“交心”中认识的问题，也当做“右派言论”斗争。这就更加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严重后果。

1960年到1963年，湖南统战工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采取“松一松”的方针，使统战关系得到调整。如运用“神仙会”的形式组织民主人士进行政治学习，广开言路，实行“三不主义”，使民主空气活跃；在经济生活严重困难下，对党外一批上层代表人物给予一定的物资照顾等等。特别是根据中央指示，湖南分期分批地为原定的大多数右派分子“摘帽”，后来又对在“交心”、“拔白旗”等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人甄

别平反。这就较好地缓和了关系，增强了团结，为渡过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保持政治上的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

但是，从1963年至1964年上半年，在全国统战系统开展了对原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对湖南统战工作也造成极大影响，许多理论、政策又被颠倒了是非，党内外的思想又陷入混乱，“左”的一套做法继续发展；党外人士刚刚舒缓的心情又趋于紧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发生“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统战事业的各个方面，包括对民主人士、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对资改造、对少数民族、对宗教、对侨务等一切方面的工作，一概遭到否定和打击。全省各级统战部门统统被“砸烂”，政协、民族、宗教、侨务、参事室、文史馆等统战工作机构一律撤销，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百分之七八十被下放农村，统战系统的大多数领导人遭到批判斗争。至于统战对象所受到的打击迫害，就更加严重。当年，经过毛泽东、党中央大力争取和中共湖南省工委艰苦工作才得以实现的湖南和平解放和程、陈起义，居然被作为“三条黑线”中一条“又粗又长的大黑线”而加以否定批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973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恢复设立省委统战工作组，在极小范围内开展一些统战工作。

—

1977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正式恢复省委统战部。9月，统战部向省委提出《关于召开政协湖南省第四届委员会的意见》。10月，统战部根据中央指示，着手帮助省内的6个民主党派整顿组织，恢复活动。11月，政协湖南省四届一次会议在距第三届会议13年之后召开，选举产生了政协湖南省第四届委

员会。

1978年，湖南按照中央指示给右派摘帽，后来又为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1979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落实政策座谈会，规定落实政策的范围，其中属于统战方面的主要是：右派的摘帽和改正；知识分子政策；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资本家政策；侨务、宗教政策等。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成为这一时期统战工作的头等任务。

1979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所谓“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并为李维汉和统战系统广大干部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中央的决定传达到湖南，受到湖南统战系统干部的热烈欢迎，成为推动湖南统战工作的巨大动力。

1979年8月，中共湖南省委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问题。省委书记毛致用指出：湖南现在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思想解放不够，要继续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认识路线，认真补好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课。真理标准的讨论推动着落实统战政策的步伐。1980年2月，湖南6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分别同时举行代表大会或成员大会，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全省民主党派工作逐步活跃。1981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毛致用代表省委常委就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来“左”的错误在湖南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以及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这一次会议对于湖南全省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湖南由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湖南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也是这一次会议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拨乱反正，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平反多年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造成的冤假错案，是这一阶段统战工作首要的任务。而从湖南来说，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又是落实统战政策的重点。为此，中共湖南省委于1979年、1982年、1983年、

1985年连续发出文件，就这一工作作出具体的政策规定，并一度抽调8000多名干部从事这一工作。中国共产党对于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是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因此，湖南在落实这一项政策中紧紧抓住“认定身份、有无新罪”这一原则，凡属起义、投诚人员，只要后来没有新的罪恶活动，如果被处理错误的，就一律给予平反。如1950年处理的“湘西和平解放军官训练队”279人案件，1983年由省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专门研究，并授权省高级人民法院组合成合议庭重新审查，仅13天即平反了其中193人的冤案。湖南在处理这一案件中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勇气，并在指导思想上坚持“宜宽不宜严，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在工作上坚持“宜简不宜繁，宜早不宜晚”的方法和要求，做到了“快而不草，简而合法”。“湘西和平解放军官训练队”案件的处理，在全省震动很大，对推动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起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中央的肯定。到1986年止，全省共认定起义投诚人员75527人，参加湖南和平解放的地方武装人员38940人，合计114467人。为解决被落实政策人员生活困难，中央和湖南共拨专款600万元。起义投诚人员中的部份上中层人士，更得到了政治上的安排。

湖南以极大力量落实其他各项统战政策。如1956年对资改造中被错误改造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已全部从资本家阶级中区分出来，共有人员45630人，资金1149万元，分别占原改造数的83.4%和39.6%。又如1957年及以后被划定的30791名“右派分子”，除24人仍维持原结论外，其余全部改正。此外，湖南还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政协委员政策，落实少数民族政策，落实台胞、侨胞及宗教政策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总计到1987年底，湖南共为22万多名统战对象落实了各项政策，终于完成了这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样，就较好解决了

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充分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积极性，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内外产生了好的影响。

为开创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湖南十分重视人民政协的工作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注意发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1983年4月，省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全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的工作报告和政治决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排除各种干扰，加强调查研究，关心机构改革，参与协助有关部门大力落实各项统战政策。这一次会议选举曾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解放初期担任过副省长、后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著名民主人士程星龄为省政协主席。1984年，省政协经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成立了中共党组。从此，省政协的地位、工作和作用大大加强，在推动落实政策，推动改革开放，推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日见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1988年1月，省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高举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旗帜，不断开拓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和政治决议，指出：要不断加强政协的自身建设，使之适应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政协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至此，湖南省政协委员共有726名，为1964年第三届委员398名的1.8倍，为1955年第一届委员175名的4.1倍。

湖南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日益活跃。1984年，省内民盟、九三、农工、民革等地方组织先后召开代表大会，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通过了发展组织和开展工作的计划。1985年，中国致公党也在湖南成立了组织。1986年，中共湖南省委批准省委统战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报告》，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所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

照，荣辱与共”方针，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关系。省委还要求各级党委建立健全民主协商制度，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同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的协商会，一年至少召开两次，各级统战部门的协商会，一年至少召开4次。这个《报告》还对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机关干部队伍建设、领导班子更新等问题提出了建议，对改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条件作出了安排。到1990年湖南全省7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14698人，比1965年的2000多人增加了6倍多。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中共湖南省委注意在各级政权机关中安排党外人士担任领导职务。到1990年止，全省共有党外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名，地、州、市和县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03名，副市长、副专员3名，副县长（含县级市、区）81名。此外，在政府各部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都有一批党外人士担任领导工作。1991年4月，省人民政府选配了1名党外人士担任省长助理。

湖南的工商联工作，少数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为促进湖南的四化大业，为改革开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湖南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有着非常有利的条件。总计：全省有去台人员13.7万余人，加上他们的第二、三代有20多万人；在港澳的湘籍同胞5万人；在国外的湘籍华侨、华人20多万人，分布于81个国家和地区。在省内，则有台胞、台属30多万人；归侨、港澳同胞、侨眷近30万人。在大批湘籍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的政治上有地位、有的经济上有实力，有的技术上有专长，有的科研上有成就。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愿为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出力。在海外统战工作中，近年来湖南已将对台工作列为重点。

对台工作的第一步是争取海峡两岸在间隔40多年后实现“三通”。1987年10月，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发出《关于做好台胞来湘探亲、旅游接待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干部和群众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局出发，热忱欢迎台胞回乡探亲访友，积极主动地做好接待工作。当年仅两个月时间，即有1200余名台胞回到阔别的故乡，出现了许多骨肉团聚、泪洒热土的动人场面。“三通”闸门一经打开，回湘探亲、旅游的台胞就一年多于一年。总计：1988年1.3万人，1989年1.7万人，1990年2.9万人。与此相应，我省去台探亲的人员也日渐增多。

两岸“三通”必然扩展到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和接触。湖南十分重视对台经贸工作，对台胞与湖南间的经贸往来提供优惠和方便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湖南共引进台资642万美元，批准台资企业11家，对台出口贸易75万美元，兴办“三来一补”项目5个。湖南与台湾的文化交流也日见发展。如1989年，台湾怡人传播公司来湖南拍摄湘籍著名女作家琼瑶的作品《六个梦》，即得到湖南电视台的协助；1990年在长沙召开的国际中文与东方语言计算机处理学术年会上，台湾学者与湖南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当年11月，湖南金石书画家李立又应邀赴台进行金石艺术观摩表演。湖南与台湾间的政治接触实际已在进行。在回乡探亲的湘籍台胞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中上层人士，他们通过亲身体察，对故乡面貌的变化感到高兴，减少了误解和疑虑，许多人表示希望祖国和平统一。湖南曾经有过两次国共合作，当年参加过两次国共合作的人，至今仍有健在者。湖南的海外统战工作，尤其是对台工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如今，湖南各级党委共有专职统战干部7000余人，全省从事统战工作的干部3万多人。为了指导工作，积累交流和研究统

战工作的经验，湖南出版了《湖南统一战线》、《湖南政协报》、《协商与监督》等报刊杂志，还成立了省统战理论研究会。

注释：

- (1)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页、465页
- (2) 《湖南省历年党务概况》原件存湖南省档案馆
- (3)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页
- (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52页
- (5) 《毛泽东选集》第1133页
- (6) 《毛泽东选集》第1170——1171页
- (7) 《毛泽东选集》第1083——1084页
- (8)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第40页
- (9) 转引自《当代中国的湖南》(上)第46页
- (10) 转引自《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第893页
- (11) 同[9]第49、50页

抗 战 时 期

印缅战场上的一支中国坦克部队

孙 志 明*

抗日战争中，我军坦克部队扬威印缅战场，为击败日军立下汗马功劳。今谨记述其始末于下。

一、从湖南出发

1943年9月末，陆军辎重兵汽车第一团的15辆酒精车，载着机械化学校驾驶兵教育团第三营的官兵，由营长王先沂率领，从湖南洪江寨头村出发，驶向昆明。行前教育长徐庭瑤（中国坦克部队的创始人）在校本部对面的公路上，举行盛大的欢送会。军乐声、口号声、鞭炮声，伴随着学校附属“精是中学”师生的歌声，响彻了深山老林。

这是一支素质较好的队伍，学兵们是从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招考录取入伍的，年龄在17至19岁之间。

车到贵阳，战时气氛骤增。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汇集，军运频繁，部队在此休息两天后，换乘征集来的民用商车，在云贵高原上盘旋前进。

10月上旬，车抵昆明，住机场附近。我们的任务是飞过去、打回来。整日就地待命，使人心烦。当上级命令作出国前

* 孙志明，当时任战车第一营二连排长。

体检时，全营顿时雀跃起来，虽有一二个体检未过关的士兵需要留下来，他们却一再要求随营出发。

11月初，全营渴望很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3月4日下午4时，分两批乘运输机，飞行4个多小时抵达汀江机场，下机后连夜转往列多。

翌日起来，更换服装，又进行一次检查，身体健康的统统编组乘火车驶往印度中部的兰姆伽。

二、兰姆伽改编

到兰姆伽后，王先沂率部向基地报到，次日进行改编。军官全部调往基地战车训练班；士兵编入战车（坦克）第一、二两营。12月中旬，战车第一营组建完毕。所缺部分军官从战车训练班（班主任蔡宗濂）调入。我为被调者之一，分在战车第1营。

战车第1营的人员编制是999名，其中军官90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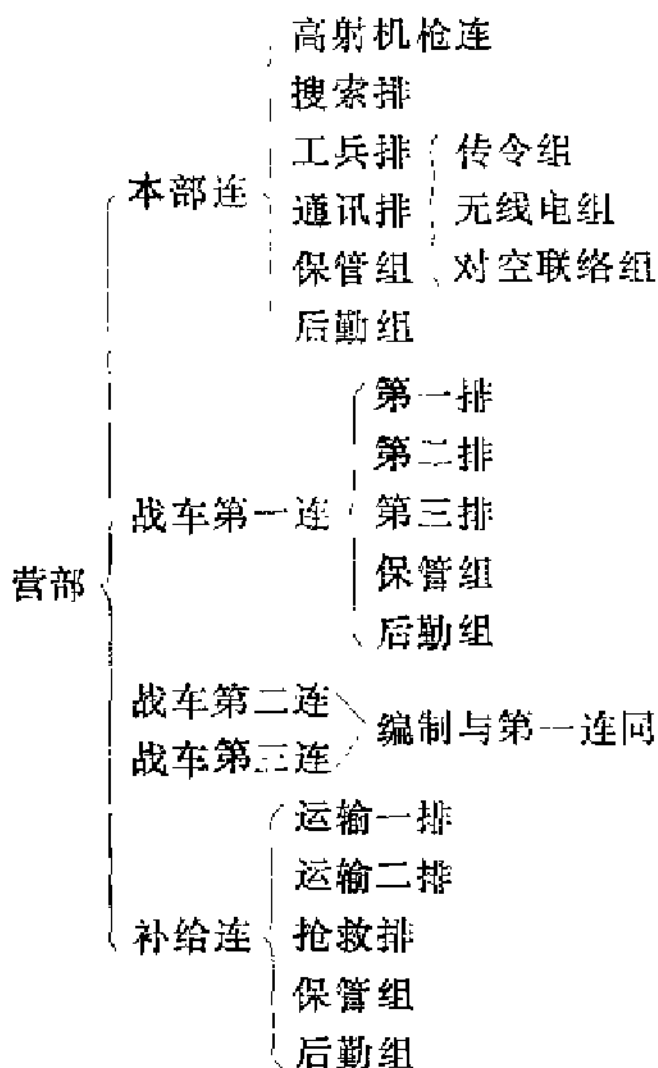
战车第1营的武器装备有：

M3轻型15吨坦克53辆，每辆装备37毫米平射炮1门、高射机枪1挺、机枪2挺。高射机枪排、搜索排、通讯排都配备有各种机枪。此外，还有冲锋枪、步枪、装甲车、各种车辆及收话机、接收机。这是当时一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是印缅战场对敌作战的主要攻击力量。

战车第1营的训练方法是：

实弹射击、坦克及各种车辆（包括装甲车）的驾驶和各种地形的通过。位于热带40℃气温下的闭门驾驶、夜间闭灯驾驶，每日常达10小时以上。无午休，无假日。一天训练完毕后，还要进行车辆例行保养和现场讲评。这是一种耐力、智力与意志的锻炼，也是身体素质的考验。无怪乎，在昆明和列多两地登机之前，都要严格进行体检。

战车第一营的战斗序列是：



三、列多集结

1943年冬，我军先头部队，开始和日军接触，10月29日占新平洋，12月18日攻克于邦。此时兰姆伽基地担负有战斗任务的诸兵种部队，逐渐向列多集结。战车第一营首先到南亚最大港口——加尔各答接收装备，尔后再分两路北上：一路用火车载运坦克及装甲车到列多站下车，另一路驾驶各种汽车沿公路而去。在公路行驶的车队，往往可见到阵阵猴群嬉戏于两侧

的树梢，有的倒悬，有的跳跃，欢腾作乐。在加尔各答和途径的城市中，常常碰到三两花牛，踟蹰街头。

进入列多，气温稍稍下降，但战时景象历历在目。这里有中国军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喀钦部队，在街上，头戴三色钢盔的美国M·P（宪兵）；身着卡其制服、佩戴袖章的中国宪兵；典型绅士风度的英国军官以及印度警察，各自处理军中酗酒和其它违章事件。

战车第一营穿过列多市区，驻扎在市区以东数英里外一个路口进去不远的无人区，积极进行战前准备，路外有一处空坪，被辟为小型临时机场，不时有侦察机、通讯机起降。

四、进入野人山

2月，乍暖还寒，战车第一营离开列多，越过印缅边界，进入野人山（那加山）的茫茫林海之中。直到农历正月初三，才知道大年已过。如果在国内，早两天起就已是爆竹声声，而现在我们却悄悄地过了春节，同行的坦克，也静静地掩蔽于林中深处。

车行一月，不及百里，海拔3千米以上的鬼门关迎面而来，筑路部队披荆斩棘，当天开辟的新路，坦克随即开了过去。遇到沼泽地带，就以枕木架起一条高50公分，宽3米多的单行道让坦克通过；若是垂直陡坡，后面车辆则刹车，以钢丝绳曳往前车徐徐下驶，一路上险象环生，绝大多数都能安然而过，偶而有一、二辆坦克不慎坠入深邃的空谷里。

2月底，缅甸前线我军对正面蒙关（孟缓）之敌，只作佯攻，而战车第一营从左侧孙布拉蚌与新平洋之间的亘古森林里钻进去，遇回瓦拉邦（瓦拉）敌军司令部。

3月1日，全营在林海中，靠指南针判定方位，无路可寻时，则由开路机开路，坦克一段一段地前进，入夜仍在森林之

中。

3月2日，开路机继续开路，坦克随着前进。黄昏，进入林中的一块草地，草比人高。坦克由纵列组成一个孤圈，辆辆车头向外，形成一个四方都可出击的活动堡垒。停车前，车上无线电传来通知：“就地待命，不准吸烟，不准开灯、不准做饭。”我们又啃了一天干粮。

印缅战场的制空权，早已操在盟军手中。3月3日上午9时许，草地上空出现一架轻型飞机盘旋不去，通讯排迅速与其联络并铺开布板信号。飞机飞得很低，白朗上校（美国人，中国驻印军战车指挥部指挥官）探出头来向大家致意，又扔一个布袋，拾者把它送交营部。半小时后，营长下达命令：“瓦拉邦已在我们右前方不远，第三连为尖兵，第一连居中，第二连担任后卫，立即出发”。10时正，全营出草地、穿树林、过河谷，加速前进。

五、鏖战瓦拉邦

3月3日中午，尖兵连逐渐靠近瓦拉邦公路，敌兵发现坦克，竟乱作一团，慌忙向瓦拉邦河西岸撤退，筑起临时工事，凭籍河岸，妄图阻止我军前进。经过观察，瓦拉邦河上有座木桥，尚属坚固，西逃的敌人还未来得及破坏。下午4时，战车第三连连长孙明学（机械化学战车兵科1期毕业）身先士卒，率领17辆坦克在第1连战车炮火掩护下，突破河床封锁线，从木桥冲上对岸。日军疯狂抵抗，在西岸有数辆坦克倾覆，失去作战能力。天色刚晚，日军为了保住十八师团司令部阵地，进行反扑。第一连奉命增援西岸，又是17辆坦克压向敌阵，火力大增。战斗至晚上9时，打退日军的反扑，占领了敌阵地。敌指挥官仓皇逃遁，连关防（公章）、太阳旗（军旗）、指挥刀都未来得及带走。与此同时，第2连在瓦拉邦河东岸，切断了

通向蒙关、新平洋的交通线，缴获汽车数辆及不少辎重，丢下的饭锅、饭盒里的饭，还是热的，余敌向丛林中乱窜。

这一仗，吹响了缅甸战场胜利反攻的序曲，士气大振。营长赵振宇（黄埔六期毕业）晋升战车指挥部副指挥官，空缺由副营长赵志华（黄埔10期毕业）升任。4月，我军前锋已过丁根山卡、向孟拱进击。日军针对坦克部队，采用了磁性手雷（又名磁性地雷，扁平形，内嵌有4块强力磁块），组成敢死队，身负车雷，赤膊上阵，伏于我坦克必由之路，遇上坦克即投掷出去，紧紧吸在装甲车底板上，旋即爆炸，坦克被毁，人员伤亡之，导致整个部队停滞不前。后来有人建议：在坦克上安装铁丝网，网上再敷一层厚厚的黄泥，车尾堆着砂袋。出击时果然奏效。手雷遇上黄泥及砂袋，磁性不起作用，纷纷滚下爆炸，投掷日兵躲避不及，反被炸死。我坦克部队扫除进军路上的阻力后，与其他部队一起，直插南三河。

六、强度南三河

异国仲春，酷似江南，但为战火所笼罩。4月11日上午10时，日本主力退至南三河南岸，北岸仍有少量兵力进行骚扰。营长赵志华受命率领全营向前推进。这时前方已经打响，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谁也没有理睬这些。营长命令：“战车第二连为尖兵连，二连三班为尖兵排，二连三排16号车为尖兵车，到达步兵指挥所取得联系后，继续前进”。我作为16号车车长迅速跃入车内，向驾驶员龙宋权（长沙人）、射手覃怀宣（广西人）以及副驾驶员交待情况后，作为锥之尖，开动坦克，扭开无线电，带上耳机，加大油门，率先向南三河驰骋而去。坦克到达步兵指挥所后，一下子全部熄灭，严阵以待。

步兵连指挥所临时掩蔽部上支着树干，堆着泥土。我和战车二连连长詹海蟾（机械化学学校交通兵科二期毕业）钻了进

去，步兵连长向我俩说：“前面不远就是步兵线，从电话里传来消息，你们即将到来，我命令前沿阵地，已用一块黄色胶布，铺在地上，作为标记，出了胶布，就是战场。从步兵线向前500米的左边，有一栋楼房是敌人的火力点，挡住了我们的路，再往前，进入隘路，隘路前面是南三河”。

出了掩蔽部，詹连长一声令下，坦克再度轰鸣前进。

我仍然在第一辆坦克上，从车内潜望镜望去，一眼就看到大块黄色胶布，它无言地宣告：战场到了。

坦克继续前进，两分钟后，左侧出现一栋楼房，几辆坦克摇转炮塔对准楼房开炮，瞬间摧毁殆尽。坦克到达隘路，嘎然而止。

我在隘路中仔细观察情况并以无线电报告詹连长：“大老板（坦克连长的代号）！大老板！我是16号老牛（坦克的代号）！我是16号老牛！前面是河床，可涉水面过，但对岸只有一条路，路上可能有雷，我想用炮弹把它摧毁”。“16号老牛！16号老牛！我是大老板！我是大老板！你的话我听到了，同意你的意见，马上执行”。我拨转了车内通活控制器，向射手下达射击命令。顿时、炮弹在对岸唯一的路上开花，引爆了地雷，发出几声巨响，硝烟和尘土冲上天空，我们乘机向前疾驶。

走出隘路口后，进入河床，在卵石上奔驰冲向敌阵。不料我16号坦克被日军炮火击中，驾驶员龙宗权阵亡，其余人受伤。13号坦克继续冲上来，也被击中。但后续坦克源源而上，还是勇猛地冲向彼岸，压住了日军坦克炮的火力点并占领了南岸。步兵随即跟进。傍晚，南三河被我军收复，步兵指挥所也移向南岸。

战车第一营从1944年3月3日鏖战瓦拉邦至5月中旬，连续大小战斗20余次，人员伤亡达40余人，大部分转移到列多后

方医院治疗，我住院10多天后归队，任命为战车第2连第2排排长，率5辆坦克。

七、沙地亚整训

5月，缅甸进入雨季，全营从前方临时机场空运回到列多，改乘火车转往中印边境沙地亚（萨地亚）以北15英里、布拉特普拉河边整训，河对岸即为祖国西藏察隅地区。战车第二营，作为预备队也驻扎在沙地亚以南的迪一鲁卡（迪布鲁加尔）。所有帐篷都分布在河滩冲积层的平原上，气候炎热。我们就在这种环境下锻炼意志，熟悉技术，往往挥汗如雨，饮食不进，目的是提高热带作战能力。

在整训时期，间常下午举行连际球类比赛，有时进行中美兰球友谊赛，围观者皆战车第一营的官兵。湘籍战士利用业余时间，还自编自演了一场花鼓戏。

缅甸的雨季即将过去，印度沙地亚的中国坦克兵整训结束。是年8月，仍循列多再度进军。24米宽的国际公路，毕直向前延伸，车过鬼门关时，已变成通衢坦途，开沟机在公路两旁疏通渠道，刮路机不停地你来我往把马路刮平。

几个月以前，坦克加油，需要三四个全劳动力，才能把一桶200公升的汽油，使劲地杠上坦克。现在，输油管已伴着公路，并肩向前沿途山间的高压泵房夜以继日的运转，加快流量，一次可供8辆车同时加油。为了防止裸露的油管遭到破坏巡逻兵日夜不停地沿线检查。

车过孟拱，离战场不远。次日奉命编入预备队，尾随步兵之后。

八、“第二条战线”

我坦克部队与日军在瓦拉邦、丁根山卡、南三河的几个回

合，使日军已饱赏了溃败的苦头。可是“第二条战线”——生物战线，却令人头痛，加之雨季来临，气候炎热，蚊虫成群，疾病流行……使之防不胜防。

生物战线上，不管是深山密林中的虎豹，还是莽莽草原里的巨蟒，坦克兵们可以用枪杆子来对付他们，战而胜之。可是疟蚊、旱蚂蝗、蚂蚁，在空间与地面，随时向你袭击，实在难于应付。

第一是防蚊。白天，开饭前每人发给两颗“阿斯比林”药片吞食，用以防虐，还是一个很倒胃口的事，而且对肝脏有一定的不良影响。入夜，防蚊是头等大事，哨兵站岗时、象阿拉伯妇女一样，戴上面罩，严重影响了视线。哨兵的两只手，每隔半小时要擦防蚊油一次，这种油，气味难闻，若不小心把它涂在手上，表面会出现裂纹，当然也会损伤皮肤。

其次是防止旱蚂蝗。它对人体的入侵当徒步行走时，必须把裤脚扎紧（步兵则把绑腿扎紧），套在皮靴里，或者把脚放在长筒帆布鞋里，再锁紧带子。

三是防止蚂蚁的围攻。缅甸北部丛林里的蚂蚁，比我们在国内所见到的要大两三倍，头大如豆，呈褐色，一般由蚁王率先，众蚁随行。有一次坦克兵露营时，未注意林中草地尽皆蚁穴，刚住下不久，就遭到蚂蚁的狂攻。人人腿部、手上、脸上到处都是蚂蚁。虽然一面拍打，一面脚踩，蚁群仍源源而上。后来，只得把坦克从草地上退出来，在蚁穴周围淋上汽油，放火“歼灭”，这样才安然地过了一夜。

九、乘胜追击

密支那为缅北重镇，有铁路通往曼德勒和仰光，公路四通八达，在密支那郊外鏖战两月，公路上弹坑一个接着一个，坦克兵们加大油门冲着过去，有几处太深，只能绕坑而走。前线

步兵在野炮和空军支援下，奋勇杀敌。8月5日我前线指挥官还没有把坦克用上，日军就招架不住，向八莫撤退。在市内緬人寺依洛瓦底江畔，丢下了200余具尸体。

坦克部队得知下达追击任务后，个个要求肩负此项任务。本部连搜索排，一马当先，把更换下来的M3坦克的炮塔部分卸下来，减轻重量，并在四周安装上机枪，成为没有盖子的装甲车，与美军混合编组后，向八莫、南坎追击。其余战车连，紧跟搜索排之后，11月24日与友军一起，攻克八莫。1945年1月15日，再克南坎时，我们用灭火机，把还在燃烧的房子之火扑灭，当晚安营在火后的芭蕉树边。

我军进入南坎后，日军节节败退。一方面缅甸东北部战场，受到中国驻印军的穷追猛打；另一面在国内滇西战场，又遇到中国远征军的坚强反击。可是日军仍不死心，企图在芒市（路西）畹町、芒友、腊戍等地作殊死顽抗极力阻挡中印公路的通车。我坦克部队6月下旬进驻芒友。新1军主力部队向腊戍方面搜索前进，遇到阻力时，重炮群使用“地毯战术”（像织地毯一样），每市、畹町相继克复，中印公路已无敌踪，全线通车。3月8日克腊戍，日军向曼德勒方向溃退。

战车第一营驻军芒友，是作为南下我军主力的预备队，曾一度移防腊戍，数日后即折返。1945年春节，国内演剧5队，赶来芒友附近作慰问演出，上演了《母鸡下鸡蛋》、《李大妈》等短剧。一年多未看过祖国亲人的演出，此时备感亲切。

中印公路通车后，美国车队、英国车队、更多的是中国车队，满载军火物资，穿过原始森林，进入密支那盆地，跨过横断山脉，驱车惠通桥上，与第十四航空队一起，陆运、空运齐头并进、补给汇集昆明，奠定了国内胜利基础。

十、战车兵节

1945年5日，印缅战场第二个雨季到来，虽然有M4型坦克参加了战斗，仍然不能“全天候”，无阻挡地出击。大自然限制了坦克的活动，我们又来到密支那。

星期天休息，去密城逛街。到处仍然是弹痕累累，断垣残壁。一些商人支起帐篷或棚布做生意，其中有些是华侨和华裔，当他们看到中国军队时，都翘起大拇指，极表欢迎。

雨季过后，重返南坎。1945年8月9日，突然间四处枪声大作，以枪声代替爆竹，表示庆贺。啊！原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在南坎的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浸沉在狂欢之中，一直闹到深夜。

1945年11月，中国驻印军战车第1营分两路回国：一路由周世昌率领坦克手100余名连同108辆坦克，折返加尔各答，乘万吨巨轮，分批出印度洋，经太平洋于1946年初抵达上海，驻扎沪江大学；一路由赵志华率领过畹町回国，途径滇、黔、湘鄂，再顺江东下，也于1946年3月到达苏州。海、陆两路汇合后，改编为战车第1团，团长湛自立（黄埔八期毕业），团附梁世兴（黄埔十一期毕业）、蒋纬国（德国军校毕业）、蔡士清。为了悼念在缅甸战场的阵亡将士，为了纪念瓦拉邦一役所取得的辉煌胜利，1947年初，此时已升任副团长的蒋纬国传达上级命令：定每年3月3日为战车兵节。

记宁乡杜家山抗日阵亡将士

张祖骞●

1944年6月初，日寇攻陷平江，进犯浏阳。另一路日军由新墙河猛扑长沙，守城的某军在城外与敌鏖战，打得可算英勇顽强。无虞某军长不但指挥不力，且又贪生怕死，没有守城决心，长沙遂于6月19日弃守，守城不到48小时。

敌人进犯长沙的时候，沅江方面的敌人，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经龙头港攻益阳；一路经乔口犯宁乡。当时驻防宁乡的部队，仅第一百军的一个营。营长姓周（佚名），宁乡灰汤人。我见过他，瘦高个子，年轻，大约30岁左右，中央军校毕业，是个标准的军人。

长沙、益阳、乔口沦陷之后，宁乡完全处于敌人包围之中，风声鹤泪，人们非常惶恐不安。城里人向乡下逃难；乡下人向山里躲藏。顿时宁乡县城成了一座空城，乡下的交通要道沿线也坚壁清野了。周营长却奉令守城，率领他那个营的200多名将士开赴县城，在县城南门沅水西岸的杜家山布防，构筑工事，隐蔽待敌。

乔口一路敌人约千人，沿沅江而上，一路上浩浩荡荡，没有遇到狙击，于6月22日黄昏到达县南郊。敌人根据情报，说是没有我军防守，连老百姓也弃家逃走，是座空城。他们便毫无戒备地拥上南门桥，直扑县城。

●张祖骞，湖南宁乡人，现居台湾。

南门桥横跨汾水，桥长210米，宽3米多。当敌人大部分拥上桥时，隐蔽在杜家山阵地上的我军，一齐向桥上敌人猛烈开火，密集如雨点的枪弹，像风扫落叶一般摆倒了一批敌人。敌人遭到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桥上，不易冲过去；桥面窄，不容施展，拥挤在桥上的敌人，根本不可能组织还击，只有丢下几十具尸首，哇哇乱叫地后撤了。随后敌人又组织了几次冲锋，终因我军用火力封锁了桥头，始终未能踏上南门桥一步。

双方坚持到天黑之后，敌人利用夜幕的掩护，留一部分人，在对河的柳树林里射击，以迷惑我军。而其主力部队则从南门桥下流的高筒车，涉水过河，从梅家田、仓岭上，经谈家岭向杜家山后面，展开扇形包围。接近我军阵地时，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我军战士在周营长的指挥下，接连打退了两次冲锋。这时对河的敌人攻下了南门桥，从杜家山的前面攻击上来，我军已处于数倍于我的敌人包围之中。我军在反冲锋战斗中，虽杀死杀伤大量敌人，但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周营长已知是为国捐躯的时候了，于是大吼一声：“与阵地共存亡，杀呀！”吼声甫落，带领战士，跃出战壕，扑向敌人，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连伤员们，也奋起与敌人拼到最后一口气，真是厮杀得惊天地、泣鬼神。只因寡不敌众，最后，周营长以下200多名壮士无一生还、无一被俘，全部牺牲在杜家山阵地上。

同时，宁乡城厢镇镇队副王干钧奉令率领四名兵参加战斗，除一名队兵奉令执行侦察任务离开阵地之外，王干钧和其他三人也都壮烈牺牲。

抗日胜利之后，为了表彰周营长及全体为国捐躯的壮烈事迹，宁乡人在杜家山龙头嘴，修建了一座“抗日烈士墓”，墓碑上有王耀武将军“气壮山河”的题词，还有宁乡县长陈应龙

先生题的“节厉睢阳”。

解放后，宁乡县肉食水产公司在龙头嘴建房，推平了烈士墓，墓碑也被推到山下，仆卧在自来水公司的泥土之中。几年之后，墓碑也不见了，据说是后来自来水公司扩建房屋、占用了仆卧墓碑的那块地方，把墓碑深埋在地下了。

今年是抗战胜利46周年。我们这些经历过八年抗战烽火的人，对四十几年前那个战火弥漫的年代，自然记忆犹新，尤其是亲身经历的家乡沦陷的一些往事，更是历历在目。对有过一面之缘的、英勇牺牲的周营长又岂能忘怀呢！

周营长的热血洒在故乡土地上的时候，他还很年青，活到如今，还不到80岁。“抗日阵亡烈士”的墓碑，倒是承认他是“烈士”，如果他有遗孀，有后裔的话，未必真的享受了“烈士家属”的待遇了。因为既然推平烈士坟墓，毁掉烈士纪念碑，都没人过问，当然也就没人想到埋在黄土里的忠骨了，谁还会想起烈士的后人呢？

今天，我写这段纪念性的文字，却连周营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宁乡灰汤人，也非常惭愧。不过他那瘦高的身材，年轻英俊的脸，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安息吧，46年前牺牲在宁乡杜家山的周营长以及其他烈士们，仍有人记得你们的，知道你们的！

李明灏将军与黄埔军校二分校

刘冬松*

李明灏将军是我最推崇的将领之一。他那爱国的赤诚，刚直的秉性，朴素的生活作风和艰苦务实的工作精神，早已为人所称颂。这里，我回忆将年和黄埔第二分校当年培养训练抗日军队干部一段业绩。

1940年8月，我在黄埔军校十五期一总队工兵科毕业，分配到第二分校。该校的任务是向第九战区输送干部，并轮训各部队抽调下来的在职行伍军官。

数千里辗转，我从成都来到湖南武冈。就在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法相岩校本部，我见到了分校中将主任李明灏将军。

办公室宽敞明亮，陈设简单。他瘦长身材，着草黄色布料旧军服，黑色布鞋棉袜。他先让我坐下，然后解下横皮带，脱下军帽，自己才坐下来。看样子是刚从外边回来。

将军约50开外，精神饱满，目光炯炯，令人肃然起敬。谈话间，我又渐渐感到他和蔼可亲。他的语言朴素明快，没有官腔，也丝毫没有官架子。

我原以为报了姓名，聆听几句训示之后，便可告退，那知他询问不休，叫人对答不暇。

“你在校三年多无寒暑假，在军事学术和技能上，是科班

* 刘冬松，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当时在武冈第二分校供职。

出身了，学到了些什么？工兵主要搞些什么？制式材料和应用材料的桥梁现今哪一种重要些？炸断一条铁轨要多少黄色炸药？步兵技能学得如何？手榴弹能投多远？劈刺、器械操都是强手吗？一、二百公尺的靶子打得怎样？常搞急行军吗？夜间教育熟练不？……。”

这一连串的问题，他都细心听了我的回答。最后他说：“你到十七期当区队长去。下队再从头练起。自己练，带学生练。我这里的學生，可没你们在校的时间长，一年半都要学精，就上前线杀敌……”。

在通向石羊桥学生第六总队第六队的路上，将军的一言一语，在耳边频频震响。我心潮翻滚不已，一种十分紧迫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从到队的次日起，我这个新区队长，便带领学生，开始了更为严格的苦练。

约莫在10月间一个无星月的夜晚，中队演习夜间偷袭。疾进一段路之后，先头忽然停了下来，后续各区队便依次跟了上去，全队在一丘收割了的稻田成并列纵队集结。

我正疑惑，但又看不见前边的情况，也不能问。忽听有人讲话了：

“你们这是在演偷袭吗？”这是将军的声音，我不禁为之一怔。

“我看是去送死。这七七八八的响声我老远就听到了，鬼子就听不见？当官的带着兄弟就这样去死？”

讲话停顿的片刻，远近秋虫的鸣叫，清晰可辨，声声入耳。大家为之屏息，内心惊悚无已，静候将军“发落”。

“现在，马上带回原地，严格检查武装，从头来！”

这一番严厉的告诫，充满了将军对外侮不共戴天的仇恨，饱含着他对下属的爱护深情，因而更激发了全队官生同仇敌忾而自觉从严要求的决心。

12月，我被调到军官总队第三队任队附。这里的学员都是从前线下米轮调的营、连、排三级在职军官。

严冬的一个霜晨，全总队在武冈城里肖氏宗祠前坪听训。刚整好队，将军便出现在台上。旧灰呢军服，横皮带，青布鞋，竹拐杖。身躯挺拔，神采奕奕。

“……你们说，打鬼子用什么东西好？”将军讲话，干净利落，铿锵有力。

“我说，刺刀好，手榴弹好，步枪好，机枪好。有人说，大炮好，飞机好。我也说，这些东西好。但要问：你有吗？有多少？自己有的东西不下苦功练，坐在那里唱高调，你拿什么去打？”一千多曾率众与鬼子拼杀的军官一致报以信服而敬畏的目光。

“你们向往黄埔，从前线来到这里。这里并没有什么新鲜东西。有的只是黄埔的革命精神，当前就是苦练硬功夫去杀敌救国。当然，也要学理论：有教官给你们讲战术，图上的、实地的都要讲；队上官长讲典、范、令。再就是军事技能——劈刺、打靶、手榴弹、急行军、攻防战斗、夜间袭击……。这些东西说起来你们都熟，可我这里要过硬。要不，就毕不了业……。”

听完了训话，大家都和我刚来时一样，懂得了今后在校应怎样使劲了。

1942年2月，一个晴朗的上午，我第三队100公尺立姿实弹射击开始一阵之后，将军来了。这时靶壕里报出某学员的射击成绩，使他很不满意，立即说：

“等一等，送枝枪给你们队附，让他示个范！”

一个当连长的中年学员章秀林飞速地跑步递来一枝崭新的汉造79式步枪。我接过来打了三枪。靶壕里依次报出了9、11、11圈。将军点点头对我说：“你可以带他们了。”又对大

家说：“再打吧！”

这时靶场情绪顿然高涨，我目送将军高瘦的身影在热烈的打靶声中持竹杖跨大步离去，却留下了他对我这次检验的一股暖流。这暖流曾经很久在我心头萦绕。因为当时军官总队队附一般都是校级军官。象我这样的年青少尉，可说绝无仅有。他怕我带领不了这些转战多年的部队干部。经过亲自检验，他才放下心来。从这里，我深感将军对青年爱护之深。

4月间的某天上午，风和日丽，我们一大队由中校大队长何绍裘带领，在一个山坡上听战术教官郭恢唐上校讲实地战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大家正听得入神，这时，将军与高级教官蓝蔚援少将并肩从山顶缓步下来。走近郭时，将军便插话：“郭教官，我跟大家略讲几句。”

“刚才教官讲的战术，你们都认真听了，这很好。你们回去又要带领弟兄冲杀。要花功夫扎实训练夜间行动。无声无息地摸，摸到鬼子前缘，摸到哨所、仓库……。神不知，鬼不觉。一阵手榴弹爆炸之后，步枪、机枪齐发，掷弹筒打纵深；白天，要巧妙伪装，十分隐蔽，绝不让空中敌人发现，待地上敌人完全进入有效射程时，指挥官一声信号，便集中火力，……。鬼子总不是铁打的。你们未必没有这样干过。”

将军怀着深仇大恨，简短地举了这几个战斗中“出其不意”杀敌例子，使全场400余人全神贯注，一片肃然。

这年8月，我请求上前线了。我在二分校任职整整两年，亲眼看到将军为训练抗日健儿，不分白昼黑夜，总是出现在山岗上、田野里，以及各种军事技能的练兵现场上，躬亲督促检查。他所艰难缔造和领导的二分校，常以在校的官生5,000余人，在他严格要求下，形成了杀敌救国而早夜操练过硬本领的艰苦校风；麻鞋、布衣、横皮带，官生一致；劈刺及各种技能教具，自己制造；各种军事学科教材，自己印刷；建房、造

纸、……，无不自力更生。二分校继承了真正的黄埔精神，只是我的记述，未尽将军对祖国人民的功勋于万一，未尽二分校的业绩于万一罢了。

我自离开学校以后，再没见到过将军了。直到湖南和平解放，才从报上得知将军加入了中国人民政权工作，令人欢欣不已。于是我想：一切真正的爱国志士，其立身行事为将军者，必然为党和人民所欢迎、所颂扬、所重用。而当年九战区湘北抗日几次大捷的辉煌战果，都凝聚有将军忘我辛劳的汗水，也凝聚有将军培养出来的数以万计、身先士卒与鬼子拼搏的黄埔二分校学生的头颅和鲜血。他们的不朽救国勋业，必将永垂史册，千秋灿然。

国际军事情报专家杨宣诚

黄 曾 甫*

杨宣诚，字朴园，行十三，身材修伟，高有一米八、九，人称“杨长子”，亦称为“十三长子”。1890年左右，出生于长沙东乡清泰都板仓杨公庙附近张家大屋（今属开慧乡）。其先以耕读继世，家风朴实。杨宣诚兄弟甚多，五兄杨薪园在湖南当过法官，七兄杨芷园，清末秀才，为王先谦的得意门生，读过岳麓书院。

我们老家也在长沙东乡，与杨家同里，相距五、六华里，先世有通家之谊。我与杨家之弟杨爱吾等是附近隐储附小同学，也常随父到杨家作客，我呼杨宣诚为“十三伯”。

杨宣诚从小离家在外读书做官，先后留学日本、英国，学海军，对日本政局民情很有研究，有过“日本通”之誉。

1922年至1924年北洋军阀赵恒惕主湘政，倡联省自治，制省宪，设交涉司，办理外交事务，委杨宣诚为司长。交涉司署设盐道衙门。

1923年3月下旬，湖南各界以日本租借我旅顺、大连期满拒不归还，发起收回旅大的示威运动，参加游行的群众达六万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口号，并向驻长日领事提出“警告书”。至5月下旬，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进入高潮。6月1日，停泊湘江中的日舰

*黄曾甫，湖南长沙人，与杨宣诚系小同乡，黄、杨两家系世交。

“伏见号”水兵20余人，竟登陆向示威群众行凶，枪杀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重伤9人，轻伤数十，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湖南的第一次公开屠杀。杨宣诚当时以交涉司长承办此案，在群众支持下，与日方反复折冲，舌剑唇枪，持态颇为严峻，又因他平时为人正派，因此，长沙人对他还少非议。

1924年，有一次在通泰街表伯陈恭吉家中，我听杨说他衔命到北京谒见外交总长顾维钧的经过。杨说他不谙当时官场积习，到北京第一天，雇马车去外交部，门役请他循序挂号，听候传见。第二天去问讯，说总长今天不会客。第三天他拿出湖南省长公署的紧急公文，才勉强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久坐没有动静，见茶几上放有雪茄，便随手取出一支点燃消遣，被侍者瞥见，粗声粗气地对杨说：“这是小的们出钱买来招待国宾的……”杨不忍堪，摔烟负气而出。恰遇旧时留日某同学，实告经过，同学笑曰：“先生未免书生气太重了！今日事一切非钱莫办。”次日，同学代雇汽车陪同前往，入门即出10元钞票一张赏门役，耳后即闻“谢杨大人赏”之声，入会客室，门役为燃火敬雪茄，杨又以10元赏之，遂上楼见到顾维钧。

杨说完此事，环顾我等说：“你们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做诨气官。做官是一条闭气的背时路，冒得饭吃，宁可回乡里作田去。”可惜杨宣诚没有照他自己说的去做，浮沉宦海，半世飘零，竟不得其终。

1936年，杨宣诚一度被派为驻日本大使馆武官，抗战时期，颇为蒋介石所器重，任为军事委员会外交特派员，组织班底，研究国际问题，又任外事局长和侍从室某职，随蒋参加中、美、英开罗会议。杨因为对日本情况掌握较多，又擅长英语，风头颇足。

1944年，长沙沦陷。我携家到重庆，住在江北第二十一兵

工厂堂兄黄时康处，遇表兄陈健曾（外交部亚洲司科员），同到林森路谒见杨宣诚，当时他佐程潜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闲谈中，杨很诙谐地说：“我是同王芸生一道搞国际情报的，我看这个仗打不久了，明年定会起变化的。”当时他讲这话，我也没有追根究源，第二年（1945年）日本果真投降了。后来才知道，杨宣诚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盟军建立了彪炳勋业，蜚声国内外。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宣诚任大本营第一部情报组处长，兼第五部对敌宣传组长。成立军令部后，杨出任第二厅中将厅长，主持对日作战的军事情报工作。这是他一生中最忙碌，也是最有建树的时期。他在军事情报工作中，组织严密，分析精辟，用人不论派系，惟求有真才实学，实干苦干之士；对下属工作要求严格，但生活上则关心备至，人咸乐为之用；他自己则埋头苦干，废寝忘食，讲求身教。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陆海空三军的情报工作，在盟军中逐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苏联曾向我提出，要求在重庆建立中苏合作的特种情报所。杨宣诚受命兼任所长，苏方以格级官担任副职。

军令部第二厅每周照例举行一次盟军情报交流会议，要重庆的各国派驻武官和军事代表一律参加。夏季气候炎热，有些外国军官着便装出席，杨严肃宣布：“此乃盟军军事会议，不着军装者不得与会。”从此各国军人来二厅接洽公务，莫不戎装整齐。他们中间还互相传述：二厅的翘胡子将军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军人，一切礼仪千万不可忽视。由此可见，杨宣诚在盟军中威信之高。

《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亦为著名国际情报权威。每当战局有重大转变之时，辄利用夜晚来访宣诚，讨论战局发展诸问题，回去后写成星期论文，多采杨氏意见，对战局发展之分析

与预测，非常精辟，深为社会注目。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第二厅的监视电台，忽然测听到一个新出现的电波，距离很远，电波微弱，不久又消声匿迹。经过破译，才发现是日本太平洋海空军联系电讯。杨当即命令派一组监测电台日夜监测这一秘密电波。临近珍珠港事件前夕，这种电波又出现，它忙碌地向太平洋地区调动和布置大批海空力量。根据这一情况，结合当时世界整个战局，杨宣诚判断日本将在太平洋地区，特别可能向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向要点有所动作。他当即向蒋介石报告，并建议将这一分析向美军通报。获同意后，一方面在重庆召开盟军驻渝军事代表紧急秘密会议，通报这一情报。当时外国军事代表多持怀疑态度，有探询情报来源者。杨宣诚答复：此系中国军事情报秘密，碍难奉告；一方面由中国驻美武官郭室权、副武官肖勃向华府亲自提供这个情报。罗斯福总统为此召开三军参谋长联系会议进行研究，但可惜他们没有加以重视。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想起此事，深为懊恼，曾向蒋介石提出，要求中国派一位海军将领，精通英、日文字的军事情报专家，作为他的私人顾问。这不啻指名要调杨宣诚。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蒋却派了商震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赴美。

日军攻下香港后，在研究新加坡的前途时，有些人认为，大英帝国在新加坡苦心经营近20年，以新加坡要塞为其东南亚防御枢纽中心，并有最新型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参加防御，应是固若金汤。杨宣诚从军事情报战略形势予以分析判断，独持不同见解。他在高级军事会议上侃侃而谈：

“新加坡要塞原设计偏重于保东西方航运畅通，对来自海上之攻击虽可称尽善尽美，但忽略了，也没有考虑到马来西亚的陆上进攻，因而留下了薄弱环节，依然有隙可乘。正加欧洲战场马奇诺防线一样，前车之鉴，不可不重视；海上虽有两战舰设

防，然而英国空军多集中于本土及欧洲，空中掩护薄弱，故新型战舰也不一定可恃。”与会某高级将领对杨之论述大不谓然，并说杨有悲观情绪。不久，形势发展，果为杨宣诚的精辟分析所言中。“威尔斯亲王”和“却敌”两艘巨舰均被日军击沉，而新加坡要塞则为来自马来西亚的日本陆军攻陷。此时，国际军界对中国杨宣诚的洞悉战争形势和其精辟分析，莫不深表钦佩。

英国在东南亚战场失利后，1942年初，乃向重庆要求派遣军事情报主管到印度，共商加强军事情报合作问题。杨宣诚奉派赴印，与英国东南亚地区盟军最高统帅蒙巴顿勋爵会谈，商定由中国政府派遣航空委员会建制下的电讯情报人员驻印，与英方空军情报部门合作。由倪耐承、邱沈锡等30余人组成赴印工作队，他仍在加尔各答工作一年多，帮助英方在空军作战中取得了不少胜利，深受英方赞赏。

1940至1944年将近五年的时间里，重庆在沉闷的气氛中，忽然冒出一股日苏必战的论调，日本北进之说，一时甚嚣尘上。杨宣诚高瞻远瞩，独持异议，断定日本必南进与英美一战，决不会北进与苏交战。闻若大哗，甚至斥杨无国际常识。事实再度验证了杨的预见。

1944年3月，中、英、美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发表开罗宣言。宣言草案规定，战后日本必将台湾归还于中国。杨宣诚发现未提澎湖列岛，当即告之负责外交工作的王宠惠。王认为澎湖列岛是台湾的一部分，宣言现已说明台湾归还中国，澎湖自然包括在内。宣诚指出当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写明割让台湾与澎湖，两者并提，是由日方提出，李鸿章当时亦持澎湖包括在台湾之内的说法，但日方坚持必须并提，其意盖恐我国将来又将澎湖划出割让或租与俄国，或并入福建省管辖，因李鸿章素以亲俄著名，故日本特别重视，如今宣言不另列澎

湖，与马关条约不合，战争结束，日方若借口不将澎湖归还，交涉必感棘手。王听此说，深以为然，即出面通知美国在草案中加列澎湖。

1945年日本投降，重庆各影院争相放映日本投降影片，在美舰米苏里号受降仪式上，中国代表团一个穿海军中将制服，蓄八字胡须的长子站在团长徐永昌后面，特别显目，此人即是杨宣诚。

杨参加受降仪式后飞返重庆，我和黄时康、陈健曾及表弟余华厚4人一道去看他，谈及看受降影片的事，杨大发牢骚说：“程颂公（程潜）真不争气，这次出国受降，雪甲午以来的大耻，是历史上一件大事。我们一些湖南人都想支持颂公当团长，他以参谋总长之尊（按当时参谋总长为何应钦，程为副总参谋长），声望合格，我们同去也可沾光。不意中央开会时，这个老头子偏偏在头一晚打了一通“梭哈”（一种扑克游戏，可用以赌博），忧误了瞌睡，不争取发言，致被孔祥熙抢先提名他的山西同乡军令部长徐永昌当了团长。这个徐团长人又矮，又少威望，我们当随员的，都感到失格。”我们问起他穿海军制服时，他又发牢骚说：“你们知道我是学海军，可是我没当过一天海军。这身制服是前年派定我为参加开罗会议的随员，蒋老板特地派人为我做的。后来桂永清（复员后任海军总司令）他们还很不舒服，我也一直没穿过，去参加受降仪式这是第二次穿它。”我们又问他战后有什么新任务？因为抗战胜利了，我们这些人都指望找条好点的出路。不料这一问又把他的牢骚引发了。他说：“不要说起，出国前，蒋老板放我大连市长，我也有心带你们几个同乡侄子去闯个前程，那晓得回来之后却变卦了，大连被沈恬抢去了。昨天又说要我到北平市长熊斌那里去当秘书长，我想自己是去做“姨太太”，难道忍心带你们去当‘丫头’？算了、算了，还搞几年，我也要告老

回乡，到那个时候，烧点老糠火，大家来扯扯谈吧！我搞了大半辈子，一肚皮材料，你们能写的，把它记下来，也是一部很好的野史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杨宣诚情报工作出色，赢得我国和盟国的奖励，曾先后获得我政府授予云麾勋章和宝鼎勋章，英美法苏等盟国，亦均授予勋章。1947年初，美国政府还在台北为杨受勋。1986年，杨宣诚次子隆嘉，曾上函美国总统里根，请将杨宣诚被授勋的文件复制发下。该文件称：“这是为了中国海军中将杨宣诚，在中国以军事情报首脑身份做出的优越功勋，而授予司令级军团功勋勋章。”

“在美国海军代表团1943年5月5日到1945年9月30日在华期间，在对敌作战中，杨将军曾予以大力协助，而极大地增强了同盟国作战能力。”

“杨将军是留学日本，从事海军与军事战略研究的。并且因为他在日本多年，与日本的密切接触的结果，他完全了解与掌握日本人的心理。由于这个背景，他能多次准确地预测日本的远东战略。在他收集情报工作中，杨将军在情报战斗中直接指挥他的部属，并且多次亲临敌后战斗。他在工作中的突出功绩，是与同盟国武装部队的最高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有人说，杨宣诚在旧社会官场中，还不失为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他没有在城里乡下置过产业，也没有讨过姨太太。1944年岁暮，当时湖南省主席薛岳到了重庆，对一些湘籍老牌军阀官僚，分别有不同的馈赠，杨也收到法币500万元，杨当时正需钱过年，但毅然壁还之。对人说：“我杨十三一生就是不要这些钻狗洞的钱！”

杨后来随陈仪去台湾，在日月潭资源委员会一家电气公司当董事长。1962年3月23日于台北逝世，终年73岁。

（曹铁安 整理）

我所知道的肖作霖将军

陆 印 泉*

肖作霖，字克念，笔名肖卓麟，湖南湘潭县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是我的老上级，又是我的谱兄，两人相处60余年，可称是知己的老朋友。我久要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杂务繁冗，未能如愿。这次，我下定决心写出这篇回忆录。

一、中国文化学会

我与肖作霖之相识是由于南京流露文艺社的关系。

三十年代初，我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爱好文学，时常向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报刊投稿，在流露文艺社出版的《流露》杂志上也发表过《女看护》等小说。该杂志系由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左曙萍联合其他黄埔同学肖作霖、唐纵、陈漫生等人所创办。当时，左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其所办的《流露》杂志，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津贴，数额约为每月银洋100元。他们为了使《流露》杂志办得更有起色，决定改名为《中国文学》月刊，另外物色编辑人员。

我有个同乡藏心在（我是松江县人，他是奉贤县人，同属松江府），也在中央大学读书，比我高两班，两人相处颇善。他与左曙萍相识，被邀为《中国文学》编辑。但他是应届毕业生

*陆印泉，与肖作霖相交60余年。现任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年80岁。

生，忙于撰写毕业论文，便请我也参加编辑工作。因为左曙萍曾经读过我的小说，很快就得到了他的同意。

在此期间，肖作霖在南昌搞“复兴社”工作。“复兴社”的全称为“中华复兴社”，即外边所说的“蓝衣社”。1932年初，何应钦的秘书刘健群上书蒋介石，建议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希特勒的“褐衫党”，成立“蓝衣社”。蒋介石虽然爱好法西斯主义，但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称为“蓝衣社”，便采用黄埔一期学生鄧悌、滕杰等人的建议，称为“中华复兴社”。总社设在南昌，因为蒋介石正在那里同共产党打仗，后来迁至南京明瓦廊，以蒋介石为社长。

复兴社骨干分子邓文仪、贺衷寒、吴寿彭、肖作霖等商谈，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次“文艺复兴”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于1933年12月25日在南昌成立“中国文化学会”。该会宣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反对自由，反对民主，拥护蒋介石为“最高领袖”。该会以蒋介石为名誉会长，邓文仪为理事长，肖作霖为书记长，会址设在南昌戴家巷14号。

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为了打开局面，首先想在上海成立分会，总会派肖作霖由南昌来沪筹备。肖于1934年2月到达上海后，就与原来在沪的“复兴社”骨干分子刘炳藜、倪文亚、孙伯寿等人组织上海分会筹备委员会，在大学中吸收教授、学生和作家、记者为会员，共700多人。在成立大会上，选出上海市长吴铁城、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和刘炳藜、倪文亚、孙伯寿等20余人为理事。又推吴铁城、刘炳藜、肖作霖为常务理事，而由肖作霖负实际责任。

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设在环龙路（今改名南昌路）76号，是一幢三层楼的里弄洋房，底层为会客室和贮藏室，二楼为《前途》杂志主编人刘炳藜的办公室，三楼为肖作霖和其他工

作人员的办公室。

该分会出版了《前途》、《中国革命》、《青年与战争》、《文化周刊》几种刊物。肖作霖是流露文艺社成员之一，主张把在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月刊移至上海，作为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的出版物之一。在左曙萍的心中，对此是不同意的，但彼此都是好友，而且肖的政治地位比左高，也就勉强同意了。

于是我由南京到上海，办理《中国文学》的移交工作，并在上海拉了一些著名作家赵景深、李青崖等人的文章。肖作霖喜欢讲排场，以银洋800元买了一部破旧的小汽车。他与我同坐这辆车子到福州路现代书局，将《中国文学》第3、4期的稿件交付印刷。

《中国文学》移沪后，肖作霖组织编辑委员会，委员有赵景深、李青崖、汪馥泉、肖作霖、陆印全、左漱心（即左曙萍）、殷作桢等人。其实，大家都是挂名的，实际负编辑责任的是殷作桢。此后，我从南京返回家乡松江而路过上海时，都到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去玩玩，所以与肖作霖及其他工作人员殷作桢等都很熟。

在这期间，我发生了一件与中国文化学会有关的事件。1934年初，我给《现代》杂志主编人施蛰存寄去一篇小说《四月的紫堂花》，施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但遭到了他的退稿。后来，这篇小说发表于广州的《东方文艺》。我年少气盛，一怒学下，就写了一篇杂文，题为《漫谈施蛰存》，发表于中国文化之会所编的《文化周刊》上，胡说他不学无术云云。现代书局总经理洪雪帆对此极为不满，因为《现代》和《文化周刊》都是由现代书局发行的，我们攻击施蛰存，势必会影响《现代》的销路。

为此，洪雪帆向肖作霖提出交涉。肖作霖对我说：“在文坛上，第三种人（指施蛰存、杜衡）还不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做事应该分主次，我们不应该攻击第三种人。”说这些话的时

候，他心平气，和对我丝毫没有责斥之意，我对他开始有了好感。

结果，肖作霖写了一篇调和的文章，刊在《文化周刊》的头条地位，题目已经忘记了。该文一开头，就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说第三种人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应该听其自然，反对是徒然的。

1934年7月，我从松江来到上海，去找了肖作霖。他态度消沉，轻声对我说：“中国文化学会正在办理结束手续，一切报刊将随之停刊。”

为什么要结束呢？这是蒋介石对邓文仪不满所引起的。蒋介石曾派徐培根到德国去购买飞机，因为徐从中贪污过多，飞机没有买足架数。事被蒋介石得知，准备派人前往南昌机场清点架数。徐培根丧心病狂，竟纵火焚烧了飞机场，企图借此“毁尸灭迹”。蒋介石大发脾气，立即将徐扣押，并派邓文仪彻查案情。邓文仪有意包庇徐培根，作了一个虚假的汇报。同时，蒋介石又听信CC系陈立夫的告密，说中国文化学会在外胡作非为，在文化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蒋介石一面撤销了邓文仪的一切职务，一面下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学会。

二、创办《内外杂志》

中国文化学会上海分会撤销以后，肖作霖由上海来到南京，先住在石板桥的徐挽澜家里。徐是中央大学军事教官，系黄埔军校四期（或五期）毕业生，与我也相识，他的妻子与我是松江同乡。我多次去找徐挽澜和肖作霖。肖的身体很坏，有一次竟突然晕厥。我劝他服用鱼肝油，他一笑置之，不加可否。当时官员的薪水很高，徐挽澜每月有100余元可拿，经常在家中宴请宾客，肖作霖、左曙萍、程登科（中央大学体育系教授）和我总是被邀之列。

1935年我因病休学一年，在家乡疗养，与肖作霖中断往来几

乎达一年之久。1936年初，我赴南京中央大学继续读书，这已经是四年级下学期，快毕业了。我去找了肖作霖，他已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上校设计委员，住在新街口的一幢小洋房里，两楼两底，楼下为会客室和餐室，楼上为卧室和客房。他一个人住这么多间房屋，可谓阔绰之至。照料他生活的是副官申待诚。

他在生活上讲究三种东西：第一是住。即使抗战时期在重庆的时候，许多人住木板房屋，但他仍然住洋房，独门独户，不过只有大小两间而已。住旅馆，在南京时总是住中央饭店，在上海总是住国际饭店、东亚饭店和扬子饭店。第二是行。他不肯步行，不喜欢坐三轮车，而喜欢坐小轿车。有时，他的汽车出门去了，他宁可在上海车站等上二小时，也要坐轿车回家。第三是皮鞋。为了使足下生辉，喜欢穿最好的皮鞋，而且擦得精光呈亮。但对于穿和吃，却十分马虎。他常穿中山装和军装，穿西服时也并非挺括。对于吃，他不大讲究，一个人时，只叫人去喊碗肉丝面，或吃一二只面包，就算了事了。

1936年夏，我经左曙萍和肖作霖介绍，在南京参加了“复兴社”。参加之前，按照规定：入社的表格应由介绍人填写。而我与左、肖两人很熟，就由我自己填写了。入社表上没有“中华复兴社”字样，而是一行空白。其中内容有：姓名、原名、别号、性别、年龄、籍贯、地址、出身、学历、简历、嗜好、特长、祖宗三代的姓名、家庭人口、经济情况、思想情况、入社动机等等。

表格送上去以后，隔了一、二个月，左曙萍通知我到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通讯处大礼堂去参加入社仪式。到会有400至500人，都是新参加的，贺衷寒、邓文仪、潘佑强等人都讲了话。结束时，大家举手宣誓。誓词内容大概是：服从“领袖”，笃信三民主义，服从社的一切命令，严守社的秘密。如违誓

言，愿受最严厉的制裁。“复兴社”是个秘密组织，任何人不得对外公开。上级发通知或向上级汇报情况，都用代号。不过这些代号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入社后，肖作霖还劝我到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育班去受训几个月，取得“蒋介石的学生”的资格。这样，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会大有帮助。我说：“我过不惯军事生活，最怕受训。”他听了，也不勉强我，所以我始终没有进过中央军校。

1936年夏，我毕业于中央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天，我经同学杨文藩的介绍，担任学术研究会附设的大道通讯社编辑，每天工作一、二小时，薪水极低，只有40元。我对此是不满意的，于是“骑马找寻”，继续向各方找寻工作。

肖作霖所在的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是个庞大的机构，全国十几万政工人员统由它指派。他听说政训处将指派一批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官，阶级在少校至上校之间，马上介绍我去见处长贺衷寒。该处规定，凡是初次做政训工作的干部，必须经过考试，及格后方能录用，但有著作的人可以免试，我就带了在报刊发表过的文章去见贺衷寒。

贺衷寒有个怪脾气，喜欢问你奇奇怪怪的问题，如“《三民主义》有多少页？”“你刚才走过的楼梯有多少级？”等等。如果你答得对，当然很并，认为你做事细心，读书认真。倘若你答错了，也不要紧，但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你可说：“处座的《三民主义》320页，而我的《三民主义》确有298页，因为版本不同。”他听了，很高兴，就会录用你。如果你支支吾吾，含糊其辞，答不出来，他认为你是一个草包，那就不会用你了。

黄埔系官员多半继承蒋介石的传统，对军人动辄训斥，对文化人则比较客气。贺衷寒对我并未询问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只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了。不过你的年纪太轻。学生

的年纪都比你大，你怎么能做他们的教官？还是派别的工作吧！”只有几分钟，谈话就此结束。

于是肖作霖又介绍我去见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副处长袁守谦。当时他兼国民党中央党部军队党务处处长。他说：“我们要在南京各军事学校增设特别党部，派你到那里去工作，好不好？”我说：“好的，谢谢处座的栽培。”出来后，就在肖作霖的办公室里，向他汇报了袁守谦接见的情况。肖说：“做党务工作，必须是国民党党员，你是不是党员？”我答：“不是。”他说：“你赶快去办理入党手续。”我经同学杨文藩介绍，去见国民党中央委员王祺，王又找洪陆东、王陆一两个中央委员，三人一起介绍我参加国民党，这叫做“特别入党”。特别入党的党员都没有经过支部会议讨论，所以自始至终，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支部的组织生活。

同年8月底，袁守谦派我为国民党陆军交辎学校特别党部同少校干事，地点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后面。年底又升我为陆军通讯兵学校特别党部同中校主任干事。

这时，肖作霖创办《内外杂志》，叫我做主编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其中有论文、通讯、小说等项，而以论文为主，每月出版一次。该刊由政训处每月津贴200元，经费收入纯由肖作霖自己掌握，我从未过问过。《内外杂志》一直由我编辑，迨至“八一三”战役发生，才宣告结束。该刊撰稿人有叶青（当时叶青尚未投降国民党）、谭辅之、丁逢白（当时丁逢白尚未反共）、方秋苇、肖一山、张肇融和我等人。

三、北战线《阵中日报》

1936年底，复兴社河南省书记肖洒无恶不作，被蒋介石撤职，改派肖作霖继任，地点在开封。他的公开职务为新生活运动河南省分会书记，兼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通讯处河南省分

处主任。后来，他又在刘峙的河南省绥靖公署挂一个少将参议的名义，又创办《中原日报》，自任社长。

肖作霖有个性格，就是不愿做实际工作，往往把日常事务交给一个亲信全权处理，而自己则从事于交际应酬，所以被人称他为“交际部部长”。这时，他的工作单位虽然远在开封，但经常来到南京，不是请客，就是应酬。当时，与他来往的有邓文仪、袁守谦、肖赞旨、唐纵、左曙萍、罗寄梅、李元杰、王汝淳等人。我也常去看他。他对我说：“我的走路有龙盘虎踞的体态，照相术说，极为主贵，将来可以做内阁总理，届时当然派你为部长了。”说着，他立起身来，走了几步。我不相信迷信，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唯唯诺诺而已。

一天，肖作霖从开封抵达南京，突然通知我，叫我马上到段诗园家去。段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交际科总干事，他的家住丁家桥附近，具体地点已忘了。抗日战争中，他全家被日本飞机炸死于武汉。李元杰（时任国民党陆军兽医学校特别党部书记长）、肖作霖都已经到了段家。肖说：“我们结拜为兄弟，今后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大家都表示赞成。

于是点起红色大蜡烛，烧了一炷香，每人用一条红纸，上面写明自己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继而都把它焚烧了，并相互握手鞠躬，称兄道弟。按照年龄大小，称段诗园为大哥，李元杰其次，肖作霖居第三位，我最小，大家称我为“小老弟”。

1937年“八一三”战役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蒋介石亲笔写了一道手令，计有2张八行笺，叫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在东战线、西战线、北战线分别创办了《阵中日报》，以供前线将士阅读。东战线《阵中日报》社长为张佛千，西战线和北战线统由肖作霖挂社长名义。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因对西安事变表现不好，被蒋介石免职，改由副处长袁守谦升任。抗战发生后，袁守谦赴

北方视察，在开封时与肖作霖见面，肖作霖推荐我为西战线《阵中日报》总编辑（地点在太原），得到了袁守谦的同意。他们两人便联合打电报给我，叫我火速赴开封。

10月间，我从南京出发，搭车抵开封，到新生活运动河南分会去找肖作霖。此时，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太原也告失守。我只得在旅馆内闲住。肖作霖叫周南送给我法币100元，并派河南大学毕业生、复兴社分子王文耕以助理编辑名义，做我的助手。王陪我游览了开封的各处名胜。解放后，得知王文耕是中共地下党员，是打进“复兴社”去的。

在开封住了一个月左右，看来西战线《阵中日报》是办不成了，我准备回南京。其时，北战线《阵中日报》已经创刊了，地点在郑州，因总编辑王佛崖与经理程仲文发生磨擦，肖作霖将程仲文免职，叫我前往继任。经我的推荐，程仲文赴开封任《中原日报》总编辑。不久，王佛崖调往南阳，我改任总编辑，后又为代理社长。

1938年初，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奉命在南阳成立河南省战时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主任由商震兼，教育长由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晏勋甫兼，实际上由副教育长肖作霖负完全责任。训练班只办一期，几个月就结束了。

1938年4月，日军以强大兵力进犯河南，开封失守，郑州亦岌岌可危。我与肖作霖联系后，两人联袂赴武汉，请示《阵中日报》究竟迁至什么地方。当时南京早已沦陷，武汉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扩建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下设3厅：第一厅厅长为贺衷寒，主管军队政训；第二厅厅长为康泽，主管情报；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主管宣传。肖作霖向贺衷寒请示结果，决定将北战线《阵中日报》迁至西安，并于同年7月7日复刊。

在西安期间，我与肖作霖发生过一次误会。在南阳的河南省战时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时，肖作霖爱上了一个年仅22岁的女学员。该班结束后，肖作霖把这个女学员安排于《阵中日报》社，叫我多加照料，因为他早有妻室，未便带在自己的身边。不料该女学员与报社发行主任发生了恋爱。

有一次，肖作霖从河南到西安来，投宿于西京招待所，我去看他，从实汇报了该女学员谈恋爱的情况。他听了，大为震怒。我与他相识多年，从未见到他发过脾气，这是第一次。他回河南后，写信给我，说报纸的发行工作做得不好，暗示我把发行主任调走。我当时只是20多岁的青年，涉世不深。我反而写信给他，说发行工作做得很好，不错。

同年9月中旬，肖作霖赶来西安，召集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举行会议，宣布：“总编辑陆印泉另有任用，调往河南，派北京大学新闻系教授许兴凯继任。”当晚，9月17日写好最后一篇社论后，从报社搬至旅社居住，并着手办理移交手续。

到河南去干什么呢？肖作霖早就代为安排妥当了，叫我在洛阳的第一战区政治部第三科任中校科员，后升为上校秘书，主任为袁守谦。后来，河南战局稳定，北战线《阵中日报》从西安迁回洛阳，袁守谦叫我重回《阵中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象过去一样，由我负报社的实际责任。

1939年夏秋之际，在西安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准备在陕西咸阳成立特别训练总队，经胡宗南推荐，派肖作霖为少将总队长，地点在北关的原棉花打包厂旧址。其目的有三：一是扣留意欲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二是关押抗日大学毕业的学生及其他革命青年；三是招收失学失业青年，给以法西斯教育。创办之初，“战干团”副团长胡宗南有过指示：

“要以异党（指共产党）分子训练成为异党分子。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来施行各种训练。”

特训总队是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前身，实际上是一所集中营。肖作霖出任总队长以后，写信给我，叫我去做上校教官。我回信给他，婉转地加以拒绝。肖作霖叫我做什么工作，我总是百依百顺的。这次回绝，是仅有的一次。为什么？因为我不愿参加迫害中共分子的工作。该总队大队长黄震亚叫我去做上校大队附，我也没有答应。

一年不到，蒋介石下令将特训总队撤销，免除肖作霖的职务，改名为军事委员会西北青年劳动营，派蒋坚忍为教育长，主任由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兼。

肖作霖被免职以后，赴平凉担任师管区司令，其地位相当于师长，从事招收、训练新兵工作。我则仍在洛阳搞《阵中日报》，直至1941年底。

四、办经纬出版社

1942年初，我应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扫荡报社社长何联奎之邀，由洛阳出发，前往重庆，担任该报副总编辑之职。当时西北交通困难，来往不便，我请驻在宝鸡的交通部川陕驿运管理处主任徐挽澜设法交通工具，但久久没有便车可搭，耽误了行期，到重庆时已经3月底了。《扫荡报》社长何联奎已经辞职，由副社长刘威凤代理社务，并奉蒋介石命令：《中央日报》与《扫荡报》合并。《中央日报》社长陈博生叫我继续担任联合版的撰述委员。但我听从肖作霖的话，进了经纬出版社。

这时，肖作霖已辞去平凉师管区司令的职务，在军事委员会挂一少将参议的空名，在重庆与毛庆祥、唐纵等创办经纬出版社，实际负责的是肖作霖。该社设常务理事3人，理事若干人，通是国民党中上层人士和较有经济实力的工商人士。

该社常务理事3人：一是毛庆祥，时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

中将主任，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二是唐纵，字乃建，时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组长（抗战胜利后，他在南京任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保安局中将局长。后来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三是肖作霖。

理事中有：徐鸿涛（浙江人，与肖作霖同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时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少将副主任，是毛庆祥的得力助手）、叶南（叶楚傖的儿子，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少将参议）、胡伯翰（时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戴铭礼（时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鲁佩璋（时任财政部主任秘书）、李元杰（时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简任秘书）、端木恺（时任国家总动员会议秘书长）、陈克文（时任行政院简任秘书）、汪日章（时任侍从室少将秘书）、夏晋熊（职务不详）、石凤翔（西安棉纱大王，蒋纬国的岳父）、黄雍（字剑秋，时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处中将处长，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李维城（时任聚兴诚银行协理）、杨燊三（时任聚兴诚银行总经理）、沈士灵（重庆某工厂总经理）、杨晓波（时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沈重宇（黄埔军校毕业生，时任长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邓飞黄（时任立法委员）、陈羲伯（时任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第三、五、九炼油厂联合办事处主任）、李卓之（黄埔军校毕业生）、陆印泉（时任经纬出版社总干事）。

经纬出版社还没有监事2、3人，他们是：徐挽澜（时任交通部川陕驿运管理处主任）、卢建人（时任长江实业银行储蓄部经理）。

理事会每年召开会议一次，由肖作霖汇报工作情况，并拟定新的工作计划。理监事设得很多，只是虚张声势、拉拢关系而已。起初，肖作霖对出版社很负责，每天都来出版社一次，以李卓之为经理，我为副经理，还有工作人员4、5人，很象一个小小单位的样子。但肖作霖有个缺点，创办公事业总是虎头

蛇尾，时间一久，就不感兴趣了。后来，肖作霖不大前来办公，李卓之又离职他去，就委我为总干事，处理日常事务。肖作霖有个长处，就是善于交际。如他与毛庆祥本来不熟，但因为出版社的关系，他们相处极为友善。毛当时在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然而经常来看望肖作霖，两人一谈就是1、2小时。

先后过问过经纬出版社业务，除肖作霖以外，还有唐纵、叶南、李维城、徐鸿涛、沈士灵、邓飞黄等人。该社出版过一个剧本，名曰《田横》，肖作霖著。还出版过两种刊物：一曰《经纬》杂志，每月一期，有论文，有文艺，以论文为主，16开本。作者有陶希圣、杨杰、肖一山、郑学稼、叶青、胡秋原、陈钟浩、杜衡、侍桁、谢冰莹、肖作霖、陆印泉等人。二曰《经纬副刊》，也是每月一期，这是一个软性刊物，有小说、小品、杂文、漫画等等，内容以幽默、趣味为主。《经纬》杂志的编者，没有具名，只注明由经纬出版社出版。《经纬副刊》创刊较迟，编者具名为邓飞黄、陆印泉。

经纬出版社的业务不佳，其原因有四：第一、我们的刊物不能代老百姓讲话。该社虽不是官方机构，但多少还带有官味。第二、出版社的领导层都是文化界的外行，乱出主张。第三、我们只重视编辑和出版，而不注意发行。第四、与重庆出版界没有联系，得不到他们的支持。该社勉强维持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

在重庆，肖作霖还发起组织中国建设协会，于1945年春在新街口“新生活运动总会”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20余人，其人选大部分就是经纬出版社理事，不过多了邵力子和莫德惠，他们被推选为名誉领导人，实际负责任的是肖作霖。抗战胜利后，该会移至上海。在会内做具体工作的是程仲文，他是肖作霖的老部属。

1944年，国民党兵役总署扩充为兵役部，以鹿钟麟为部

长，肖作霖任该部国民兵司中将司长。到任之前，蒋介石召见肖作霖。回来后，我问：“委座接见情况怎样？”他说：“不要说了，我被他大骂一顿。如果我将来得势，第一个杀掉的就是蒋介石。”之所以被骂，因为肖建议做国民兵工作，基层要讲民主，上层要讲集权。蒋介石听了大怒，说：“你受了共产党的毒，什么民主不民主！”肖作霖怒气一消，还是到兵役部上班去了。

五、南京的《大道报》

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以后，兵役部撤销，肖作霖申请退役，仍保留中将军衔。他的军衔是经军事委员会核定，并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的，所以可保留，未经过此项手续的，则不得保留军衔，更不得终身享受。

肖作霖到南京后，着手筹办《大道报》，地点在太平路安乐酒家对面。这里原来是日本军人俱乐部，由军事委员会黄雍接收后，交给了肖作霖。我原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工作，这是一个受降机构，受降手续一办完，即告结束。肖作霖叫我担任《大道报》总编辑，后兼副社长，社长由肖作霖自己担任。

肖作霖办报的目的，是要骂国民党，因为他感到国民党即将垮台，想从办报中找寻一条自己的出路。我秉承他的意旨，主持笔政。有人说：“《大道报》是一张五彩缤纷的报纸：第一版是青色，因为国内外的消息都来自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第二版是黄色的，刊载的尽是一些社会新闻；第三、四两版除了广告以外，所刊文章多半是讽刺国民党，所以说是近于红色的。国民党在接收中“五子登科”以后，信誉扫地，人人对其不满，所以喜欢看《大道报》，销路最多时达9000份。《大道报》每天出版对开一张，星期日或节日再加半张。该报于1946年夏季创刊，刚满一年，于翌年夏季结束。

在一年间，《大道报》发生了好几件纠纷：

其一、有个外勤记者送来一条消息，说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50寿辰，从上海邀来某著名女伶参加堂会，唱《风还巢》助兴。记者问我：“你敢不敢登？”我说：“新闻记者的职责是有闻必录。只要是事实，为什么不登？”就以大号字发表。陈诚见了，大发雷霆，叫新闻局副局长卿汝辑到报社来大兴问罪之师。我说：“请陈（诚）总长放心。如有不符合事实之处，请来函更正，我们一定照登。”这位副局长与我谈了足足一个小时，他才同意来函更正，但要求以大号字刊出。我答：“这点，我们会妥善处理的。”结果，以极小的字体，来了一个“来函照登”。

其二、一晚，一位姓滕的编辑对我说：“张镇宪兵司令家中的大批金银财宝被盗贼所窃。这个消息可不可以发表？”我说：“可以发表。”这位编辑就写成了一则消息，在报上用大号字刊出，还加上了一个花边。张镇得知后，立刻打电话给《大道报》社，叫总编辑到宪兵司令部去谈。我不在社内，他找不到我。我知道张镇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与肖作霖是知己朋友，我请肖从中斡旋，肖向张镇说声道歉了事。不过肖对我说：“凡是我的朋友，你不能乱来，否则叫我下不了台。”我说：“好的。”

其三、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份报道，说南京市自卫队贪污腐化，一塌糊涂。刊出后的当天，这个自卫队纠集几百队员，持枪实弹，包围了大道报社，玻璃窗被砸碎，电线被剪断，并扬言要促总编辑。我白天不在报社，没有被捉到。我们报社内有个小小的院落，里边有花、有草、有金鱼、有假山。他们把假山打坏，把花木踏平，说要等总编辑回来。社内秩序大乱，太平路中断交通达2小时之久。报社经理部打电话给首都警察厅，该厅派来了大批警察，才把数百名队员驱散。

当晚，报社编辑部同仁商谈此事。我说：“我们不能让步，要继续坚持强硬态度。区区一个自卫队，怕它干什么！”翌日，我们在《大道报》第二版头条地位，刊出一则消息，题目是“太平路昨中断交通二小时，因为我们说了南京市自卫队一个‘糟’字”。自卫队知道碰不过我们，也就不了了之。

类此事件，还有一些，但时隔半个世纪，有的已经记不清楚。有人听见延安的广播电台说：“南京《大道报》是国民党中的一份左派报纸。”《大道报》屡屡出事，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肖赞育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曾经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是肖作霖的侄子。他多次找肖作霖，说：“你办的报纸这样左倾，叫我这个侄子怎样下场？”肖作霖则无动于衷，仍然我行我素。因为两人是叔侄关系，肖赞育也无可奈何。后来，肖赞育来找我，对我说：“陆同志，你也要从你的前途考虑，在报纸上少骂骂。”我说：“你说得很对，但你的叔叔不改变态度，我也没有办法。你得多多劝劝肖作霖。”

不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着令《大道报》停刊3天。我们不能不遵办，在门口贴了一张大招牌，上书：“本报奉令停刊三天”。第4天复刊，态度还是老样子，没有丝毫转变。

翌年夏天，《大道报》宣告停刊，其主要原因是经济上无法维持。《大道报》的经费来源，是向军政要人募捐（美其名曰“认股”）和发行广告收入。肖作霖之办报，在经济上采取“以大治大”的方针，用人要多，规模要大。结果，人浮于事，开支浩大。加上经理部人员大部分都有贪污行为，肖作霖本人也时常挪用公款。肖从前虽然出任过几个肥缺，但他不会理财，从未置过房产，也未买过一亩地，始终是两袖清风。他的夫人张宛卿手里有点“私房钱”，也为数不多。

《大道报》虽已停办，但清理善后事宜，还是需要一笔

钱，于是张宛卿拿出“私房钱”，补发工资，偿还债务。但肖作霖办报之心未死，将《大道报》印刷所搬至上海，由徐鸿涛负责，继续出版。而南京则设立报社办事处，由我任主任。后来没有办成，因为徐鸿涛是个小心谨慎的人，认为办报不一定能赚钱，亏了，怎么办！

《大道报》结束以后，肖作霖闲居上海，地址为台斯德朗路（今名广元路）云裳村。他对我说：“国民党腐败无能，为时不久。共产党来了，象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拿点见面礼，他们是不会宽大的。起义，要有起义的资本。”因此，后来追随程潜有了起义之举。

六、追随程潜起义

1949年2月，我从南京到达上海，经友人介绍，参加了民革上海地下组织，从事反蒋工作。我到国际饭店去找肖作霖。这时，张宛卿已经去了香港，所以他住在饭店里。我推门进去，但见高朋满座，其中有李维城、黄雍、李世璋，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烟雾缭绕，态度严肃，好象在商量什么大事一般。我不便打扰，就退了出来。后来知道，他们在商谈策动程潜起义问题。

1948年7月，程潜交卸了武汉行营主任之后，蒋介石派他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随同程潜返湘的有：李默庵，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肖作霖，任湖南省保安副司令，一度兼长沙警备司令；邓飞黄，任省民政厅厅长；邓介松，任省政府秘书长；李维城，任湖南省银行总经理；黄雍，任黄埔同学联谊会会长，如此等等。肖作霖之出任省保安副司令，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但程潜信任他，照做不误。所有这些人员都是肖作霖的老朋友，程潜则为他的老上级。

据黄雍后来在华东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交代历史时说，他同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本来就有旧谊。在湖南时，他掌握一只秘密电台，夜深人静之际，常与林彪互通电报。

据李维城对我说，程潜对起义一节，起初犹豫不决。他虽然对蒋介石不满，但又害怕共产党，最好走第三条路线，不过第三条路线明明是走不通的。所以程潜心中十分苦闷，这表现在他的言行上，有时高喊“戡乱”，有时不谈“戡乱”。后来程潜终于走上起义的道路，一则因为解放军进展神速，势不可挡，二则由于他的智囊团的帮助。

程潜回湘之初，常常在晚间召集几个高级人员高谈政务，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智囊团，其中主要人物为邓介松、程星龄、肖作霖3人。程潜还成立了“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以肖作霖为主任。肖作霖出谋划策，力劝程潜走和平的道路。

据李维城说，程潜到了湖南以后，征兵征粮不遗余力，民众不胜负担，但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不再逮捕政治犯，并于1949年命令邓介松、肖作霖在过去长沙警备司令部所扣押的犯人中，查明属于政治问题的，一律释放，其中当然也有共产党员。据说，被释放的有近100人。

据肖作霖事后在上海东亚饭店对我说：“白崇禧抵达长沙后，扬言要逮捕我。我就在邵阳躲避了一段时间。”我说：“你追随程潜起义，也是有过危险的。”他满不在乎地说：“这算得什么呢！”

解放以后，肖作霖一度遇到过折腾，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不必讲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民革湖北省委副主委、民革武汉市委主委、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5年去世。

回忆陈采夫将军

肖汝贤*

1934年，我离开中学到四川资中工作，一进机关就认识陈将军，他那时是四川第二行政区保安副司令兼保安第三团团长。我虽在专署工作，但住在保安司令部与陈将军邻室而居。当时陈将军29岁，我19岁。他是我的上级，但他对后学没官架子，指导和关照无微不至，把我作老弟看待。从1935年到1952年我和他保持着友谊和联系。

陈将军，临澧人，黄埔第三期毕业后，立即参加北伐战争，以军功从排长升至团长。1933年，王次甫任河南洛阳专员，邀请陈将军任保安副司令，那时他只27岁。1935年春王次甫和陈将军同调四川第二行政区，仍任上述职务。1935年7月王次甫调江西民政厅长，王向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保荐其日本庆应大学同学易希亮继任专员，易系陈将军好友，坚留他任原职到1936年12月，他在资中工作两年。

陈将军年青时，不打牌、不吸烟，全副精神都是工作和学习。他曾受严格的军训，关心政治，但处处具军人本色，为人刚强正直，事事考虑国家利益，不计个人安危。

他年轻体胖，戒食肉类。在资中两年，警卫员兼理其炊事，只素食，极节俭。

区保安副司令是上校，当年国家规定月俸240银元，以财

* 肖汝贤，系陈采夫好友，曾与陈保持联系达18年之久。

政困难，保安经费六折，上级特优陈将军月俸不折扣，实支240银元，他兼保安团长，未取分文，为官清廉。陈将军治军严格，1936年资中县警察局长钟济川为人随便，衣冠不整，街上抽烟，路遇将军，当街责令写悔过书。专署政警队长穿衬衣出入卫门，与卫兵纠纷。反映给陈将军，当即对政警队长纪律处分，类此事例甚多，仅此足见其治军之严。但他以身作则，赏罚严明，部下都敬服。

1935年秋一个星期天，陈将军和好友到乡下打猎，他搬马枪，爱瞄准，在李家花园，犬远狂吠，陈将军兴之所至戏蹴毙犬。他立命经理处主任黄楚藩中校送交犬主五元银洋，道歉赔偿，并说“打死百姓的狗是违军纪的，必须赔偿”，由此足见其律己之严。

1936年秋，陈将军请假一月，由湘探亲，专员易希亮恐其川资穷困，送给200元银洋。回资中时，同仁为其洗尘，他很高兴地说：“匆匆离家，依依不舍，夫人因小孩多，家务重，我身为军人，随时有上前线之可能，不能携眷，夫人远送千里到武汉飞机场，才两心脉脉，两情依依而别。”陈将军酒席上的笑谈，我几十年不能忘怀。1936年12月，陈将军辞职回湘，在家乡过春节。1937年回中央军校任总队附，全面抗日开始，陈将军随军校迁四川铜梁，嗣又迁成都北校场。当时我已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学校是由南京迁成都华西坝。

陈将军在军校工作时，曾一再请缨到抗战前线，为国雪耻。1938年到陆军第88师任副旅长、旅长、师参谋长，在前线浴血抗日。1942年陈将军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副师长，由滇入缅甸与盟军并肩作战，不畏牺牲，颇有威望。

1944年陈将军回到重庆，我当时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高等科第8期学习，陈将军到南温泉与我相述，才知道他在远征军离开副师长职后，是在总司令部任美国顾问组少将组长。

他把离开时美国驻缅甸远征军司令给他的英文电报给我看，电文是说陈将军在任内，领导美国顾问有方，配合盟军作战，功勋卓著。

陈将军回到重庆，是向当时的抗战大本营的军政部报到待命的。他到渝不久，长子克琅由湘来渝读中学。1944年秋，我陪陈将军和克琅到重庆小温泉拜访了肖赞育中将。肖赞育当时是军委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副主任（主任是陈果夫），凡高级将领的安排，多先经肖赞育。肖面嘱陈将军把在大别山抗战和远征缅甸的经验，总结一下写一条陈。

陈将军在南温泉冠生园住一星期，写出32页的条陈，详述武汉保卫战和出国远征战略战术成败得失，并引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统帅部队作战课的历史资料，分析抗日形势，条陈建议，洋洋万言。稿竣后，交我托政治大学一位新化青年缮正，经陈将军寄交肖赞育。肖阅后立即交给军政部长陈诚，约半月之后，军政部派陈将军任少将部附。1945年春调重庆浮图关、大坪军官总队校官大队（即第一大队）少将大队长，领导团营级编余军官1000多人。当时我在中央粮食部工作，常去看他，获知编余军官不易领导，陈将军以深知军心领导有方，故第一大队少出事故。抗战胜利后，我们都回到南京，陈将军调后勤总部第一铁路军运指挥部第一副指挥，在南京下关办公。旋调驻浙江衢州，指挥浙赣铁路军运。1948年秋，由衢州调长沙指挥粤汉铁路军运。

陈将军在衢州工作时，我在江西都昌任县长，他介绍他的随从副官邵阳人潘某来任警卫队长，他的难友李懋（号任难，湘潭人）任江西宁都区专员，后调江西省政府秘书长，他曾多次函李懋托其关照我，对我情谊，几如父兄。

1948年秋，我应邀到南京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工作，顺道回湘探亲。此时陈将军刚由衢州调到长沙，陈夫人率克琅

姐兄等都到长沙，铁路局以10石米一月租得席草田28号房屋为其公馆。当时陈将军的言论，认为民不聊生，内战不能再打，断言国民党将垮台。他对我说“军运副指挥是个光棍司令，需带兵才起作用”等语。从这几句话，我已敏感他已萌起义之计。当时军方透露，长沙绥靖主任程潜已申请军委在湖南新建六个师，师长当系黄埔学生。陈将军有意掌握武装，以便行事。我去南京时，陈将军写了三封信。嘱我务必面交。一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常德人），一致国民党南京市主委肖赞育，一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王次甫。三封信大同小异，都是陈述民生痛苦，力言内战必须停止，示意身为军人，仍志愿带兵。这三封信，我均面交了。陈将军1949年4月奉简常德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1月，我工作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决迁广州。我赴穗绕道又到长沙，此时克琅已去香港到新华通讯社工作。此时他明白告诉我，“不当国民党的炮灰了，将另谋出路”。嘱我到广州，务必去香港一行，他已函知克琅，克琅会告知我一些情况。我到广州时，程潜再三电我的机关领导蒋梦麟主任委员，嘱在年内从美援拨款修复洞庭湖区域12个县360多个垸子溃堤，蒋主任命我陪同美籍委员贝克于12月来长沙与程潜签订修复洞庭湖区溃堤协定，以本职工作，匆匆离穗，故未去港。

1949年2月，陈将军在席草田28号举行春宴，参加者有几名高级军官，我忘了姓名，坐我席侧者是宪兵第十团团团长姜和瀛，此外都是临澧军政负责人，当日在座者，以后都起了义。

陈将军1948年到长沙组织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以我非军人，并未参加。但我知其情况，1949年6月他交克琅转交我一信，约我在坡子街楼上详谈，嘱我不要离开长沙，不要携走物资，一致行动。

陈将军组织湖南人民解放突击总队，以当日情势，是提着

人头闹革命。1949年元月底，我到席草田28号去看陈夫人，陈夫人很不放心地说：“我晓得这次去是凶多吉少。”我安慰她说：“采公是有眼光的，他胆大心细，你放心吧！”

程潜起义后，曾函劝宋希濂起义，宋希濂复信“即使我同意起义，我的军长也不会起义”。程潜征得中共意见后，再致书宋希濂“你个人起义，也给任兵团司令”。这封信的送信人，以陈将军曾是宋的将领，又有私交，所以决定派陈将军与宋仁楚持信沿湘西向四川尾追，以当时已混乱，交通阻塞，未及追上。后来，宋希濂在四川峨边被俘，程潜曾不胜感慨地说“宋荫国（希濂）这蠢家伙，兵团司令不当，要当俘虏”。

我跟程潜起义后，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工作。1950年调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1952年陈将军参与指挥修荆江分洪时，曾通一信，以后我被强加罪名，关进监狱，长期不知人间之事。

陈将军办事，求成心切，年青时，或不免急躁，以性刚直，挫则厌世。总观陈将军的一生，不谋私利，见义勇为，对中华民族抵抗侵略，建设国家，忠奋耿耿，怎奈以挫以屈以早逝，此我当年之所以痛哭，至今酷叹不已也。

我的父亲钱歌川

钱宁娜·

我的父亲钱歌川，是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化中心的上海，相当活跃的文人之一。当时他主编《新中华》杂志，和左右各方面的文人都有接触。不但一般性的文学刊物的编者和作者，即自称大华烈士、《逸经》的编者简又文，英文刊物《天下》的编者全增嘏、林语堂诸人，甚至文教界老一辈的黄炎培，都和我父亲常有聚会。现在上海健存的老作家施蛰存，就仍然时常和我父亲通信。

父亲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从公司下班回家，每天都要在家写到深夜十二时才休息，一本一的书就是这样从灯下产生出来。上海各出版公司，除中华书局外，还有北新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过我父亲的书。父亲除文字写作外，又爱好中国的金石书画，他从小从名师学刻图章，我祖父用的图章，大半是父亲刻的。我们儿女的第一颗图章，也是出自父亲之手。还有他在伦敦出版的一本书，就是他自己插图的。他晚年仍常为人写字，除行书外，又写篆书，写的多是他自己做的诗。

家父对儿女十分严厉，我们小的时候都很怕他，觉得不敢和他接近，后来长大了，这才知道种严格的训练，对我们长大后的为人做事，都受益不浅。他不但对儿女严厉，对他自己同样是严厉的。他做事十分认真，从不敷衍塞责，对金钱的事，

·钱宁娜，湖南人，现居美国。

尤其丝毫不苟，他从不向人借取分文。我的伯父们都是工程师和医生，物质生活比我家要好得多，但父亲绝不接受他们的帮助。他总是量入为出，因陋就简，从不亏空，生活也过得满好的。他生平没有负过一文钱的债，也决不贪取不义之财，他总是告诫我们，对一切不可存一点侥幸心，要脚踏实地、全力以赴。

我父亲对人真诚，忠于人谋。从不撒谎，也不自吹，看他作品的题名，却是十分谦逊的，写文章也决不夸大，都是实事求是。

最近辽宁大学出版社为我父亲出版了四巨册，共三百万言的《钱歌川文集》，得赏他生平的一大夙愿，是他晚年最高兴的一件事。有的朋友劝他去向出版社索取稿费，他回答说，在这时候书能出版，他已经很是满意了，并不在乎稿费。

听说父亲七十岁时要从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我马上去信请求双亲来美，以便奉养。他们在新加坡只能和大陆通信，人不能去。美国尼克逊总统把中美关系解冻时，两国人民才可自由来往。台湾虽成了第二故乡，但那里已无亲人，所以还是以来美生活最为适合。所以双亲便接受了我们的请求，在1972年圣诞节前，飞来了纽约。

父母都老了，而我们儿女们也进入了中年，现在借居海外，又得到机会侍奉在父母身边，相依膝下，是何等的幸运。姐姐住在马利兰州，出入非开车不可，我们住纽约市，附近就有二个市场，走几步路便可到达图书馆、邮局、银行，一切都极为方便，所以我们便争取到父母来和我们同住，一晃是十七八年了。

他们来美后，到1974年便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观光受到大陆各方面的欢迎。北京某大学并请父亲作名誉教授，不必经常讲课，并预备宿舍，以供居住。他们回大陆定居的事因母亲忽然

患了直肠癌，拖了三年，终于不治，病逝纽约而作罢。但父亲仍然带了我们祖孙三代，尤其是生长在美国的孙辈们，一再回到祖国探亲观光，以培养孩子们的国家观念和对中国的认识。这虽然花费极大，但意义深远。

父亲因还乡定居未果，故特地在家乡的湖南大学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奖学金。是依当地政府规定许可的最高额，每人每年奖金200元。受奖人没有限制。一般人设立奖学金，多在身后，且常限于他自己的本行一个专科。父亲却认为那是不公平不恰当的，为什么本人在有生之年，不可以见到自己培养奖励的青年学子呢？为什么要限于自己所学的一个专科呢？所以他在湖南大学设立的奖学金，就都打破了这种限制。

我父亲一直不愿入美国籍，仍旧拿的国民政府过去发给他的护照。他回中国，也是用的这本护照，只不过因在美国有永久居留权，在中国护照上已改为侨居了。父亲对祖国是念念不忘的，他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都是很强的，他的坚苦卓绝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耐性，都反应在这些大前提上。

父亲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多，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父亲不幸于1990年10月13日在美国纽约布斯纪念医院逝世，享年88岁。我们永远怀念他。

“归去苍凉”

——康濯同志逝世前后

张 杨 ●

1990年12月31日晚，我乘2次特快抵达北京。

几天后，1991年元月4日，星期五，我外出访友，看望了康濯同志。他正病得厉害，然而见到我仍十分高兴，蜷曲在书房中一张小床上，一面断断续续吸氧气，一面跟我聊天。他有一大堆病，以肺心病为主，经常发作，特别是难过冬天。他骂了好几句“他妈的”，以诅咒这磨人的痼疾；他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从前虽也犯病，但每次拖一拖，治一治，也就痊愈了。唯独这次，已拖了一年多，竟毫无好转的迹象。他又提到中组部老干局来人看望过他，听说他希望住进安贞医院，已派人去联系过，但从此没有了下文，等等。

“安贞医院？”我随口说，“我认识那里一位副院长。”

安贞医院离康老住处安定门不远，又叫北京胸科医院和北京心肺血管病研究中心，是由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创办的。无论在医疗水平、基础研究还是在医院管理方面，都居一流。康老这病，能住进安贞当然很好。他渴望能恢复健康。他说想做肺大泡手术，说听人讲安贞医院有位副院长号称“一把刀”……

● 张杨，系湖南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专业作家。

“您有肺大泡？”我有点吃惊，打量着他瘦弱、佝偻的躯体，摇了摇头：“切除肺大泡确实是一种根治术，但那是一种大型手术，相当危险，病人得有起码的身体条件才能承受。而肺功能衰竭到了出现肺大泡程度的人，一般都很难再具备那种体质条件，稍不小心便会死在台上”

“你当了几年院长，”康老叹息道，“看来还真懂了点行。”

所谓“几年院长”，是指我前几年在湖南省肿瘤医院挂职体验生活的事。

尽管在重病中忍受煎熬，康老的思维却仍很敏捷，谈锋亦健。他向我了解湖南的情况，聊到一些人和事。他忽而对三毛死于四十几岁发了一阵感慨，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三毛死了，对这种事也毫无兴趣。他又多次感叹道，象这么痛苦的活着，有什么意思！说着说着，他又挣扎着坐起来。

我要告辞了，康老有点难为情似地说：“你刚才提到你认识安贞医院一位副院长……你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请，请……”

“什么事，您尽管说吧。”我站住。

“你能不能通过那位副院长，让我住到安贞医院去？”

“我试试看吧。”

我立刻用他家的电话找林训生副院长，但连打了好几处地方都找不着，便将林副院长的姓名和电话号码都告知勉思夫人，请她自行联系。我说：“您在电话中提一提我，说是我介绍来的就行了。”

“还是你先打电话联系上才好……”勉思夫人显得为难。

我回家了。回家之后尽管事多，但心中老惦记着这事，老觉得不踏实。我当然知道以我先打电话为好，但我在北京的家中没有电话；公用电话倒是不远，三分钟计费一次，每次一角

（夜间两角），都是小事，只是打电话的人排成一串喝冷风，就迫使你不肯多说。而我跟林训生教授已有数年不曾联系，总得多唠唠，不能一开口就请人帮忙吧？特别是认为勉思夫人很可能会打电话给林院长，便放松了这事。

虽然放松了，但终究心中老揣着这么件事。特别是一想起康老被病魔缠绕的痛苦模样，就更感到不安。于是，元月11日（又是星期五）我骑着车老远赶去安定门。一看康老病得更重，仍然守着个氧气枕蜷曲在床上，象一棵在寒风中颤抖的枯草。缺氧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不停地吸入纯氧又会导致氧中毒……久病成医，康老明白个中利害，又摆脱不了那种进退维谷的困境。除了病痛，他情绪也抑郁。他唯一的女婿因患肝癌死去才两个多月。这位女婿很有才华，对他也很好。因女儿陶亮在美国留学，女婿从确诊到逝世这几十天全是王勉思在病房照顾的……

康老忽然谈起他死后追悼会要如何如何。我有点吃惊，立刻打断他，不准他再说这些话。我说莫应丰曾对我讲什么“宁肯痛痛快快活50岁，也决不窝窝囊囊活100岁”，到头来确诊癌症时恰恰50岁！我说这不是迷信，而是生命现象中的不可解释之迷；人不要讲丧气话，晦气话，否则说不定会成为现实，会不吉利的。我劝康老要自我鼓劲，要对前途充满信心，要有决心再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等等。康老一听，大约颇觉有理，立刻说了一番振作精神的话。

在过去这一周里，王勉思并没有给林副院长打电话，却骑着车跑到安定医院，找过两位管事的中层干部，给康老联系住院，显然出示了“蓝卡”（高干医疗证），也提到了中组部老干局，不料全无作用，还颇领略了一番那两个官儿的脸色和牢骚……

我一听，更感到有必要来这一趟了。我的主要困难是打电

话不方便，来这里就是为了打电话。打了一阵没找到林副院长，我便外出办其他事；晚餐时分回到康濯家，继续打电话，总算打到了林训生教授新居内，找到了他本人。先聊了一阵，得知他没有当副院长了，年满六十以后退下来，专任教授，管一个研究室。我心中琢磨了一下，不当副院长，权力小了很多，对办事不利；但毕竟当过几年副院长，至今仍未退休，说话也还会有人听的……我想了想，把对话转到正题上来。他一听又是这类事，就不怎么热心，说是没有床位；特别是冬天来了，老干部们都往医院中挤，高干病房早已满员，等等。禁不住我一再恳托，他终于松了口：“好吧，试试看……唔，那病人，叫康什么来着？”

“康——濯。”

“哪个‘濯’？”

我解释了一下。

“哦……”林教授略略沉吟，“他很有名呀！”

听得出，教授的口气完全变了。他明白表示可以帮忙，但安贞病床实在太紧张，得缓一缓。他又抄了康濯家的电话号码和王勉思的名字去。

我了解林训生。他是老协和出身，为人笃厚，保持着老知识分子的许多美德，很讲信义。他也许不会轻易答应别人什么，但一旦答应，便会认真去办的。果然，一两天后他便给王勉思打来电话，表示：一，床位肯定会有；二，一俟床位空出，医院有关部门会给他留着，他也会立刻通知康濯去履行门诊手续和办理住院手续。

勉思夫人将上述情况打电话告诉了我妻子。我在医院工作过，因此我能听出，林教授不是运用权力而是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人缘，去找过“医院有关部门”，而人家显然也还卖他的帐……不管怎么说吧，不过几天，顶多十天，康老便能住进安贞

了。而在这家第一流的专科医院里，他多半是能得到缓解和康复的。我又想起元月11日，当听说林副院长答允帮忙后，康老很高兴，居然起床走到餐桌边，还对我说：“你看我今天多吃了一碗饭哩！”

我松了一口气，打电话要勉思夫人在康老入院之际通知我一声，以便我亲自到安贞见见林训生教授，并直接关照一下康老的治疗事宜。如今世道，走到哪里都得找“关系”；安贞医院这“关系”既然找上了，就索性再找找吧！在医院内部有这么个熟人，对康老住院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然而又过了一两天，元月15日上午，勉思夫人突然给我妻子打来电话，说是康老病情急遽恶化，希望我尽快找找林副院长。

但我正好在15日外出，晚上8点多才回家。听说此事，我随即跑出去给林训生教授打电话。接着又把电话打到康老家，是他儿媳小麻接的。小麻说，已经叫来救护车，于今天下午3点将病人送往北京市急救中心；下午六点勉思夫人曾给家中打电话，说是康老业已陷入昏迷，病危通知也已发出……

“急救中心在哪里？”我大声问。

“我也不知道啊！”

我放下听筒，回到家里。户外夜色深沉，朔风呼啸。我在医院工作过几年，有点经验；因此，胸中涌动着某种不祥的预感……

翌日清晨，妻子上班之前，我说：“打个电话问问，急救中心在哪里。我得去看看。”待妻子跨出房门之际，我又轻叹一声：“也许已经迟了……”

起床后我心中乱纷纷的，那股不祥的预感继续在胸中躁动，无法正常写作，便做些零碎事，修理电灯。正在默默干活，门响了。我瞥瞥座钟：10点30分。上班时间，妻从不在这时回

家的……

她放下挎包，脱掉大衣，随手清理一下四周。但始终默然无语，不看我，也没有表情。我打量了她一眼，也不吱声，继续干我的。

几分钟后，妻终于发话：“康老已经去世了！”

尽管已有预料，我仍然一愣。我停下手中的活，几秒钟后才问：“什么时候，在哪里？”

“昨天晚上，就在急救中心。”

16日下午，我和妻子来到安定门。康濯同志自离开湖南，卜居北京以后，确实有些门庭冷落；我去看他时，极少见过旁人在座。但是，今天，正如和我猜到的，来人川流不息，一拨又一拨。不过，这在中国也是人之常情吧！况且，在这种时刻多来些人，尽管会给勉思夫人增添劳累，但是也可帮助她冲淡一些悲痛……

原来，15日康老病情恶化，王勉思打电话给我妻子之后，又骑车赶到安贞医院，希望向林教授求助，但没能找到他。回家只听得康老呼叫“我要死了”，情知大事不好，忙拨电话给急救中心。救护车终于来了，但颇拖了一段时间，在驶往急救中心的路上也不尽如人意。康老住在十二层楼上，下电梯时还能与人对话，只是脸色很难看。到急救中心后按章办事，先拍X光片，拍了侧位拍正位；站着拍是不可能的了，便脱了衣服躺着拍。我没有到现场目睹，但如此寒冬腊月，又是康老那弱不禁风的身体，其情景不难想见。他的心肺功能本来极差，经常发病，老是驼着背气喘吁吁，曾两次因肺大泡破裂而产生可以迅即危及生命的“气胸”；这次又是肺气肿、肺心病、左肺大面积感染和心动过速等一齐发作，缺氧严重，长时间中只能蜷曲着身子躺在温暖的室内，勉强维持微弱呼吸。现在却任人摆布，被平摊在X光机平台上，象翻弄“淡干鱼”一样。特

别是拍第二张照片时让他仰卧（这是他最无法忍受的一种姿势），医生恰好又“接电话”去了……

康濯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昏迷的，从此再没有醒来。

当晚10点，这位70岁的老作家的心脏停止了搏动。

……

勉思夫人带着极度的哀伤和疲惫，接待那一拨又一拨好心人。然而我坐着，却始终不吱一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除了徒然给她增添负担外，没有别的意义。此外，自康老迁居北京以来，我和妻子也是比较常来的……

坐了一会儿，我们起身告辞。在骑车回家的十几里路上，我和妻都默不作声，只听见寒风在耳畔呜咽。我想起，倘若元月4日那天我不急于离开康老家，而是蹲在他家打电话，那么可能也就找到了林教授；或者在我回家后能上紧些，克服困难，在4日或5日便打电话找到林教授，那么，康老是有可能会及时住进安贞医院，从而至今仍然活着的……

康老有“蓝卡”。但在北京，拥有这种医疗证的司局级干部太多了，简直多如牛毛，因此也就“贬值”。这次我在北京，就听说好几桩高级干部住不进医院或住进去又被“扔”出来的事，甚至连有的职位很高的将军在病重时也受尽了医护人员的冷遇或粗暴待遇。康老本人此前也曾在北京中医医院住院两月后被迫令出了院。那些中壮年便登上高位的“新贵”就不提了。但是，怎样去解释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和他们当年出生入死、艰苦奋战的价值呢？如果说，那些资历很深、地位很高的人物在医院里的遭遇尚且如此，老百姓又会怎样呢？

……

还有，如果不拘泥于“蓝卡”和高干病房，而是先让康濯同志住进一般病房，先创造一定的治疗和抢救条件，结果会不

会有所不同呢？

听说，那急救中心乱纷纷的。康老被摆在三号病室内，里面挤了四张床，当然都是正在抢救的危重病人，旁边就是一个大吐血的。所谓“抢救”，也只是一种说法而已；事实上都是年轻的女医师，她们都在嘻嘻哈哈，毫无紧张气氛。勉思夫人在回忆这一幕情景时叹息道：“也许因为她们看得太多，麻木了吧？”我想，林训生教授知道康濯，知道他“很有名”，急救中心那些姑娘们就未必知道。而且，她们肯定还不知道许多她们本来应该知道的道理！否则，康老或许今天还活着，至少不会那样死去……

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存在“争议”，特别是那些担任过领导职务和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众所周知，康濯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然而有一点绝对不会存在争议，那就是他的“很有名”。我们所能看到的每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能不提到康濯和他的作品，那么一厚本《康濯研究资料专辑》，就是明证！

近几年来我只流过两次泪。一次是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逝世，另一次是今年元月27日晚上我和妻子去看望勉思夫人，看到她为花圈缎带所题的挽词时。挽词的第二句是——

“归去苍凉”。

台湾名教授许君武先生传略

许 诒 博*

许君武，谱名昌武，字筠庐，笔名阿筠，湖南湘乡人。1905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1988年1月20日殁于台湾省台北市，享年83岁。

君武出身书香世家，是当代海峡两岸报坛、文坛、讲坛著名的报人、诗人、教授。曾与三湘易君左、沈曼若并称为湖南三大才子。去台湾后，与林、尹并列为台湾文学国宝。其门生弟子遍布大陆、台湾、香港及美、英、法、日、加、菲等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其中上百人已成为海内外知名教授、学者。

君武自幼聪颖过人，方4岁即受表伯（湖南古文经学大家）陈咏南先生启蒙，八载寒窗后改读新制学校，每期终必居前茅。18岁考入北京中国大学英文系，攻读外语，结业答辩，名列全系榜首。君武弱冠之年，即以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能文善辩，干练有为而佼佼闻名。冀省主席商震赏识其才华，以月俸300银元聘以重任。23岁先后任省府机要秘书、上校科长、少将处长等职。1928年清东陵盗墓案发，受商震委派赴遵化慈禧、乾隆墓地，明查暗访，查缉盗墓主犯孙殿英案卷之原委始末，京津报刊既民国史籍，曾记其事。

1930年春，通过县长考试，被派任福建惠安县长。因当时省防军干政扰民，乃挂冠北上，就天津《商报》总主笔，是步

*许诒博，湖南湘乡人，许君武先生之子。

入报坛之始。翌年，在谭延闿资助下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系深造。1933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应鲁涤平之请任浙江省府秘书兼杭州《东南日报》总主笔。1935年商震重主冀政，电邀君武去北京襄佐机要。1936年转赴南京新闻界，任《中国日报》、《扶轮日报》总编辑、总主笔。以其犀利无畏之笔锋，针贬时弊，抨击权贵，令人瞩目。尤以其署名“何筠”之政论文章，警世醒人，在剖析时势中，唤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之重演，义正词严，铿锵有力，在当年舆论界中独树一帜，引起南京朝野各界的强烈反响。

“七·七事变”后，南京文化新闻各界组织联合抗敌后援会，公推君武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自是，对抗日救亡文化宣传工作，奔走呼号，竟月不入家门。因其无私无畏，贡献良多，备受广大爱国志士仁人所称道，声誉鹊起，各社团群体纷纷赠以银盾、锦旗，四方来电来信，采访者益众。君武头颅硕大，前后脑均突出，如老寿星之脑壳，异乎常人。凡购帽必去“小吕宋”、“盛锡福”帽店定制。当年文坛、报坛未有不知“许大头”者，有“大头记者”、“巨头报人”之雅说。至今传为佳话。

1939年受任常德第二区指导专员，负责督导常德、澧县、临澧、石门、桃源等11县之动员民众支援抗日工作，为抗战期间文化人下乡从事基层工作，树立典范。

1942年与陶希圣、胡秋源等在重庆共同主持《中央日报》笔政。1946年应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及中国新闻专科学校之聘，任新闻专业教授，其门生桃李争芳，已成为名记者的遍布海内外。同年，为《南京人报》、《华夏日报》撰写杂文、小品、随笔，读者慕名争相购阅。翌年春，自创“真理新闻社”，以民间通讯社之独家新闻，与“中央社”官方通讯社一比高低。“真理社”一无资金、二无背景。君武自任社长，长子诒

博、次子诒光为该社唯一之记者、编辑、誊写、油印、送稿一包到底之“家庭通讯社”。但以信息灵通，内容新颖，报道翔实取胜。当时除南京、上海各大报争相刊载“真理社讯”外，驻宁外电通讯社如“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等亦纷纷转稿发向海外。自此许君武与“真理社”名声大噪；包括“中央社”在内和其他20余家民营通讯社莫不侧目而视。是年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因“真理社”播发有利于中共之新闻稿，以“为匪张目”罪名，勒令“真理社”停刊。沪宁新闻报刊及外电均以《南京从此无〈真理〉》为题，评述其事。君武笑对友人说：“它有强权，我有真理，何惧之耶？”报坛内外咸敬重之。君武自幼习诗文，曾毕十三经，读“资治通鉴”凡两遍，涉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国学根底深厚，尤精于诗，先后组建“双青诗社”、“春木诗社”“四可吟社”等诗词社团。凡春秋佳日，必与诗社同仁游园登高，称觞命题，分韵赋诗，即兴唱和。1946年金陵诗坛佳话中，曾有“许君武韵斗张恨水”之掌故。爱许、张二友乃文坛、诗坛莫逆之交，某日相遇于《新民晚报》社，许示张一绝句，题为《重入白门望钟山口占》，诗云：“八年与国共飘零，尘梦歌筵笑乍醒。唯有钟山能媚客，掀簧犹作别时青。”张听好，援笔立和“乍如都门一泪零，荒草枯骨已难醒，旧邻访觅无人在，断屐苔痕数尺青。”武又叠韵：“执手江城百草零，沧桑独剩屈原醒，吹箫击剑携幽愤，难得高歌眠尚青。”张笑云：“我们斗韵吧。”武点头，于是二位轮番唱和。后恨水于《新民晚报》发表一诗，武评曰某句平仄不调，乃为文青该报，张于报端公开答复，表示拜服。《金陵野史》曾记其详。

1984年1月24日，香港《文汇报》转载台湾《新生报》载君武（江城春楔）七绝二首，诗云：“网溪春好媚行都，曲水流觞胜画图。却笑诗人难免俗，缁尘和酒味抗苏。”“海蛸颢

闻楔争修，莫道东晋尽风流。取怀寄兴兰亭外，谁向羲之笔下求。”同年2月，北京《团结报》、济南《客台游子吟》相继转载。充分反映诗人思乡怀旧眷恋祖国山河的拳拳之心。生平所作诗词逾千首，已分别由其门生赵慎安教授整理成《双青阁诗文集》、《兑亨簪诗词选》，行将在台北付梓。

君武自40年代即登上高等院校讲坛，讲授“哲学”、“伦理学”、“新闻学”、“高级英文写作”等课程。授课时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融通古今中外之学说，作精辟清晰之讲授，启导学生提问，深入探讨，不厌其烦。凡许教授到校，听课者蜂蛹而至，室内坐无虚席，莫不凝神灌注全神听讲。去台后曾执教于清华大学、东吴大学、文化大学、淡江大学、理工学院、法商学院、国立艺专、逢甲大学、铭传商专、台中商专、市政商专、医药学院、万能工专等10余所院校，并一度去菲律宾马尼拉东方大学执教。在奖励后进、培育英才方面，呕心沥血，诲人不倦，备受师生敬重。历年所受奖章、奖杯、荣誉证书、锦旗、奖状之类，不计其数。

德配陈韵篁夫人，辛亥革命先驱陈家鼎（汉元）先生之女公子。1925年由胡汉民证婚在广州结婚。夫人名门才女，贤淑勤朴，为诗坛大家，书法高手。伉俪情笃，志趣相投，60年间唱和吟诵，未尝稍懈。1955年正月初十日为君武伉俪结婚30周年“珠婚”纪念日，曾觴师友于台北健康乐园，于右任、傅王、孙心畬、郎静山等百余人应邀签字留念。于右任在文端题词云：“时为丰岁，节近上元，花同人好，月共珠圆。祥开日世，会集群贤，齐眉福泽，合证诗篇，留此鸿雪，佳话永传。”

君武逝世后，台北各界隆重公祭，悼词中曾有：“先生道通古今，学贯中西，终生诲人不倦，有教无类，树爱国之至德，立扬正之至言，屠龙身手，腐鼠功名，吐凤雄才，照人肝胆……。”可谓一生中肯确切之写照，恰如其分之评价也。

赵 启 霖 传 略

易 孟 醇*

赵启霖(1859——1935)，字芷荪，晚号潯园，湖南湘潭人，家赤贫。6岁入私塾，族戚见他聪颖，都乐于资助他继续就读。16岁得隶学籍，以所得奖金为家中还债谷10余硕。光绪十一年(1885)举于乡，十八年(1892)成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三十二年(1906)正月，补河南道监察御史，十月掌江苏道监察御史，十二月兼署山西道监察御史。

他在御史任上，以极大的热忱履行自己诤谏的职责，在短短一年中上疏十一道，为澄清吏治、禁绝鸦片、改革教育、赈济灾黎鼓呼，终因弹劾权贵而落职。

清朝末叶，已经气息奄奄，百孔千疮，有志之士都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赵启霖则认为，“时世变迁而日新，圣教昭垂而不变”，故救亡之策，在不“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当时，从祀明末清初三位具有鲜明反清思想的大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已成为有志之士要求变通改革的思想的一种反映。赵启霖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奏请，指出王夫之等三人“立身行己，皆于艰苦卓绝之中，具忠贞笃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得后为己任；其于圣贤之道，非但多所阐明，皆能躬行实践，深入堂奥，为后来儒者所不能及。其论著之关于政治者，多具运量千载，开物成务之识，于今日变通损益之宜，往往悬合事理。”他尤其推崇王夫之的《通鉴论》与《宋论》，认为此二书“剖析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其言多有裨治体。”他的奏

* 易孟醇，系湖南出版社副编审。

摺递上后，清政府过了一年半，才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准奏。

生活在鸦片战争后的赵启霖，目睹外患益炽、内困日臻，常痛心楚楚，亟想朝廷砺精图治，奋发图强。他注意名教，主张从祀王夫之三大儒，固是为了总结“古今兴亡得失”以利于“今日变通损益”，但他更注重现实，主张实业救国。他叙述道：“查洋货之销于内地者，如原布、花布、呢绒、钟表、煤油、纸张、玻璃器、雪茄烟及洋磁、洋铁、皮革等物，中国几乎无人不用，无家不需，大而军械机器，小而一针一钉一巾一伞，无不仰给于彼”，“繁盛之市，璀璨溢目者，洋货也；殷实之家，罗列杂陈者，洋货也。洋货之销行，日以推广；土货之出产，日以萧条，”结果是入超数字逐年上升，白银大量外流，“光绪二十年土货出口较洋货进口止绌三千四百万，及二十五年则绌至六千八百万，及二十九年以后则绌至一万一千数百万”。赵启霖深刻地指出：“中国贫困之大患实在于此。”“日枯月涸，民其何以自存，国其何以自立乎？”他认为：“中国欲起孱弱，救危亡，舍大兴工艺，其道无由矣！”因此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月上疏请办京师高等实业学堂，并请逐次推之各省，广泛地培养科技人才，“必使汽机化电之科随处娴习，格致制造之学随时精进，各种洋货皆能仿造以供本国之需，而后资财不至外溢，各种土货皆能求精以博外国之利，而后上下不至患贫。”赵启霖的满腔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他的疏策实属高瞻远瞩之论。

对于时弊，作为御史的赵启霖，抨击不遗余力，但同时他也积极提出建议。当时，清廷虽屡有禁烟之令，但它已腐朽没落，令不行禁不止，吸烟者反而日益增多，还有不少人偷种烟土，于是出现了“以征为禁”的主张。清政府藉征烟税，获得了大宗收入，还专设膏捐局以总其事。三十二年（1906）清政

府发出明诏，“著定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一律革除净尽。”赵启霖于是疏论禁烟事宜，指出“鸦片之为中国害，受患者百年，被毒者万姓。”他说：“此次奉旨禁烟，适当预备立宪之时，非但中国强弱所关，抑亦各国观瞻所注。……总期纲举目张，令行禁止。”他深感过去禁烟一纸空文者多，敷衍玩延者多，因此提出了四条易于实行者作为提挈之大纲：一、在京师设禁烟总局，掌握全国的稽查与催督；二、择各省正绅同志者在上海设禁烟总会，各省设禁烟公会，以劝导为宗旨；三、改八省膏捐大臣为禁烟大臣或稽查土膏大臣，“若名称仍旧，中外注目者皆以为国家仍恃此大宗入款，虽有禁令，并非实心，必致各怀观望，藉口迁延，于禁烟毫无效力”；四、实行公家专卖。疏入，禁烟总局与禁烟总会均次第成立，膏捐局也被裁撤。只有国家专卖一事，由于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未有头绪。

针对当时练军的弊病，赵启霖上《练兵不可徒袭形式摺》，指出当时练兵，“一切仿效洋人”，又仅“袭其皮毛”，以致“甲午春间，北洋海军会操，军容之盛，中外称颂，及中日交战，望风溃败；其后武卫军亦具规模，联军入京，全不得力”。又如，在执行任务中的“湖南新练之常备军，行数十里已其疲乏，至纷纷乘坐肩舆，雇人负枪”。他在奏疏中反复陈说，练兵“期于战事确有把握”，若“徒袭外观，等于儿戏”，“竭天下之财力以练兵，而惟从事于表面，糜费过钜，实效难言”。他以冯子材、王德榜大捷于谅山，孙开华等大捷于沪尾为例，说明中国传统的治兵制胜之法大有可取之处，宜“参用”。通观全疏，贯穿着“师外人之长”时必须“细按中国情势，以求实济”的思想。

御史赵启霖对当时东三省的形势尤为关切，认为“东三省为根本重地，近来介于两强之间，协以谋我，日甚一日”；处于这种危急情势下，“全赖大吏锐意整顿，以公忠之风采，折

他族之野心”。可是，当时东三省的官吏大多腐化不堪，助比为奸，其中吉林将军达桂重捐酒税，贪污受招垦田之人预交的承招钱，又滥铸钱币，欺罔营私。赵启霖写道：“以龙兴之要地，迫虎视之强邻，而弊政贪风若此其甚！”他深恐“民怨日深，外侮日急，渊鱼丛爵，后患将不忍言”，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二月上疏弹劾。有旨将达桂“即行革职，永不叙用”，知府于芾霖等四人也同时革职。

可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达桂等刚被革职，段芝贵又经钻营，得署黑龙江巡抚。段芝贵本为袁世凯的听差，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器重，节节提升。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把自己的势力伸入东三省，特为段芝贵谋得这一官差。袁世凯乘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来天津之机，指使打梆报更出身的警官杨以德，以一万二千金买得天津大观园歌妓杨翠喜，送给载振；袁世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处措借十万金为载振之父庆亲王奕劻寿。这样，段芝贵便轻而易举地无功而得官。此事一发生，朝野上下，人言藉藉，道路喧传，报纸讥评，连东京的报纸也详纪其事。但大多畏惧权势，不敢樱按端须。惟赵启霖以其愚诚，慷慨陈词，弹劾段芝贵寅缘亲贵的劣行和庆亲王父子广收贿赂的卑污，指出他们“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谓无心肝不思东三省为何等重要之地，他虞逼处为何等危迫之时，改设巡抚为何等关系之事。此而交通贿赂，欺罔朝廷，明目张胆，无复顾忌，真孔子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者矣”！疏上，朝廷震动，不得不撤去段芝贵布政使衔，并著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同时开去载振的一切差缺，又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前往天津访查，以缓和舆论。但是，袁世凯早就私诣庆亲王府，为庆亲王父子谋画。他将杨翠喜从北京接回天津，指使杨以德将杨翠喜送给天津富商、兵部候补郎中王益孙为使女，并制造伪证，声称典价为三千五百

元。载沣、孙家鼐不明察事实真象，反而根据一面之妄辞，指控赵启霖“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访察，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于是，赵启霖于四月初五日被“即行革职，以示惩戒。”赵启霖不畏权贵，因履行言责而被撤职的事，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在他罢官的第二天清晨起，就不断有朝官到他家中慰藉，连日宾客盈门，其中有不少他平生不曾识面的。翰林院士子声称集体罢考。御使江春霖、陆宝忠、赵炳麟为之分辨事实，申张正义。一时间，舆论界也纷纷刊载为此事撰写的评论，还有将袁世凯等贿赂朋比的情况编成戏剧、通俗小说或仿《长恨歌》撰为长诗。上海《申报》在它的时评后，再附“打虎”漫画一幅，题以“不畏强梁”。清廷在这种内外压力之下，不得已于两个月后开复赵启霖的处分。事后，赵启霖在《余尧衢同年七十序》中说：“一二人之出处，若渺小不足道，而推原消长存亡之肇端，宁得谓无关乎！”陆宝忠评论赵启霖这一壮举说：“京师久旱得雨，论者以比洪北江。”

赵启霖一生的大多时间从事教育，二十三岁即开馆授业，历署麻阳、武陵、澧州训导，主讲泸溪书院及藏（一作莘）州书院。光绪三十年（1904）礼部借汴闱试士，他任同考官。后又在京师任湘学堂监督。宣统元年（1909），他任岳麓高等学堂监督，逾月，奉命赴四川提学史任。莅蜀，即立蜀中大儒范景仁、范纯夫、张南轩、魏鹤仙四先生祠，以树师法；又设崇古学堂，以翊经术。

第二年，以母老乞归。自是深山古榻，杜门不出。赵启霖既以气谊高海内，又擅长诗歌古文辞，有《滟园集》六卷行于世。歿后葬湘潭青山桥栗山咀城子屋场后山。

蒋介石长沙阅兵与唐生智反蒋

张季任*

1926年，我在长郡中学读书。暑假回到宁乡家中后几天，北伐军就于7月11日攻克了长沙。我闻讯后，异常兴奋，急欲离家返校，一睹革命军队进驻长沙后的新气象，并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还想打听一下有无革命学校或训练班招生的消息，以便争先报考。因此，于8月初就提前回校，这时先后到校的同学已有数十人。

8月14日清晨，一个姓钟的同学对我说：“今天蒋总司令在协操坪阅兵，必是大场面，你去看不？”我说：“那还不去？！”随即邀同四、五个同学，连早饭都顾不上吃，急忙赶往现场。我们由三府坪出发，经水风井出小吴门直奔协操坪。这里是旧军营四十九标、五十标的部队共同操练场所，比教育会坪还大几倍，几届全省运动会都在这里举行。

进场通道，警卫森严，不能进去。好在四周没有围墙，我们站在坪侧，也能看得清楚。这时场内全副武装的官兵，是首战告捷的胜利之师，排着整齐的队列，精神抖擞，容光焕发，等待接受检阅。他们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八两军在长沙的部队，从右至左，按序排列。看上去第七军约有万把人，第八军大约还多一倍。少顷，从城里出来十多匹高大的骏马，向协操坪走来。骑在马上头一位是蒋总司令；第二位个子不高，体

*张季任，湖南宁乡人，当时在长沙读书，现系宁乡县政协文史委员。

魏克旺，是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三位蓄八字须的是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后面是这两个军的师、旅长，其中我只认得第八军第一师师长何键一人。因三月间唐生智第一次进长沙期间，他曾代表唐生智出席过群众大会，所以还面熟。

他们一行进入协操坪后，七、八两军的“值日官”向蒋总司令报告受检人数，随后蒋介石开始检阅部队。各军、师、旅长紧跟在后，从第七军右端开始，按辔向左徐行。士兵依口令举枪敬礼，蒋介石频频举手答礼。第七军由广西出发，转战千里，服装都已褪色，也无乐队。第八军是湖南本地部队，唐生智又好讲排场，士兵一律着草绿色新军装，排头除有庞大的军乐队外，接着还有一支军号队。军乐、军号都是新买的，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当蒋介石等坐骑接近八军队首时，军乐齐鸣，悠扬悦耳，紧接着军号一齐吹奏，声音极为洪亮，岂知蒋介石的坐骑顿时受惊，前蹄高举，把蒋掀翻落地，一只脚还嵌在马镫里。马向坪中狂奔，蒋介石被倒拖几丈远，才抽出脚来，我这时也是惊心动魄，为他的安全担心。各将领急忙下马，前去将他扶起，拭去身上尘土。这时蒋已狼狈不堪，但仍勉强振作精神，和各将一起弃马步行。检阅完部队，登上检阅台，再行检阅分列式。最后，蒋介石还向全体官兵训了话，这一庄严盛大的阅兵典礼，勉强草草收场。随后七、八两军的受检部队相继北上，继续北伐。

北伐军进入长沙后，在政治部门散发的各种宣传材料中，有一种用硬纸印的四寸相片，都是国民革命军重要将领的半身料，背面印有简单的文字，称之为“名言”，如“蒋总司令名言”、“李军长名言”等等，都通俗易懂。惟有唐生智的相片背面所印的“唐总指挥名言”，我当时很难理解。开头几句是：“强暴的淫威，在业报的水平线上，遇着强有力的抵抗，这就叫革命。”后来有一个姓刘的同学，其父亲在唐生智部下

当官，他对我说：“唐生智在部队提倡官兵信奉佛教。他相片背面的‘名言’是佛教用语。”还说：“唐生智的营幕中有一个姓顾的和尚，据说能知过去，预卜未来，神通广大。唐尊他为师，对其言听计从。那次蒋介石阅兵坠马，顾就大肆渲染，对唐生智说：‘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说明蒋介石是过不了第八军这一关。日后蒋介石倒台，全国的军政大权，必将落入你唐孟潇将军之手，你应好自为之。’这话不独唐生智很感兴趣，在八军官兵中也流传着‘蒋介石过不了八军关’这一议论。”

1927年，北伐军在河南攻克郑州等重镇后，部队撤回武汉。唐生智的第八军原已扩充为八、三十五、三十六三个军（后又扩充十二、十七两个军），唐也已由前敌总指挥当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这时，蒋介石嫡系部队和桂系军队在龙潭与孙传芳主力苦战之后，兵力损伤很大。9月间，唐生智趁机反蒋，发动东征，分江右军和江左军直下芜湖、安庆。他本以为可以一举攻下南京，詎料南京方面也组织包括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叶开鑫等许多部队在内的西征军，向唐生智部进攻。唐部败退，唐本人于11月11日晚乘轮船东渡日本。

唐生智下野后，由桂系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武汉），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并于1928年率部“第二次北伐”，击溃了张宗昌部后，进驻北平。

1929年春，唐生智由日本回到上海。时值蒋介石正企图解决桂系，根据形势需要，委唐生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唐重掌兵权后甚是得手，赶走了白崇禧，又在河南打败积极反蒋的冯玉祥的部队。这时蒋介石非常高兴，亲自来到郑州，对唐特别亲热，表示唐要什么，就给什么，要想干什么，他都支持。另外，还向郑州地区的军队下了一道命令，大意说：“孟潇（唐的别号）将军有军事天才，我不及他，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

听他的指挥，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但是，这年12月，唐又通电反蒋。不久，在唐的通电上署名的二十几个将领中，多数被蒋拉拢收买，有的否认署名，有的徘徊观望，更有出兵打唐的。另一方面，蒋介石又派重兵进攻。唐生智彻底失败，被迫化装离开了部队。

唐的反蒋虽然有种种政治原因，但顾和尚利用蒋介石阅兵坠马这一机会，制造“蒋介石过不了八军关”的舆论，恐怕也起了一定的怂恿作用。

讨赵湘军第六军战斗见闻

田士清*

一

我是于1922年暑假辞卸益阳宣义学校校长往湘西去的。路经烟溪底庄到溆浦县城，县长田兆龙即留我在溆浦县署第二科负主任工作。当时蔡钜猷与省长赵恒惕之间，已成对立之势。蔡承袭周则范旧有湘西地盘，据沅水上游的洪江，地域辽阔，历来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如直系吴佩孚）。赵恒惕自1921年援鄂失败后，投靠了吴佩孚，这就为湘军人中（如蔡钜猷、陈嘉祐等），大部分拥谭（延闓）者所不满。而蔡独揽云贵等省鸦片烟土由湘西出口运武汉的特税（湘西各县多产鸦片，亦有税收），早为赵垂涎，亟思所以去蔡，取而代之（后来社会人士称蔡赵之争为鸦片之战），早有剑拔弩张之势。

1923年6月，赵恒惕下令裁撤蔡钜猷的沅陵镇守使，调蔡来长任湖南讲武堂总办，蔡拒不受命，宣布湘西独立，接受孙中山先生所任命的湘西第一军军长（后改为讨赵湘军第六军军长），拥护由粤回湘讨赵之谭延闓，于是兵分三路向常德、安化、新化进攻。

二

蔡钜猷当时任沅陵镇守使，亲驻辰州，从桃源以上的柳林

*田士清，湖南益阳人，曾在溆浦县署任职，后在湘军第六军军部任秘书。

汉（属沅陵）起，地势险要，他所节制指挥的部队原有湖南第九区司令刘叙彝（新化人）所辖的第九旅（计两团，团长是谭润生、何隆干），暨湖南第十区司令田镇藩（益阳人）所辖的第十旅（计两团，团长是彭寿垣、杨毓棠）。自讨赵军兴，刘叙彝、田镇藩所辖属各团名义上均扩充为师。刘叙彝任第一纵队司令，向新化一带进攻；田镇藩任第二纵队司令，向安化等地进攻；湘西的周朝武（人极高大，绰号周铁鞭，行军时常使人持铁鞭前导）等向常德进攻。其它临时成立的杂牌部队有刘承烈部（刘承烈、刘文锦兄弟所组织），在益阳招编了邓赫绩，邓原名邓黑漆，本系舵工，后从军，援鄂失败时，乘机拖枪回益，占据雪峰山为匪，与大桥镇恶霸地主高某办团防的结了死仇，遂投刘。赫绩之名，是刘承烈为他改的，还有卢鑫等所部别动队甚多，蔡从前在湘西新收编的陈汉章、陈涯兄弟（绰号佑棍子、满棍子，均系湘西土匪，盘踞怀化、龙头巷一带）所部及梁子卿（盘踞榆树湾等地）等则未出发，他们是受编不受调的。

谭延闿统率的湖南讨赵6个军中，以蔡的军队最多。经过溆浦的军队，刘叙彝、田镇藩两部均有，军人家属多留在溆浦。到安化后，与贺耀组旅接火，贺即败退。一直打到益阳，经宁乡抵岳麓山，与赵垣惕军隔江对抗，约有两月之久。

此次蔡军攻赵，刘叙彝到了前线，田镇藩仍留辰州和蔡策划。当时湘西交通不便，有些地方临时才设电线，并发动乡间设迪步哨，又责令地方在溆浦第三区的花桥设置粮台，备办军米，上绅畏与军队接触，呈请县署转报第二纵队司令部派员代为应付，田兆龙商请司令部临时委我为咨议，前往花桥主持。

11月初，谭延闿因广东陈炯明叛变，奉孙大元帅令，率师回广救援。赵部贺耀组师遂乘机反攻，蔡部各师西撤，经宁乡到益阳，并无多大损失。

讨赵军既向南、向西两方败退，蔡距猷首由沅陵溯江而上，先达黔阳县城，士兵闻饷哗变，想要抢劫后溃散，已将团长何隆干驱逐了，蔡闻之，惊悸万分，当即发饷三关，军心始稳，遂得安全达到沅州（即芷江）。

田镇藩继蔡后溯江到淑浦，与田兆龙商量撤退路线，并嘱他要在淑代筹军饷一万元，至少要筹足五千元。夜深，田兆龙令人唤我回县，花桥教育界相识者已为我备好肩舆相送，午夜后，离县出发，行30里，即在黄溪口（在沅水大江边）住宿，田镇藩已先驻在此。翌日夜间，他唤我问，你在淑久，知有尚溪河否？我说是通第一区龙潭的要道，他遂没有问了。我尚不知他的意思安在，后始知是他要下令反攻。

三

蔡军自岳麓山撤退时，贺耀组军即跟随尾追，追得太急，田部几退不出了，非反攻无以自全。他果由尚溪河经第二区桥江，绕到花桥及第四区底庄，把贺军全包围了。时贺耀组已进入淑浦县城，亲驻在县署后山的孔庙里。田军由东门外（这一带是狭而长的山地）攻入，将贺围得水泄不通，官兵概被俘虏。贺亦自知不免，吓得瘫痪了，对马弁说：“我便死在这里。”几个马弁在民间寻得楼梯一张，将贺绑在梯上，总算冲出，经花桥、底庄、烟溪，一直溃到益阳始停。

田镇藩将贺耀组击败后，要田兆龙和我仍回淑浦县城、维持秩序，以便续撤部队从容开进，并嘱彭寿垣莫走水路，由大江口（沿水边）过河从陆路直趋怀化以达沅州，与军部会合（时蔡已到芷江）。田则亲率步兵一连由黄溪口沿江直上，在榆树湾一带遇匪，约有人枪二千，他指挥还击，竟安全通过了，得在沅州与蔡晤面商赴铜仁。

我们在淑浦住了20多天，待后撤部队将近到齐，遂遵田镇

藩所嘱，随彭寿垣团由险路直趋沅州。早知怀化有匪，人人都有戒心，田兆龙将所代筹之军饷光洋五千元，分给多人随身携带，我护兵田曙新身上便代带三百元。时值12月下旬，北风骤然，天极寒冷。

过了几天，天气晴朗，行军望见怀化，只得入市镇了，忽前军停止不进，拥挤路旁，群说前面有匪。见两旁山上尽竖红旗，我向田兆龙说：“请找彭团长说，何不趁天还未黑，快冲过去”。田表情上讥笑我是妄谈，便说：“你看红旗遍山，有匪拦击，你有何法可以冲出？”我说：“这些红旗是虚张声势的，有匪亦并不多，我们有几营人（当时同行者还有卢鑫等部），把一营前导冲锋，把两营分向两边搜山，与匪对打，家小行李走中间，把一营和多余的兵断后，不是可以冲过去吗？”田说：“好！我去找彭团长说说看。”时彭团长的书记官郭伯藩留溆浦城不来，彭要求田暂代郭职，有事常与田商，故易见面。他入夜对我说：“已由卢鑫司令（圈子——帮会中的大哥）与对方交涉好了，只要20杆枪作买路钱，今夜可以在此安然宿营。于是官兵争向街上找寻房子住下煮饭，而不知是中了匪的诡计。

陈汉章兄弟和梁子卿的匪军，见蔡、田从沅陵起，都是溯江而上赴沅州的，不料会走怀化，他们把部队集中在沅水的大江边榆树湾（俗名鱼永湾）等处，以图截击抢枪，而不知彭等是由小路来的，怀化并无好多匪军，不能向彭等攻击，漏夜向各沿江驻地调回匪军。翌晨，彭将20支枪送去，匪不肯受，要20支驳壳手枪。彭向各营征集，第二营营长田贵卿拒不受命，并说：“我们是正式军队，向匪交枪，贻人耻笑。”他坚持要打，而第一营营长洪兰生则主张交枪。正在不决之际，彭召田兆龙去共商，而匪已开枪进攻。田贵卿即率所部还击，将匪打退，前进冲过，杨超海连亦打出了，均安然无事。而彭、

洪等不续进，并向后退。匪遂反攻，并将以前所夺获之大炮已安置山顶轰击，两军冲锋呼杀。彭不激励士兵指挥作战，还说：“无办法。”遂与洪兰生等均被匪俘，关在匪首张家家里。室内安有秘密机构，生人不识，不易出来。

在彭寿恒被打垮后，蔡部续由怀化经过者还有二十九团杨毓棠所部及刘承烈所属的邓赫绩部（邓是最后退的）。张匪与杨同是芷江人，不敢抢杨的枪，杨亦不打他们。邓是益阳人，杨、张都想把他消灭。邓则到处硬打，经怀化时，威力更大，定要烧掉张匪大屋。张匪央彭、田代为向邓求饶，愿将所俘一律优礼送出，他们才随邓安全过了怀化，经楠树湾，进入山地约十余里的险要处。杨部部下俟邓到即拦击，久不见邓，遇到路军便问，恰巧问到邓的前面。邓说：“老子便是邓赫绩！”率10余人开枪便打，百发百中，杨部抵挡不住逃走了。

五

蔡、田与彭寿恒（建书）同是前清末湖南武备学堂毕业的。彭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其父彭我山是益阳名孝廉——举人），辛亥革命反正后，他才回国，在长沙创办将校养成所，招了何键、贾永镇等一班学生，起义的新军士兵对该所不满，荷枪冲入，迫其解散。彭后在湖南第二师师长陈复初部下任第五团团长，陈投傅良佐，傅逃后，陈亦垮台，彭团在桃源溃散。彭回益阳后，与李星畴等在本乡雇人营屠宰杂货生意，因彭与蔡距猷是儿女亲家，他遂做了田镇藩所属的二十八团团长。彭军事学很有声名，只是爱财如命，胆小如鼠，作不得战。而二十九团团长杨毓棠，原系土匪从军出身，虽很贪残，却勇敢善战，其部下如杨永清、张正光等都是圈子内的兄弟。蔡对彭团特别爱护，枪弹充实，而且精良，讨赵之战，未受任何损失，蔡、田倚为基本队伍，撤退时，彭军又独先行，杨毓

蔡对此当然有些不满，陈汉章兄弟与梁子卿，或许受了杨的暗示，才敢出面劫枪。

彭既垮台，虽杨毓棻对田镇藩还好，但田因所保留彭团之实力既已毫无，遂决计不干了。与蔡商定一切，蔡在芷江驻了约20天，于1924年1月率所剩原有军队及邓赫绩等新加入的，由晃县入黔省移驻铜仁。我随田镇藩、田兆龙等送蔡行后（杨毓棻部未随蔡去），仍留沅州，遂与田兆龙、刘光阁（益阳人，前泸溪县县长）移居长郡会馆的广济宫。

贺耀组自在溆浦被田镇藩反攻溃败后，几不能成军，二师刘钊、三师叶开鑫、四师唐生智（原均是旅，后皆扩升为师）都看不起他。贺恨极，千方百计收编杨毓棻旅。杨死，贺恐杨部离去，于1924年夏，亲到沅州来拜访田镇藩，探其意旨，田坚决表示年头多病，永绝出山之意，贺遂求其帮助，田即诚恳应诺。这次，贺带礼物极多，每个连长都送了纺绸长衫衣料一件。赵恒惕已派龚浩接任了洪江特税总局长，不久，湘西督办叶开鑫亦到了洪江，前后均来访田。叶并送田鸦片烟土一万两。

蔡钹猷在铜仁与入黔之川军熊克武部汇合了。于1924年冬，由黔攻湘，经沅州、洪江、辰溪、沅陵（田镇藩仍住沅陵未动，始终未参与蔡熊军事）、桃源，直抵常德，与赵暂时妥协，并未进军。此时我又在讨赵湘军第六军军部任秘书（此时讨赵湘军第六军的番号仍未改变）。1925年4月，赵军反攻，熊蔡联军溯沅水而上，溃退黔桂边境，后转入粤。

回忆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

高中凯*

1949年，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成都举办第二十三期，即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兹将我在这期的见闻回忆如下：

1949年2月，成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后期的名称）派教育处步兵科长陈异三少将（实为上校，因代表军校外出，便于打交通，故挂少将衔）带领招生小组来长沙招收二十三期三总队的部分新生。我因家境贫寒，无钱继续升学，加上在兑泽中学读书时，听过老校友陈明仁将军慷慨激昂的讲话，对黄埔军校遂产生了向往，因此见到招生广告以后，就毅然到军校招生办公室报了名。经过考试和体检，我被录取了，当时我不满18岁。就在我中学的同学高高兴兴地进入新学期学习的时候，我和在长沙新招收的200多名军校新生乘上了北去的列车。到汉口停留5天以后登上了一艘沿长江西去重庆的登陆艇，在长江航行了9天，中途在湖北监利停了一天。在这段航道上，登陆艇航行得很慢，当时监利这一带是人民解放军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什么会把载有我们这批学生队伍的登陆艇在这段“危险”的北岸江边停下来，我们一直不得其解。

到达重庆以后，为了等军校来汽车接我们，因此又住了几天，3月下旬，我们这批从长沙新考进来的学生到了校本部——成都北较场。在文殊院稍事休息以后，即到了军校二十三期入伍生集训地——双流县机场。这时集训地已有一千多名从

* 高中凯，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二十三期毕业。

全国各地招来的学生在集中训练。我们这批长沙来的新生到达以后，才正式组编二十三期步兵科第三总队，我编在二大队五中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人基本素质训练以后，5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从此我开始了正式的军校生活。

军校生活很艰苦，训练也很紧张，尤其是入伍生阶段，每天的军事操课真是累得喘不过气来。对制式教练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注重军人的外观气质美，一个立正、稍息、向右看齐的动作，除了有专题训练以外，每天在其它操课之前都有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反复练习。在军事体操训练方面，要求也非常严格，单杠要求能正面上，木马要求能并腿跳过。这两项我在读中小学时，从来没有接触过，不但感到陌生，而且有些畏惧。在我所在的那个中队特别是那个区队有个规矩，单杠翻不过、木马跳不过的星期天不能休息，要利用休息时间自己琢磨要领反复练习，以便将来毕业分到部队以后，能向士兵做好示范。这两项军体训练，我一直到入伍生训练快要结束时，才勉强达到了要求，所以在入伍生阶段，除了平时训练紧张以外，星期天也没有很好休息。

入伍生阶段一共训练了3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从单兵教练一直学到连教练。由于时间短，训练内容多，所以训练强度特别大，尤其是我们这些刚从“文学校”出来的学生，开始的确有点受不了。幸好每星期除了操课以外，还有两次课堂军事课和一次政治课。军事课学习的是《步兵操典》和《内务条例》，政治课轮流学习《三民主义》和《总理言行》。我们便利用课堂听课的机会打瞌睡，以调节在军事操课中的疲劳。

入伍生训练结束以后，进入学生阶段的学习和训练，这时我们驻地从双流迁到了成都市中心的皇城。学生阶段军事操课的比重少了，增加了一些军事理论课，如《战术学》、《兵器学》、《地形学》等所占的比重较大，特别是《射击要范》、

《地形、地物、地貌在战斗中的运用》等，这些对我后来在人民解放军连队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军校，和同学们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由先期毕业同学担任的正副中队长和区队长，他们不仅是带队的领导，而且是制式教练、军事操课、野外演习的教官。他们对同学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讲情面，不象从校本部派来专门在课堂上上课的教官那样，看见同学们在课堂上打瞌睡也不管，只要他把事先准备的教案照本宣科地讲完了，就算完成了任务，下课走了。中队长和区队长就不是这样，他们讲课没有教案，但非常认真做示范，对同学们的动作只要有一点不符合训练规范，就要罚重做若干遍，甚至没完没了地进行“单兵”训练，打骂现象也时有发生。同学们对他们表面上惧怕，显得很服从，但内心不服，怨恨情绪很大。同学之间因都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年龄相差无几，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和亲人，一起在军校学习，有许多同命运的共同点，所以一般来说，能够做到互相关照，特别是同乡又同在一个班学习的同学，感情就更深了。

军校的政治教育很薄弱，文娱生活也很贫乏，平时很难看到报纸，中队长和区队长与同学们交谈，除了军事操课和军事理论课以外，从不谈论时事和政治一类的事。长沙和平解放这样一个重大事件，我还是在中队举行的中秋晚会上才知道的。我们中队长是湖南邵阳人，我们中队湖南人比较多，中队长借用中秋节这一天晚上，在月光下集合我们全体同学告诉了这一消息，欢迎我们每个同学唱一首自己最感兴趣的家乡小调或地方戏来怀念家乡，这次晚会是我来军校以后仅有的一次，事先没有准备，同学们你推我拉地一个接一个地唱着自己最得意的歌子和戏曲，同学们总要热烈地鼓一次掌，还要喊一喊“欢迎再来一个”。晚会开到深夜结束了。这次晚会勾起了我自进军校以来的第一次思乡之情与沉思，当时久久不能入睡。在军校，

平时没有任何文娱活动，营房内很少听到歌声，只是在出操和收操的路上，伴随着“一、二、三、四”的喊声唱几首抗日时期的老歌子，唱得最多的除了岳飞的《满江红》以外，还有一首不知名的歌。歌词是：“国旗飘，国旗扬，大家背着枪儿，准备上战场；不怕死，不投降，保卫我们祖国，保卫我们家乡。因为每次起音都从“国旗飘”开始，所以我们习惯地就称这首歌叫“国旗飘”。每天在出操和收操的路上都要唱这首歌。

6月初的一天，教育处代处长李永中少将来双流向同学们训话，这一天我正好值勤当“采买”，还有同学值勤站岗，没有听到训话。事后，同学们告诉我：这一次李处长来是为我们二十三期三总队同学集体加入国民党举行宣誓仪式的。从现在起，我们都是国民党员了。真有意思，不管愿不愿意，不管听了训话与否，都清一色的成了集体国民党员。

6月16日是军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前一天我们就从双流训练基地背着背包，扛着枪步行到了成都南较场住下，16日清早，我们吃完早饭就整队前往校本部——北较场，接受校长的训话和检阅。从南到北穿过成都的大街小巷时，由于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军容非常整齐，一路上引起了行人的好奇，有的停步看着我们行进。难怪军校在成都素有“精神堡垒”之称了。校庆完了之后，我们仍回到双流训练基地。

1949年的初夏，我刚进入军校大门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天堑长江解放南京以后，从此，解放军的足迹所到之处，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不是举行起义，签订城下之盟，就是投诚、土崩瓦解。半年多一点光景，祖国东南、中南、西南、西北半壁河山，就一片一片逐步成了新的解放区。1949年12月1日，重庆解放了，同日蒋介石飞抵成都，住进了军校北较场校本部。在12月初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他在校本部北较场中正堂前召集我们二十三期三个总队的同学训话，由于他

浙江家乡口音较浓，我听不习惯，加之扩音器吱吱喳喳作响，虽然我们都立正站着，鸦雀无声地聆听他的训话，但谁也没有听清他训话的全部内容。事后我们同学在相互交谈中，才知蒋大概讲了：“……为挽救党国于危难之中，重整国军元气，决定迁校……这次迁校，不是避难，今后复兴重任，要落在你们肩上……”等语。蒋对军校同学的确很器重，就在这即将完蛋的时刻，他还把一线“复兴”希望寄托在他认为是忠于他的学生身上。他没有把学生派到前线去挽回他无法挽回的失败，而是要迁校保存“复兴”的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可见他用心是多么良苦。训话结束以后，他走向同学的队列，默默地巡视全体师生。随即他还到驻校本部的同学教室里去看望同学们的晚自习。

重庆解放以后，成都一天比一天吃紧，我们忙着做迁校的准备。12月9日，云南卢汉、西康刘文辉相继通电起义。蒋介石于10日离开成都去了台湾。军校在这个时候也整装从成都向西南方向迁校了。第一天行军90华里到达新津，第二天到彭山，第三天到了眉山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天以后，忽然接到返校的命令。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返校，事后才知道，这时川西南通往西昌和云南的通道已被解放军截断了，乐山战事危急，兵团司令宋希濂被俘。军校想从陆地上步行到蒋介石在战略上的“复兴基地”——西昌是不可能了，或者说不安全，所以张耀明校长命令我们返校。这时在我们返回的公路上，都是胡宗南的部队，他们继续朝眉山方向行进。胡宗南部队穿的是黄军装，我们是灰色军装，在公路上一来一往，一灰一黄，显出一幅乱糟糟的景象。在公路上，很显然也可以看出：穿灰军装的个个年轻，但武器装备陈旧，因为我们是迁校不是去打仗，所以没有换装，同时，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的确再拿不出好武器来装备部队了，因此我们手中的武器仍是历

屈同学用作训练的步枪和机枪。穿黄军装的武器装备好一些，但他们一个个面黄饥瘦，年龄较大。他们去的方向，正是川南硝烟正浓的战场。

我们返回到新津以后，在新津机场附近驻下就没有继续往成都的路上行进了。这时新津机场每天都有几十架飞机起降，天空中整天嗡嗡隆隆，这时张耀明校长已不辞而别地飞到了西昌。我们在新津驻了几天以后，就朝西往大邑方向去了。

大邑是刘文辉的老家，到大邑的第一天，我们驻在刘家的庄园里，第二天移驻大邑县城。就在这一天的下半晚，城外忽然枪声大作，伴有迫击炮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半晚我们在睡梦中听到枪炮声以后，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迅速穿好衣服，整理行装，待命接受任务。天快亮了，我们饱饱地吃了早饭，把没有吃完的饭都装进了干粮袋。天亮以后，中队长带领我们登上城墙，以城墙为依托构筑临时工事。9点钟左右由第三总队派第七中队一个区队担任尖兵排出城搜索，半小时以后，全校师生撤离大邑县城朝郫县方向走了。这次与驻在城外军校教导团交火的部队，开始我们以为遇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后来得知是刘文辉的已经宣布起义的部队，他想在解放军还没有到来之前把军校“吃掉”。殊不知，这时军校带队总指挥已暗中准备起义了，因此没有与他们硬拚，主动撤离县城。而刘文辉的部队可能怯于军校的实力，也没敢贸然组织进攻。这次在大邑初试锋芒以后，军校的一些辎重和供训练用的各种大炮和车辆都放弃了，沿着岷山南的边缘小路向郫县进发。郫县是罗广文部队的驻地，这时他已暗中起义了，我们进入他的防区以后，接受大邑刘文辉部队搞突然袭击的教训，只穿城而过，没有驻进县城，晚上在乡间竹林中过夜，不举火，不喧哗，半夜还要转移宿营地，直到军校带队总指挥李永中少将于12月25日正式宣布起义以后，这时我们才正式驻进了当地绅士的大屋。

宣布起义以后，同学中的反应很强烈，有高兴的、有咒骂的、有无可奈何无动于衷的。各种思想、各种看法和想法，无形中把同学们分成了一它它，一块块。这时我所在的中队，中队长跑了，区队长跑了，中队领导层只剩下刚从二十二期毕业，在迁校时才分配到我们中队任副区队长的同学没有跑，但他们不管事。在同学中，有的也跑了，后来听说他们有的乘飞机，有的从陆地问道到了台湾；也有一部分认为前途渺茫，悲观失望地离开了已经宣布起义的军校，回到了家乡，但大部分同学仍留在军校等待解放军的整编。

解放军还没有正式接收之前，同学们每天不是睡觉和谈天说地，就是赌博和外出散步，整天无聊得很。12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了，30日解放军进入成都市。这时解放军代表也来到我们军校向同学们讲话。这次解放军代表来讲话，有极个别的同学，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他们子弹上膛，扬言如果解放军代表有侮辱我们的语言，就要向他开枪射击。幸好，这天来向我们讲话的解放军代表赵树森同志，理论水平很高，他态度和蔼可亲，语言谦虚谨慎，讲话言简意明，他每一句话都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听起来很新鲜，很有道理，也很有人情味。讲话中不但没有半句侮辱和谩骂的词语，而且每提到蒋介石时，还加上“先生”两字。记得他讲的大意是，“……形势发展的结果，使我们站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是兄弟，不应该刀枪相见，至于造成我们兄弟间的残杀，这不是共产党赞成的……我们共产党人现在要实现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不受剥削，不受压迫，人人平等，人人有事做……现在同学们在李将军的率领下举起了义旗，我们非常欢迎，欢迎你们参加人民解放军，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力量……”。赵树森代表讲话以后，绝大部分同学都心服口服，就是原来准备向军

代表开枪射击的同学，也自动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

赵代表讲话不久，解放军十八兵团随营学校就派来了各级领导同志正式接收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第二期学员了，原陆军军官学校各总队、大队、中队的番号仍保持不变。从此我在随营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

1950年元月，我们从郫县来到新都，随营学校原建制不动的改名为西南军大川西分校。这时原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向每个同学收集了两块银元，作为编印同学录和订制毕业证章的工本费。1950年春节后，我们仍留在学校的同学，每人都收到了一本“同学录”和一本“阵中教练”，一枚纪念章和一枚毕业证章。由于受条件限制，没有举行毕业典礼，但在校本部撤销并入军大之前，为我们颁发了毕业证章和同学录，表明已正式确认我们二十三期的同学从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了。

顶风斗雨向太阳

——记劲草社和《孩子的世界》

放牧 郁青 若文*

“劲草社”是一群向往光明的青年学子，在风风雨雨的40年代，自发组建的学术团体，先后延续8年，成员80余人，活跃在益阳、安化、长沙、湘乡等地。她还创办了当时内地唯一的儿童刊物——《孩子的世界》，发行数千份，销及省内外。他们顶风斗雨，探索追求，终于迎来了朝阳。

一、一群热血青年的自愿组合

四十年代前期，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日寇沿粤汉铁路大举进犯，大半个湖南沦于敌手，蒋介石却制造“皖南事变”，发起反共高潮。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经过顽强的斗争，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带来希望。这时期的青年学子，在枪炮声和炸弹声中经受特殊的磨炼。他们充满救国的热情，思考民族的命运，憧憬光明的未来。

1942年，黄梦兰、黄人凌等先后来到设在益阳板子桥的湖南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读书。这所新建的学校，却奏着孔孟的老调。国民党、三青团和地方势力纷纷插手，争夺对这块阵地的控制权。黄梦兰、黄人凌跟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具有一种对

*放牧、郁青、若文，均参加了当时的劲草社的活动和《孩子的世界》的编辑工作。

时代的敏感和责任感。他俩爱好新文艺，订阅和寻找新书刊，比如鲁迅、高尔基的作品，艾青等人的新诗，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桂林等地出版的进步报刊。课余贪婪地阅读，做读书笔记，同校内外志趣相投的人交流思想。他们从新文艺中汲取新思想，由对现实不满而渐渐萌发出一种对新的世界的向往。虽然这种向往还处在一种朦胧状态之中，但是他们顽强地探寻着。

渐渐地，他们吸引和团结了一批爱好进步文艺的同学。黄子奇、杨来凤、刘宜书、邹依仁、唐自力、汪凝靖、谭守康、欧阳永金（阳光）、曹锵、成廉（一定）、苏月玖（苏江）、胡友逸等同学，还有靠勤奋自学由校工升为图书管理员的邹定生（高望），都先后加入到研讨新文艺的行列。他们传阅喜爱的书刊，交换各自的习作，还进行集体研讨。为避人耳目，他们在后山小树林里找到一块空地，大家称它叫“东部台地”，课余就常在这里阅读和讨论。同时，他们在各自的班上主编壁报，发表一些抨击黑暗、追求光明的短文和新诗。黄人凌在作文上写了一篇《大众哲学》的读后感，在墙报上发表《朝大辣》等杂感，第一个学期的操行评语就是“思想欠纯正”。当时，在民国大学任教的左翼作家张天翼贫困交迫，黄梦兰、黄人凌即发起募捐，进行慰问。这些活动，引起了学校当局的严密注视。于是，他们的信件被检查，日记被偷看。学校三青团负责人先是要同学“规劝”黄人凌、杨来凤等莫看进步书刊；后来自己出面，多次“告诫”黄梦兰等“勿入歧途”。1943年，学校负责人贪污公款，引起公愤，黄梦兰、黄人凌、刘美夫（地下党员，当时与党失去了联系，现已承认其1939年党籍）、许在一、湛昭华等同志秘密起草印发《快邮代电》，公开揭露这些劣迹，在校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学校当局十分震怒，为此进行全校紧急集合和突击搜查。汪凝靖在日记上写了看到《快

邮代电》后甚表同情的话，几乎被开除学籍。黄梦兰、黄人凌的行动进一步受到监视。黄梦兰被迫于这年寒假转学，改名为黄天铨。

1944年夏，日军侵占长沙，益阳危在旦夕，五师迁至安化江南坪。黄人凌回湘乡同家人一起逃难，在娄底当了一年小学被师。黄人凌、黄梦兰虽然离校，但与校内有志研读进步文艺的同学时有书信往来。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局中，志同道合的人都有组合的愿望，这就是成立“劲草社”的契机。

1945年上期，五、六班即将毕业。黄子奇等同学，感到毕业后各自东西，“组合”的愿望更加强烈。经过进一步酝酿，于6月14日（农历端午节，当时称诗人节）在资江之滨的安化江南坪，聚会成立“劲草文艺社”。参加的有五班的邹依仁、黄子奇、杨来凤、刘宜书、唐自力，六班的汪凝靖、谭守康，九班曹椿，十班成鹏，十一班胡友逸、苏月珍，十四班曹雪琴、罗恕安。会上，公认黄梦兰（曾读三班）、黄人凌（曾读五班）为当然的发起人，他俩和邹定生虽不在校，都被列入第一批社员。“劲草”成立不久，就放暑假了，五、六班的社友在依依惜别中离开了学校。

1945年下期，抗战胜利，黄人凌回五师复学，入第九班，读三年级，担任“劲草社”的负责人。“劲草社”的活动开始有组织地开展起来，在校内发展社员，继续阅读进步书刊和练习写作，互相传抄和唱一些喜爱的歌曲，如《雾的黎明》和《复活》里的插曲《卡秋莎》等。同时，加强了与被外社员的联系。这时的新社员，除五师九班的蒋开元、十一班的夏习义等同学外，在一师读书的田放牧、丁雪松、李白楼等也参加了。

“劲草社”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劲草社员显示了当时进步青年的可贵的素质，那就是蔑视权贵，不满现实，坦诚待人，亲密无间。劲草社员象兄弟姐妹一样，有困难互相扶助，

有缺点敢于互相批评。“劲草”不是那种庸俗的小社团，而是一群热血青年的自愿组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劲草社员接受进步文艺的熏陶，处处表现出一种与旧势力相对立的气概。比如黄子奇到桃江鸬鹚渡教书，察知校长何墨仙对寄宿学生进行克扣剥削，推行法西斯教育，便与另一教师连夜赶制传单，四处张贴，进行揭露，使何墨仙一气毙命。1946年，苏月玖、夏习文等，积极参加反对周校长殴打学生的斗争。这些，表现了疾风中的劲草风格。在不断的学习和斗争中，劲草社员的觉醒从朦胧状态开始明朗起来了。

二、《孩子的世界》——一块战斗的绿草地

1946年，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年代。抗日烽火的余烬犹存，内战的枪声又响彻神州上空。在重庆、在昆明、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着一起又一起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和进步人士的惨案。这些惨案在劲草社员中引起了慨撼。原在五师七班后转到四川读书的欧阳永全，为社友们寄来《新华日报》等革命报刊。这些报刊在社员中秘密传阅，使大家的头脑更加清晰，从而激发起对腐败现实进行揭露、抨击的报烈感情。

此时，五师已由安化迁回益阳，“劲草社”的阵容继续扩大，先后入社的有十一班的肖博文、王卿和，十二班金玉珍，十三班蒋鸿文、方吉春、张茂樾，十四班刘爱华，十五班黄子干，十六班傅定康、习咏霞，十七班吴光中、章亮才、胡汉中，十八班杨端青、陈弗如；十九班毛慨生、夏炳熙、刘兴海、刘日升、杨文质、段敬中等。但是，此时的“劲草社”在学校还未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他们一方面在校内以各种名义出墙报，一方面向省内外报刊报稿，用自己的笔为新文艺呐喊，向黑暗势力冲击。

写作活动给劲草社员很大的锻炼，他们不满足于办墙报和

向外投稿，渴望进一步发挥作用，决定自己创办一个刊物。办一个什么刊物好？经过反复计议，大家认为先办一个儿童刊物为好。因为社员都是学师范、当小学教师的，办一份给小学生看的杂志，名正言顺，学校和有关当局无理阻拦；而且当时本省和邻近各省都没有儿童刊物，孩子们正需要一份有益的精神粮食，于是，定名为《孩子的世界》。由黄人凌任主编，曹锵、曹雪琴等办理发行、组稿等工作，夏习文负责封面设计和插图。因黄人凌主办刊物，另选蒋开元为社长。

要办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谈何容易！但是劲草形成的不畏风雨的乐观精神，竟使他们冒冒失失地干起来了。社员们热情洋溢，有的省下零用钱，有的献出制衣服的钱，有的向亲友募款，居然筹集了一笔买纸张的钱。当时印刷刊物主要是纸张费和印刷费。纸张费有了着落，印刷费却成了问题。幸而当时五师物理教师崔琳和方克诚合办了一个印刷厂，答应先印后交款，给《孩》刊的出版以很大的支持。印刷问题解决以后，社员们积极投入写稿、编辑、发行工作，忙得废寝忘餐，甚至终夜不眠。他们将自己的青春活力和一种伟大的理想凝注于这个小小刊物，这个刊物成为劲草社开辟的一块战斗的绿草地！黄人凌在创办《孩》刊倡议书封面上激情地写道：“一个美好的梦——要实现它！”

1946年3月，第1期《孩子的世界》终于问世。刊物大都寄往益阳、湘乡、宁乡、沅江、新化、汉寿、南县等地教小学的五师校友，请他们向学生推销，小量的托书店代销。收回的书款，作为下一期费用。刊物为36开，30多面，内容以短文为主，包括时事、童话、故事、儿歌、谜语等。第1期印500份，很快销完。第2、3期印800~1000份，封面加套红色，文章加上木刻插图，增辟《孩子的作品》专栏，选登小学生的文章。从第3期起，《孩》刊开始在省城露面，受到各方面注意。当

时的《湖南日报》于1946年4月28日第3版刊登消息，报道了《孩》刊情况：

“省立五师劲草文艺社，经黄人凌、曹铎诸君所组织，感于近日儿童课外读物异常缺乏，特创办《孩子的世界》半月刊……该刊业已出版三期……其第三期要目，计有：《可怕的石碑》（神话），《寄于春风里》（卫生讲话），《詹天佑——我国的科学家》（传记），《树的年纪》（自然故事），《小朋友和燕山姑娘》（故事诗），《两位小朋友的死》（通讯），《春天到》（歌曲）等，均极适合儿童胃口。目前五师教育参观团来长参观，将该刊分赠各小学，极受各校小朋友之欢迎。”

随着《孩》刊影响的扩大，劲草社也得到学校的承认。后来，校长杨朴庵为劲草社提供了办公室，允许社员误餐补餐，晚上加班也不加干涉。《孩》刊就请杨当发行人，借他的名义在社会上募捐。曹铎、章亮才、王卿和、肖博文、蒋开元、蒋鸣文等，曾为募捐分别在长沙、益阳、安化等地劳碌奔波，但收效甚微。

《孩》刊第3期出版后，黄人凌等九、十班的社员忙于毕业，即将离校。“劲草”改选蒋鸿文任社长，并决定章亮才、吴光中（飞邀）暑假留校，编印第4期。由于天气酷热，操劳过度，加之自理伙食半饥半饱，吴光中不幸罹疾身亡。章亮才在家住附近的罗恕安及其家人和王卿和等留校师生的帮助下，凑钱买了棺木。第二期开学，劲草社员以及全校师生为吴光中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出了悼念专刊。吴光中成为劲草战斗历程中奉献生命的第一个人，至今仍在后死者的心中留下深切的怀念。

吴光中去世，章亮才孤掌难鸣。黄人凌从湘乡动员田放牧前往益阳，协助章亮才工作。两人以粗茶淡饭为食，精心编印刊物，前后历时半月多，回家时已身无分文，只得冒着7月流

火，日夜兼程，半饿着徒步返回湘乡。

1946年下期，二十班的谭宇佑、傅德玉、罗魏容、陈丽芳和二十一班的万志达（恩远）、郭济良、王朗秋、唐碧生、刘耀黎、刘裕家、陈敬尧等先后入社，章亮才任社长。《孩》刊继续在益阳出版，定户扩大到教师和青年，销量一般在1000份左右。由于当时货币贬值快，物价飞涨，以致上期售价不够下期成本，经费极端困难，至第7期就很难维持了，《孩》刊面临停刊的危险。

此时，一些已经离校的社友对《孩》刊的命运十分关心，他们认为，《孩》刊是“劲草社”的旗帜，在小学教育界已有较大影响，无论如何也得将它延续下去。当时在长沙的黄梦兰、在湘乡教书的黄人凌和在一师读书的田放牧，积极地主张《孩》刊迁长沙出版。经过商酌，决定“劲草社”社址仍设益阳，“孩子的世界杂志社”则于1946年寒假后迁到长沙，由黄梦兰、黄人凌、田放牧负责。

迁长初期，真是百无一有。主要负责人黄梦兰，是个失学青年，在一个开书店的朋友处寄餐（后任新闻记者）。要在省城办一个象样的刊物特别是适合儿童特点的读物，每期都要约一些高质量的比较进步的稿件，要有制成锌板、铜板的美丽插图，要找字体最多、印刷精美因而价格比一般高出50%的公益印书馆付印，要千方百计靠借贷等办法搞到印3000至5000份刊物的经费。为此，黄梦兰等四处奔走，绞尽了脑汁。1947年4月4日（那时的儿童节），《孩》刊移长后的第1期出版，仍为36开，封面为3色套印，内有木版及锌版、铜板插图10多幅，刊物面貌焕然一新，并在《中央日报》上刊登了广告。刊物印出后，益阳等各地社友销售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大部分由黄梦兰在长沙销售；除分送10多家书店寄售外，主要是在有五师同学或亲友教书的小学建立了40多个发行和通讯网点。为了

这份内地唯一的儿童刊物，许多老同学花了不少精力，特别是长沙市的三一、景蔡、修业、东一、北一、西一等小学做得特别好。此外，在《中央日报》、《湖南日报》、《经世日月刊》、《文艺建设》等报刊及书店的图书目录上，刊登不花钱的征订广告或书刊评介，从而使《孩》刊远销本省数十县和武汉、南昌、重庆、杭州等地。当时在《中央日报》编副刊的蒋牧良以及在民国大学的张天翼都对刊物给予指导，社友来稿踊跃，刊物溶进步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如郁青的童谣，若文的《与小朋友谈心》，放牧的童话《红狐狸》等，均受读者欢迎。以后刊物一般每月一期或双月合刊，销量由2000份上升到6000份。由于社友和校友及时将销售款上交，加上黄梦兰筹措有方，所以刊物能够维持下去，并且一期比一期好。以后，《孩》刊加入“全国杂志联谊会”，并照章获得善后救济总署的一些资助。但随着国民党政权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加深，物价飞涨，好容易收回上一期的销售款，却不够下一期费用的一半。两年多内，黄梦兰等在经费上花的心血最多。大家一心为着事业，劲草社员都自觉地凑钱、出力，谁也没有拿过报酬和稿费，这种情况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1947年上期，《孩》刊共出3期，由黄天钧、田放牧主编（刊物底页署名：若文、放牧主编）。此时，田放牧与丁雪松、彭南桂等人，另组建了一个“文艺建设杂志社”，出版文艺性期刊《文艺建设》，加上田放牧在这学期末离开一师回湘乡教书，《孩》刊的编辑力量减弱，于是黄梦兰动员黄人凌来长沙。1947年暑假，黄人凌来长办刊，但到秋季开学后仍找不到“饭碗”，就在一家书店里当店员，后来由于一个五师老同学要去参加考试，才挤到城西一校去代课。从1947年暑假起，《孩子的世界》杂志社社长为黄天钧，主编为黄人凌，后增加湛昭华负责财务，胡仲良负责校对和联系。刊物一直办到1948

年寒假。

1947年，中共湖南省工委以长沙为重点，领导群众广泛地开展反对内战的民主运动；并在运动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1947年8月27日，在省工委的关怀指导下，“湖南经世学会”在长沙成立。黄天钧、黄人凌是学会的发起人和骨干分子，同于1948年入党，并都担任过支部书记和区委委员等职务。

从1947年暑假起，《孩》刊的主办人已由一般的追求进步转为自觉地投入地下党的领导的活动。他们更是有意识地通过《孩》刊向小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对小学教师和小学生家长也起了一定的思想教育作用。当年的一些小学高年级学生，曾在《孩》刊的影响下，培养了革命思想，有的至今还记得《孩》刊上的文章。他们在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常常提到《孩》刊所起的启蒙作用。1948年10月30日出版的《经世月刊》在《书刊漫步》一文中，专门对《孩》刊作了评介，指出《孩子的世界》“是内地唯一的儿童月刊，创刊已经三年多了。不论内容或形式，每一期都表现得比上一期有进步。由这里，我们知道编辑者的态度很认真，想给孩子们一份有营养的食粮。这家刊物与一般杂志不同，它是36开的小册子（有36面），封面是四色套版，锌版、铜版的插图，每期有20多个；而且各方面的知识，都是经过故事化而为孩子们乐意接受的。每期的内容，大致有：童话、寓言、名人故事、史地故事、科学讲话、算术故事、时事、小工艺、故事画、着色练习、儿歌、新诗、歌曲、儿童剧和孩子的作品等。10月份出的第四卷第三期中，象《变色的笔》（童话）、《永祥弟弟》（故事）、《高尔基的童年》（名人故事）、《破雨伞》（童话诗）、《小哥哥谈时事》（时事）等，都是很好的作品，每篇都能使孩子们对事物、对人生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三、劲草，在初露的曙光里

《孩》刊迁长后，“劲草社”在五师校内继续开展各种活动，并致力于《孩》刊的写稿和推销工作，益阳、长沙紧密联系，书信来往频繁，从未间断。每期五师毕业班的同学都要来长沙参观学校，也是两地社员聚谈的好机会。在校内，傅定康、胡汉中、万志达、成云华（惕四）等先后担任过“劲草社”社长。1947年后，五师二十二班的周凤姣、罗赛兰、贾雪春、胡阳春，二十三班胡淮溪、熊树德、黄汉斌（迪光）、彭文南，二十五班成云华、吴传朴、李邦祚、曹景昂等同学以及五师教师酆松臣、陈召尧等相继入社。在校外，已毕业的三班校友湛昭华、朱立奇，还有非五师校友如李俊田、刘欣森、彭南桂、胡仲良等热血青年，也加入了“劲草社”。社员分布于20多个县市，他们互通通信，互相鼓舞。各地社员来到长沙，都受到热情接待，在外地也常常能收到长沙寄去的进步书刊。

1947年暑假，黄梦兰、黄人凌在长沙参加发起组织“经世学会”的过程中，接近了中共地下党员，受到了党的直接教育和培养。是年9月20日前后，“劲草社”召开社员大会。到会的有邹依仁、黄子奇、成廉、苏月玖、肖博文、王卿和、蒋鸿文、曹雪琴、罗恕安、黄子干、傅定康、胡汉中、杨端青、章亮才、夏炳熙、毛颢生、谭宁佑、罗魏容、傅德玉等（成廉还保存有这次大会的合影）。当时，黄梦兰、黄人凌带着他们感受到的新思想，专程由长沙到益阳会龙山畔、龙山港边的第五师范参加大会。在讨论“劲草社”和《孩》刊时，自然离不开对形势、时局、理想、前途的看法，他们还进行了会外的交心和畅谈。因而，在不少社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在思想上、感情上进一步加强了相互间的理解和联系。在时代的召唤下，劲草精神有了新的升华。

“劲草社”在五师每个学期都要吸收新社员，但要求比较严格，每次都只吸收几名。每学期首尾都要开社员大会，期初欢迎新社友，通过活动计划，期末回顾总结，欢送毕业班社友，并合影留念。除选举社长外，还设学术股长、总务股长等。学校给了两间房子，一间开会、办公，一间放图书资料。书柜里，装有鲁迅、冯雪峰、艾思奇、胡风、绿原、卢梭等人的著作，还有马恩著作，只没有古书。书刊大都是社友捐赠的，也有《孩》刊交换来的。经常有社员在那里写作、编辑，有曹雪琴、傅定康、杨端青、傅德玉等几位热心服务的女社友值班管理图书，回复校外社友的来信。社友有浓厚的读书风气，并十分认真，有的还交了厚厚的读书笔记。书柜里就有陆六（毛颢生）写的关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读后感。社员写的文章，常在社友中传阅、朗诵，由大家评论。“劲草社”每学期都要出几期墙报，选稿比较严格，讲求新意、创见，排除一般应景之作，因而声誉较高，师生们都争相阅看。每学期要举办几次学术讲座，题目、内容都有讲究，如曾请名老教师周明生讲新文学、吴培元讲教育问题、杨朴庵讲西洋文化史等，每次会场都坐满了人，迟来的就站着听，在全校有较大影响。“劲草社”还开展文娱活动，传播进步歌曲，如揭露、讽刺反动当局的《茶馆小调》、《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等，常由谭宁佑等组织教唱。还办有《劲草通讯》，反映学习动态和社友的活动情况，密切各地社友之间的联系，增进友谊和情感。

“劲草社”关心教师的疾苦。1948年，一位姓张的数学教师，妻子没有工作，儿女较多，为维持生活，他每周上36节课，星期日还得到外校去上课，累得声嘶力竭，脸色苍白，而有的小孩还只能光着身子过日子。“劲草社”研究后，带头拿钱、拿衣，写慰问信，出专刊，发动全校募捐。在此情况下，

上面怕因此酿成学潮，只得设法解决；但同时又提出要追查异党活动。

1949年上期，上面不拨粮，学生没饭吃，面临散伙的危险。学校请益阳田粮处长来“作报告”。他一进门，就被愤怒的学生围困、软禁，被迫写了拨粮通知，直到把粮运回才让他走。在这场胜利的斗争中，劲草社员在总策划和分组行动中，都起了骨干作用。如当时到新桥河、黄溪桥等处粮仓出谷下船并押运回校，就是由学过武术、热心公务的劲草社员胡淮溪等负责完成的。在解放前夕的应变斗争中，受地下党影响的劲草社员熊树德、胡淮溪等，以班刊名义，油印出版《心潮日报》，吹响了黎明前的战斗号角。他们以《宁乡解放》为题，报道湘中游击队的活动，被教导主任勒令停刊，并受记过处分；但经过全班同学抗议、请愿，两天后又复刊。他们又借“国共和谈”之名，辟专栏分期介绍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物，还透露了一些解放见闻。资料来自《新观察》等校外劲草社友寄来的进步报刊，比如谭宁佑于1948年秋离校去山东解放区后，就常寄来这方面的信息。当时，对应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一次全校性的应变辩论会上，熊树德作好充分准备，在会上慷慨陈词，把顽固派的言论驳得体无完肤；同时，讲形势，讲政策，讲利害关系，解除部分师生的疑虑，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这时恰好响起学校开饭的铃声，大家在掌声中一哄面散，获得比预料还好的结果。

一些劲草社员如曹饴、苏江、全玉珍、曹雪琴、黄子干、习咏霞、傅定康、毛颀生、陈丽芳等，相继来到长沙工作。长沙的劲草社员大都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经世学会”的活动，其中不少人加入了地下党。他们利用“孩子的世界杂志社”这块牌子组织活动。比如1948年9月和1949年2月，“孩子的世界杂志社”先后发行两集《孩子的音乐》，收录了适合儿童的

进步歌曲，被长沙市很多小学采用为教材。在此期间，人凌、天钧等联系小学教师和音乐爱好者，在长沙青年会组织了一个“儿童音乐研究会”，每周一个晚上在一起练唱歌曲。一些进步歌曲如《金风子》、《山那边哟好地方》、《唱出一个春天来》、《团结就是力量》、《农作舞曲》、《雄鸡高声叫》等，从这里迅速传播开去。

1948年，田放牧、李俊田以“劲草社”名义在《湘乡民报》主编《星文》副刊。此时放牧已入地下党，任中共湘乡城关区委委员。这个副刊是“劲草社”的一块新园地，人凌、梦兰、亮才以及其他社友，都曾发表多篇短文和新诗，在当时湘乡爱好文艺的青年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星文》从1948年6月开办，到年底结束，共出24期。以后放牧等人投入地下斗争，湘乡的劲草活动就停止了。

1949年初春，“劲草社”的骨干成员大都加入地下党组织，为争取湖南和平解放而斗争。《孩子的世界》编辑部、发行人员，也因全力投入紧张的地下斗争而无暇顾及。《孩》刊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49年1月出完最后一期，向广大读者告别。

一群热血青年自觉地组合起来的“劲草社”，由向往进步而参加革命，表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他们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走过了一条艰险的道路，终于踏上坦途，在胜利的曙光中，成为一株一株披戴霞光的劲草！

回忆留俄始末（1926—1928）

肖 范*

启 程 赴 苏

我国的革命史上有着一段重要的章节，那就是1923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与苏联代表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开端。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苏联政府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干部人才，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为名，于1925年夏在莫斯科创立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命名为“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简称中大。同年10月在中国招收第一期学生500名。其中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广州招考150名，其他各部队、各地方也都保送有若干名学生，此外共产党也派了一部分党团员到中大学习，还有国民党的高级官吏也都率先把自己的子女和亲属保送到中山大学。其中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伏龙，叶楚傖的儿子叶南等。

我是1926年冬中大招收第二期学生去莫斯科的。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势力已达到两广、两湖、江西等省，招生范围扩大了，争取留俄的人很多，所以把应考资格作了规定：

* 肖范，女，湖南益阳人，现年85岁，该文写于1990年。

1、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共青团一年以上；2、具有革命工作成绩；3、学业成绩优良；4、思想纯正进步。由各中等以上学校选送学生投考，进行公开考试，招考事宜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周以栗、谢觉哉等主持。当时，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读书，加入了共青团。我们第一女师召开了师生大会，提出有十几名合乎规定的学生进行投票选举，结果选出四名同学送省党部应考，我和曾月琴被录取了。

这次投考中大的因有上列条件的限制，只有200多人应考，被录取的共计11名。内中女性4名：周祚、章章是周南女中的，我和曾月琴是一女师的，还有湖南大学国民党特别区党部单独考送学生6名，内中一名女性于均祥，都是在长沙同伴启程赴苏。

旅 途 花 絮

湖南留俄学生的费用统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供给。

在长沙站的列车头上竖起了“欢送留俄学生”的红旗，月台上挤满了送别的人群，亲友临别总是谆谆嘱言，频频挥手，笑脸上挂着泪丝。我偷偷的瞥见老父噙泪盈眶，即把脸转视别方。初冬时节颇有寒意，在车上过夜，微觉凉侵，送行的好友黄经补君用毛线围巾盖在我身上，使我感到一身热呼呼的，她却自己冻了一整夜。因临行前领导上要我们莫带旧行李，都到上海去添新的。

由汉口换乘轮船，顺流东下，那时武穴以下还是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地区，我们的行踪都得秘密进行。

到上海登上苏联的远航轮，放眼远眺，海面上铺着绿色的绒毯被海风吹拂得起伏跌宕，远航轮上熙来攘往，万籁齐鸣；风吹浪打声，汽笛长鸣声，引吭高歌声，翻肠呕吐声，此起彼

伏，日以继夜，纵情的欢欣交织着抑郁的沉思，各人怀着不同的情绪。我真有点幼稚，不怕浪涌，不怕船震，独自一人漫步在船沿的走廊上。凝视着渺无边际的海面，惊叫起来：一个好大的摇篮，上面覆着碧绿色的天幕，下垫软绵绵的绿绒毯，真好睡大觉；一时神思恍惚，差点真的倒进海里。

帝俄时代的沙皇修了一条世界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把摩掌伸向东方，找了这个出海港口——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威）。远航轮经过三昼夜不停的行进，终于达到这个港口靠岸。我们在这里登陆，站在海滨，犹觉身在颤动，脚在摇晃，好象还是在船上一样。

由海参威改乘苏联的国际列车，驰骋在西伯利亚的荒漠大地。车上卧铺、餐厅、澡堂、暖气设备齐全，生活舒适。从车窗望去看见前方地面上嵌有一片很大的冰镜，这就是贝加尔湖。它从东北向西南斜横一个山角在铁路的腰部。车头转向西南再转西北，经一整天才绕过了这个山角的沿岸，再一直向西驶去。列车达到了欧亚分界线的乌拉岭，这是中国封建皇朝发配罪人充军的苦地。乌拉岭层峦起伏，横贯有十几个隧道，在其东西两端的出口处设有军警守卫，严防破坏。

舟车辘辘，经过将近一月的旅行劳顿，才达到莫斯科。

进 入 “中 大”

“中大”校址座落在莫斯科城内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科街。校舍4层楼房，规模宏伟，原系沙皇时代的一个企业公司，学校头门外围着铁栅栏，此外就是一个广场，场上矗立有五角金塔闪光的皇家大教堂，还有全身披挂钢甲的大彼得巨像。这广场也就是中大的操场。北国风光街道地面结冰如镜，行人大衣毛领上呵气成冰，这对我们南国人来说是很不习惯的。幸得进入校门，拂面就有暖气袭人，墙壁内装有铁炉生火，室内

充满了暖和的空气，进门脱掉大衣，挂到两厢的钢钩上，一身就感到轻松愉快了。

我们跨进校门登上2楼，就到办公室去注册登记。每人发给一本学生证，在红本本上编个号码，我的号码是554，又给取个时髦的俄文名字，我叫ЕозгаНоба，译音是“伯格达诺娃”以后在课堂点名，就把俄文名字叫得价响。接着就到卫生所去检查身体，发现有患传染性病的，即送医院治疗。检查身体各部位都要检查到，尤其检查性病更为过细。这对我们这些没出闺门的幼稚女娃来说，就象绑赴刑场一样，恐惧万状，坚决拒绝执行。苏联的医生横蛮得很，用力一扯，就把女娃脱得赤裸裸的，女娃直哭，他们还笑说：“中国女同志太封建。”

学校的房子实在不少，但办这样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学却有点不够分配。大会堂、食堂、教室、办公室、图书馆、俱乐部、贩卖部、卫生所把几层楼房挤得暴满的。学生宿舍安排在校外：男生宿舍在彼得洛夫斯基街，女生宿舍在加加林斯基街。房子都很宽广漂亮，暖气设备齐全，经常有苏联女同志在这里负打扫洗涤责任。

优 厚 待 遇

学生到校后就由学校发给每人一套被服。被子是著名的俄国毛毯，枕套、垫毯都是软绵绵的雪白的毛织品；服装是每人发给呢帽、呢衣裤、呢大衣、皮手套。男生是长统皮靴，女生是高跟长统皮鞋。这样的穿着显得阔气大方。大家嘻嘻地笑说：这那里象革命生，却象旧时贵族的少爷、小姐。

饭菜也很讲究，三餐都是颇为丰盛西餐。但是有些同学初起吃牛肉、牛油、牛奶很不习惯，久之也就适应了。当时苏联的粮食供应情况还很紧张，一般学校都是吃定量的黑面包，而我们是吃白面包，并不定量。苏联各大学学生每月伙食费为

30个卢布，而我们的伙食费却比他们多一倍，还怕中国学生长期吃面包不习惯，每周还特别为中国学生做两餐大米饭吃，又设有特别茶座，供应咖啡、牛奶、红茶和点心，学校除了供应学生一切生活和学习必需品外，还发给每人每月12个卢布做零用。

夏季的莫斯科并不热，但在暑假中学校利用假期把一部分学生送到南俄黑海滨的克里米半岛去避暑，又把一部分学生送到莫斯科近郊风景区的休养所去休养。在那里每天吃4餐，又从波兰进口水果给学生消暑。可以说苏联政府对中国学生象对贵客一样的招待。

全校学生组织有公社管理生活。若发生有重大问题就召开公社大会解决，公社以上设有同志审判会，处理学生不守校规以及同学间的纠纷问题。例如，有一次发生了一出闹剧：有位湖北的吴姓女同学，她原在国内的邱姓爱人到日本留学去了，她到中大又爱上了姓李的同学与他同住小房子。邱姓从日本调到莫斯科，她又陪他在旅社住了几天没有回校。经同学揭发找三方到案，经同志审判会详细审讯和他们三方坦白交代，以及辩护人的热烈辩论，终审判决邱吴仍圆旧好。

多边型的学习

“中大”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它的课程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大学，是专重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大学。学生按各人的学历分编班次，各期分为6个班，又另有英文班、法文班、是专为英法文程度较好的学生而设的，其余各班初用翻译听讲，一年以后大都以俄语讲授。所以入校后的头一年主要课就是学俄文。俄文基础没打好的同学自学很感困难，成绩也就比较差些。

中大校长拉狄克是有名的“中国通”，由他主讲中国问

题。教经济学的是马丁诺夫，教西方史的是瓦克思，都是一些权威的老党员。此外又选择了一些俄文学好了的中国党员当助教。如张闻天、秦邦宪、傅胜兰以及矮个子陈绍禹（即王明）也来讲过课。

除了上课，有时由苏共主要领导人来统作专题讲演。1927年5月斯大林来校讲过一次中国革命问题，同年3月列宁夫人克罗斯斯卡娅来讲过一次国际妇女运动。同年9月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来讲过国内形势。此外有时到工厂、农场、博物馆去参观。另有一部分同学在暑假中，调到莫斯科附近去受军事训练。

党派闹“中大”

中大既是政治性质，所以学生都是有其政治面貌的。其中以国民党党员居多，大约有500多人；还有共产党的革命干部、党团员；又有蒋介石保送的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数十人；其余来自各部队机关、党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各学校的学生，情况非常复杂。其中黄埔军校学生贺衷寒、邓文仪等在学校中进行频繁活动，他们想把500多国民党员结成派系，将来回国好利用来作政治资本，竟发起在学校组织“旅苏国民党特别区党部。”这个图谋遭到了学校当局的制止，他们并不死心，旋又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旅苏分会。”因孙文主义学会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在青年学生中已有深刻的不良印象，所以一开始就有人向学校当局揭发，即交由学校公社处理，由公社召开大会，宣传孙文主义学会是反苏反共的反动组织，并指责他们在苏联还搞这样的破坏活动是完全错误的，要求大会对他们作出严肃处理。当由大会议决：请学校开除他们的学籍，遣送回国。

1927年4月，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右派已经露出向

共产党进攻的矛头，这种恶劣气氛马上影响到了中大。因中大共产党党团员学生较多，他们不能象国内一样猖獗地向共产党进攻。但是他们也搞了一些破坏活动，如有很多的国民党员同学在社会主义教育影响下思想进步很快，重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逐渐增加，于是他们放出空气说：中央已经明令限制国民党党员跨党，我们是国民党选送的优秀党员，将来回国要当领导干部的，我们应当做一个忠诚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应以国民党党员身份来，仍以国民党员身份回去，如果跨了党，将来回去，不好交帐，对自己的前途会有重大影响。他们的这些宣传，收到了一定效果。

中大的托洛斯基派即反对派也闹得很凶。托洛斯基派头头都是在苏联政府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托洛斯基是红军总司令，拉狄克是中大校长，他凭借他的校长地位和讲授中国问题的机会，经常向学生宣讲托派观点。他说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的剥削，而不是封建地主的剥削。因此，中国农民的斗争不是反对封建地主，而是反对资本主义。又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有包括几个阶级的政党。认定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终究是要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走上同一条道路的。那么共产党不应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是完全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的。因此，共产党不应参加武汉国民政府，而应另组苏维埃政权，也不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军，而应自己另组红军。他又经常找党团员中与他思想接近的人谈话，或带他们去见托洛斯基，更千方百计拉拢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党入团。如蒋经国、冯洪国、叶南等都是经他介绍入团的。由于拉狄克有计划的拉拢学生加入托派集团，于是在党团员中形成了两个营垒的斗争，在党团员大会上经常吵闹打架。1927年苏共决议开除托洛斯基党籍时，托派分子纠集一些人进行示威，也在街上发生打架，中大学生李血泪、林爱民等也参

加了斗殴。

共产党党团员同学对此非常愤慨，国共两党同学中和共产党两派同学中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壁垒，同学间的关系搞得很紧张。

我是以共青团员身份进入中大学习的，我是内心热、外表冷的人，在这“十里洋场”的中大，我没去广交阔游、挺锋露角，我懂得那样做对自己没有益处，反会惹出很多麻烦。因之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和托派分子对这样冷漠的人不太重视。这时，独有两位颇有政治地位的显面人物，常来和我取联系。一个是中大翻译傅胜兰，另一个是东方大学翻译高衡。他们有时和我谈政治，有时教我读俄文。有人却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呢，以无声作回答。

一天在墙报上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在国际新闻栏发表了时事评论文章：现在东方帝国主义实行侵略政策，拟修建一条中东铁路（意指中山大学——东方大学）以便利侵略军进攻，达到向外掠夺的目的；另一方是闭关自守的封建女皇，迫于形势，已决定搞开放政策，向外发展。这就激怒了本国当权派的野心东，他们坚决保卫本国利益，不让女皇被人劫走，丧权辱国，双方都拥有雄厚的兵力和新式武器，势将导致一场热闹的世界大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我对此弦外之音，从不表示积极态度，甚至有时还相机避免与这些野心勃勃的活动家会见。

我的保守政策，孤立了自己，政治上决定是要失败的。在党组会上有人提议把我转党。但又有人提出异议：肖范每天捧着书本，不出绣房，衣冠楚楚，举止斯文，娇气很重，完全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小姐，一点没有革命家的气概。因之提议没有通过。这就是孤立外交的失误，和风云激荡的影响，阻碍了自己政治的发展。

恶浪荡苏联

1927年夏，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国内掀起了反苏反共的狂澜。这种恶腥浪头很快的荡到了苏联。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创立的中山大学，受到了强烈的震荡。一些国民党党员的学生思想波动，疑虑丛生，认为国共破裂，不知苏联当局对他们作何处理。大多数人不能安心上课，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有的说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把所有国民党党员学生都送到西伯利亚矿山作苦工；有的说某些国民党党员同学已经失踪，可能是被格伯乌抓去了；我们在这里，苏联政府对我们也不会有好的看法，我们不能继续留在苏联了，干脆向学校当局请求退学回国。首先就是黄埔系鲁岱、彭克定、谢振华请求退学回国了。但也有人决心为革命献身，正在这时请求加入共青团，继续留苏学习。如国民党党员、小学教师张佑忠是在这时加入共青团的，后来回国为革命而牺牲了。更有几位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国内已成为反革命头子，他们作出些表态。首先是蒋经国，他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蒋介石，痛骂他不该背叛革命，不该屠杀革命同志，声明永远与他脱离父子关系。继续就有冯洪国、叶南等也都发表了同样的信和声明，他们的表态，当时迷惑了不少的同学。

这时苏联的托派被打垮了，中大校长拉狄克被撤职，旋即任米夫为校长。米夫正式宣布：凡是国民党党员学生愿意留在苏联的，可以继续留校；不愿意留在苏联的，应在最近向学校提出回国的请求。在这个通告公布后，就有一百六七十名国民党党员学生提出请求回国。从此，每隔10多天即由学校宣布一批名单，即时办理离苏手续。从9月份起开始分批遣送，每批人数不等。旅费除由学校一律发给出苏境的车票外，另给50个卢布，不够部分由自己筹措。这样处理国民党党员学生的措施，一直继续到1928年上期才告结束。

群雁汉关飞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生在校都很安心学习。他们不管国民党党员同学怎样扇惑，也不管他们怎样行色匆匆，自己只是照常上课，照常自学，一切听上级指示。1928年下期，发现有些共产党党团员同学没来上课，也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以后逐渐有更多的同学没来上课了，我们这才头脑清醒过来。我和琴姐长夜深谈：党团员同学都渐渐回国了，我们绝对服从党，党叫我们到哪里就到哪里，回去纵是工作艰苦，生命危险，绝对不变节投向国民党。我们同伴来，同伴去，姿态表现得恬静自若。学校当局很了解我们，认为我们在政治上是比较可靠的，不论在苏联或回去都不会起坏作用，所以没有急于遣送我们，直到学校将要停办，最后才叫我们走。我们于1928年底回国，1929年学校就停办了。

傲骨斗严寒

1928年12月，已经是岁暮天寒时节，学校宣布一批名单共有8人回国。其中只有我和琴姐是女性。真的我们同伴来同伴去，得如愿如偿。路线仍是由莫斯科乘国际列车直向东驶，旅途经过10多天达到黑龙江省西北隅中苏交界处的清州里以北的地区（不知叫什么地名），就有苏联同志叫我们下车，住进一所矮小的牧棚式的房子里。这里没有暖气设备，晚上冻得哆嗦难受。睡到夜间1点多，又有苏联同志叫我们起床，他告诉我们这里是中苏交界处，因现在中俄断交，没有出国境的签证，不能通过，你们的身份都要隐蔽起来，你们分做3组，两位女同志做一组，个人把长统靴绑紧，有同志带你们经车站侧面绕到中国境地上车就没事了。我们问：“我们的行李哩”？他说“这你们别管，到时候就会明白的”。

这里漫山遍野是雪，真是一个浩瀚的银海，到处被雪映得通亮，走路不用照明，向导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有时一脚踩下去是个窟窿，雪没到了膝盖，幸得事先把长统靴扎紧了，不会把它脱在雪里面，一步一趋，一高一低，在凛冽的朔风中却走出了一身大汗。大约走了二三华里，到达了满州里车站。天快要亮了，向导交给我们每人一张从满州里到哈尔滨的车票（是当地俄人早就买好了的），回头就不见他的踪影了。

我们上车后，没看见自己的行李，也没看见同来的同学，不敢声张，也不敢查问。两人坐在一起看到这般情景，互相注视，心照不宣。不久就有车警先叫我到办公室进行检查审问：

“你是哪里人”？“湖南人”。

“你叫什么名字”？“刘景明”。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职员”。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因到哈尔滨商务印书馆联系业务，就便到国界上来逛逛”。

“你为什么不带行李”？“因不在车上过夜，省得麻烦”。

“那位女的是你什么人”？“姐姐”。

“她叫什么名字”？“刘美明”。

“你们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吧”？“不是的只有姐夫在那里工作”。

问过我又叫琴姐去问，我们是预先准备好了的，所以问答前后相合，没有破绽。车警问过以后，我们暗地商量：到了终点站，我们不急于下车，让别人走了我们再慢慢地下，车警要是跟踪，走到无人处所就给他一点钱，听说他们见钱眼开，就会把我们放走。大约是下午5点多钟达到了哈尔滨车站，我们等人们走后，车站不太拥挤了才慢慢地走下来，车警站在车厢门口，一动不动，望着我们轻松愉快地走了。

当时东三省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地盘。张是亲日本帝

国主义的，他在东三省屠杀了不少的共产党人。凡是从苏联入中国境的华人，都要经过严密检查，才给放行。因我们没带行李，答话又都对径无误，去掉了他们的疑心，才让我们脱离了虎口。这时我们想起了苏联同志关于回答我们问行李的一句话“到时候就会明白的”。原来是不带行李便于蒙蔽车警的眼睛。

我们从哈尔滨乘车到大连，再换乘海船到上海登陆。因是内地的客航，上海关也不检查盘问。我们就一帆风顺的住进了平安大旅社。

次日，就有一位不知姓名，不明身份的高个子工人模样的人引我们搬到法租界萨波赛路的一个亭子间，并吩咐我们各买一络假发梳个巴巴头，买一套旧的女工装，打扮成女工模样进美亚丝织工厂做工。从此，开始了工人生活，并进行地下活动。

这篇回忆在我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算得是半个脚印。末了让我说一句多余的话：

“八四霜秋一梦长， 醒观物演好风光。
燕归海外撩朱幕， 麝过山头草木香。”

徐君虎智斩祸首

谭式文*

1944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当时新宁县县长徐君虎枪杀了恶多端的原县警察中队长罗仲尧等祸首，其经过是这样的：

1944年秋天，日寇围攻衡阳，徐君虎闻讯即抛弃在桂林创办的沙河农场，奔回新宁县三渡江老家。当时，日寇忽然犯境，新宁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顿时狼烟四起，哀鸿遍地。在这外寇寇为患，生灵涂炭的年月，新宁县警察中队长罗仲尧，把警察中队改为抗日游击队，自封为大队长。这些不肖的炎黄子孙，不但不刀枪对敌，反而奸淫掳掠，恣意践踏流离失所的乡亲。县长廖佩之，面对新宁的混乱局面和罗仲尧一伙的胡作非为，已经是黔驴技穷，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全县的乡亲父老纷纷给徐君虎写信，恳请徐君虎乱世出山，率领全县乡亲抵抗外辱，除掉匪患，挽救乡亲，收复河山。全县的知名人士和一些开明绅士也请求徐君虎出来收拾残局。就是县长廖佩之也写信求援，信中谈到，全县的武力已被罗仲尧掌握。罗仲尧时常带兵围困县府，鸣枪示威，勒索粮饷。要收拾新宁的混乱局面，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信中再三请求徐君虎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定帮他挽救新宁的危亡局势，否则，地方会愈弄愈糟，大家会同归于尽。

耳闻目睹乡亲父老、兄弟姐妹的惨景，徐君虎坐卧不宁。

* 谭式文，湖南新宁人，现任新宁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他便给有关人士回信，约他们到武冈、新宁交界的安心观商谈。会上他极力主张县政府主要任务应放在保境安民上，使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建议召开全县各阶层人士会议，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寇侵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尽最大的努力，保卫家园。并提议成立县自卫总队，统管全县兵力，加强军训，严肃军纪，统一指挥。徐君虎的提议，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拥护。

1944年10月10日，新宁县各届人士抗日大会在麻林洞召开。大会一致推举徐君虎统管自卫总队。根据当时政府的规定，自卫总队的正职应由县长兼任，所以，徐君虎只能当副总队长，但全县所有的武力实际上由徐君虎指挥。

徐君虎担任县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以后，随即颁布了八项禁令：一、不准私通敌匪；二、不准作战不力；三、不准造谣惑众；四、不准奸淫良家妇女；五、不准藉端诈索；六、不准私办盐案；七、不准强夺民物；八、不准扰害民众。八项禁令颁布以后，徐君虎还深入各部队晓以大义，教育某些曾经干过坏事的官兵改恶从善，保护乡亲父老，抗击日寇。这样，大多数官兵不敢乱来了。在徐君虎的指挥下，有力地阻击了一些企图骚扰百姓的外寇。

一天，徐君虎路过蒋木山，疏散在这一带的乡亲们围住了他。饥饿褴褛的乡亲们，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告诉徐君虎，罗仲尧的第一中队在中队长李代熠的带领下，昨天晚上把他们被铺、衣服、粮食抢光了。其中有一个脸色腊黄的妇女，抱着一个只见张嘴而听不到哭声的才出生的婴儿，泪珠直滚地向徐君虎诉说，她前天才生下小儿，仅有一床血迹斑斑的破被，昨天，也让他们抢走了。

听此一说，徐君虎的心一阵一阵的发痛。他愤愤地骂道：“这些糊涂虫，还知道不知道国法，知不知道人民的痛苦”。

后来他又听说罗仲尧抢劫了途经新宁的省属军服工厂的女工，不但抢走了公物，连那些妇女身上的衣服都被剥掉抢走。

一天，一位农民专程跑到自卫总队告诉徐君虎，罗仲尧的一个班在尹班长的带领下，在附近的铁甲冲吊打妇女，抢劫东西，追打鸡鸭……。

罗仲尧部队一桩桩一件件危害老百姓的罪行，使徐君虎怒发冲冠。他当机立断，要杀一儆百。于是，他带着警卫人员十里跋涉，赶到罗仲尧部队驻扎地——水庙。

徐君虎找到大队长罗仲尧，把尹班长带兵在铁甲冲打抢的事说了。面对神情严肃的徐君虎，罗仲尧只好对徐说如果真有其事，当然要严肃处理。接着，徐君虎命令罗仲尧马上集合部队。

罗仲尧部队集合在水庙花屋前面禾坪里，徐君虎站在队列前头，朝衣冠不整的部队扫视了一遍，利剑似的目光盯着队列中的尹班长，威严地命令尹带全班人出列。

尹带着全班人出列后，徐君虎命警卫下了全班人的枪。

“兄弟们”！徐君虎声音宏亮：“现在日本强盗侵略我们中国，占领我们的故乡家园，屠杀我们的父老兄妹，抢劫百姓东西，烧毁我们的村庄。可是，就在昨天，尹班长这个民族败类带他的一班人，违犯了我們部队的八项禁令，在铁甲冲一带抢夺民物，危害人民。上次我曾向我的官兵申诫，八条禁令务要彻底执行，倘若有人违犯，不论任何人，我必一本至诚至公之心，格杀无赦。如今，尹班长这一班人弃八项禁令于不顾。现在诸位说说应怎么处理？”

士兵们都说按军法处理。

这时徐君虎命令警卫人员把尹班长捆起来。徐君虎说：“抢劫乡亲们的财物，本应将全班人从严惩处，但我今天不这样做，只杀班长。希望兄弟们吸取血的教训，严守八项禁令。”

说着他发出“枪决”的命令，“砰”的一声，尹班长应声倒地。

杀了尹班长以后，罗仲尧很不自然。他认为徐君虎是冲着他来的，于是决心摆脱徐的指挥。将部队分散驻扎，不打日寇，继续扰乱百姓。

那时，日本强盗把全城的食盐都集中在县城的忠毅祠里。严密封锁，群众为解决盐荒抢夺食盐，冒着生命危险，黑夜偷渡进城，遭到寇军扫射，血水染红了扶夷江水，惨死在日寇的枪弹下。可是，罗仲尧不但不派枪掩护偷运食盐的老百姓，而且拦路抢劫，并大办盐案。

1944年的10月23日，在新宁作恶了40多天的日寇撤离了。新宁古城却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万间房屋被日寇烧毁，县城和城郊村庄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许多妇女被日寇强奸后，又遭杀害，整个县城尸骨遍地。

劫后余生的乡亲父老，目睹家园被毁，亲人被杀，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可是，罗仲尧却大办盐案，把曾到日寇枪林弹雨中夺盐的群众一一抓起来，私设刑堂、监狱。同时，罗仲尧同他的心腹们带兵明抢暗夺，扰乱乡邻，把县城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县长廖佩之辞去了县长之职，携带家室逃回老家去了。

危机四伏的新宁，更加群龙无首了。在这种状况下，省政府电令徐君虎出任县长，兼武（冈）新（宁）城（步）三县自卫区司令。

徐君虎出任县长后清楚地认识到，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必须要严肃法纪，消除匪患。于是，他把全县的武力派往各地，维护地方治安。并张贴布告，禁办盐案，禁止赌博。可是，罗仲尧却同徐君虎对着干。徐派他带兵去堡口一带清剿土匪。罗

仲尧到堡口后，不但不剿匪。反而趁火打劫，搜刮民财，并密令郑大亮、龚孟良、王生才等人住在县城大同旅社，昼伏夜动，四出抢劫。

当徐君虎在百姓的协助下，派兵把在新宁伞家冲关羊抢劫的数名土匪捉押牢里时，罗仲尧急忙撤兵回城，公然率领副大队长李超雄、中队长李代燊、周积如等人带着手枪，到县长办公室威逼徐君虎要立即释放。

徐君虎张贴布告不准办盐案，可是罗仲尧越闹越凶，搞得那些曾参于夺盐的百姓家破人亡。罗仲尧还在距城三里的江口桥公开聚赌。这样目无法纪，包庇匪类，已属罪不容诛。徐君虎所到之处，人们都围着他控诉罗仲尧一伙的血腥暴行。纷纷请求徐君虎把罗仲尧杀掉。上司也来了密件，要把罗仲尧一伙枪决。在这种情况下，徐君虎还想挽救罗仲尧一伙，多次找罗仲尧谈话，晓以大义。但罗仲尧一伙全无悔恶之意，而且不法行为愈来愈凶。罗仲尧、李超庸，李代燊等人时常气势汹汹地闯进县长室，说他们有千多人枪，用了谷子不少，一再逼徐君虎签发千石粮谷。徐君虎不但拒绝签发粮谷，而且严厉地训斥了他们无法无天的行为。并指出了他们一桩桩一件件罪恶行为，劝他们认识时代，革而洗心，悬崖勒马，改过自新。罗仲尧一伙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怀恨在心。多次在红玉仙（罗的姘妇）的房中策划，决定彻底摆脱徐君虎的管辖，把部队拉出去，占山为王，劫夺民财，如果徐君虎再敢出而干涉就把他干掉。

由罗仲尧一伙控制的新宁局面，已经变成了第三期的恶性霉毒，非动大手术不可，不然只会一天天的加深溃烂。徐君虎下定了决心，为全县30万同胞的安全计，决不能姑息养奸了。他毅然决然地采取紧急措施，准备杀掉罗仲尧几个匪首。

徐君虎自从决意遵奉民意和上令把罗仲尧一伙除掉以来，

一连好多天吃不香，睡不下。他深深地感到，要除掉罗仲尧这伙野心不死，好乱成性的土匪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全县的大部分武力都被他们掌握，而图谋不轨，生性多疑的罗仲尧早已注意了徐君虎。他们已经派兵控制了县城后面的至高点摩珂岭，以及江口桥、松风亭等关口要道，整个新宁县城都在他们的火力控制之中，可是徐君虎只有两个班的兵力，如果硬来，那么失败的不是罗仲尧，肯定是他徐君虎。不能硬来，那么就只有智取。

正好，上面派郑家萼到新宁当警察局长。这事点化了徐君虎。徐对郑说：“郑兄，来我们新宁县当官，有个老规矩——“请客！”郑家萼问他请些什么人时，徐君虎便一一说了。并决定于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在中山公园礼堂举行宴会。

当郑家萼发出请客贴子时，罗仲尧也选定了这个机会，在宴会上把徐君虎干掉。于是，急忙调兵遣将。把两个中队开进了县城。由他的得力亲信中队长李代熠带领的一个中队，驻扎在礼堂西边的接引庵，一塘之隔，相距只有20来米远，那里有200来人枪。他的二中队驻扎在刘家公馆，相距只有200来米。驻扎在白马田一带的三中队，也已往县城方向迂回。这都是他以防万一的部署。其实，他俩准备亲自动手，等徐君虎喝酒时，以桌底下开枪，把徐君虎杀掉。

腊月二十四日中午，除了徐君虎外，所请的宾客已全部到达中山公园礼堂。半点钟过去了，徐君虎没有来，又是半点钟过去了还不见徐君虎的影子。罗仲尧叫郑家萼派人去请。去请的回来，说徐君虎不在县政府，出去了。听此一说，罗仲尧吃了一惊，难道是走漏了风声？不，因为他的这个打算，除了他的心腹李超庸，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很不耐烦地提议宴会开始。对头没有来，他也就放怀喝起酒来。酒至半酣，他便摘下手枪，脱掉大衣，挂在墙壁的钉子上。李超庸也照着做了。于

是，便与大家划拳行令起来。

当罗仲尧和李超庸醉意朦胧的时候，只见礼堂大门口飞马似地冲进三个提枪的人来。罗仲尧定神一看，走在中间的是徐君虎，两旁的是徐的卫兵。

徐君虎的突然出现，罗仲尧顿觉来了灭顶之灾，他和李超庸慌忙抛掉酒杯，踢翻桌椅，奔到墙边去抓枪。这时只听徐君虎喝令他的卫兵：“把他俩抓起来！”他的两个如虎似鹰的卫兵飞奔过去，铁钳似的双手，象猫头鹰抓耗子一样，把两个坏蛋抓住了。接着徐君虎命令说：“把这两个祸首拉出去枪毙了！”罗仲尧和李超庸象猪一样地被拖到礼堂外的一棵刺槐树下，一枪一个，两个坏蛋象死狗一样地倒在树下。

驻扎在接引庵的罗仲尧的一中队，听到两声枪响，中队长李代燊端着一支上了弹的冲锋枪，奔到大门口，往响枪的中山礼堂方向张望。正在这时，徐君虎的警卫一班蒋班长带兵赶到，李代燊莫名其妙地问蒋班长：“刚才哪里打枪？”蒋班长随口答道：“枪走火”！话音未落，便一个箭步窜上石阶，随手扳下李代燊手中的冲锋枪口，“哒哒哒……”的一梭子子弹，李代燊象个麻袋似地倒在地上。蒋班长举着冒烟的冲锋枪对庵内骚动的士兵喊着：“兄弟们！罗仲尧和李超庸被徐县长处决了，李代燊也一命呜呼了，你们都被包围了，只有放下武器，改邪归正才是你们的出路！”一中队的全体士兵都缴了枪。

徐君虎的警卫二班包围了罗仲尧的二中队，通过喊话，全都缴了械。一惯为非作歹的副中队长郑大亮，被从女人房里拉了出来，推到南门沙洲上正了法。罗仲尧的第三中队官兵，听说罗仲尧已死，一、二中队缴了械，便主动地放下武器。

半天时间，罗仲尧的部队全部解决了。四个害国殃民的祸首得到了可耻的下场。

五十年前湘西历险记

谭天萍*

1937年11月26日，张治中接替何键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上任伊始，他待了解地方的真实情况，尤以湘西匪患，以其地邻川、黔东部，乃西通战时首都重庆的咽喉要道，匪患不仅使交通梗阻，人民亦难安生。眼看春耕在即，若有延误，未来的乱子更大，颇为焦灼。适我自南京逃难回长沙，任《力报》采访主任，且在南京就认识张治中，故我去省府采访，非常方便，且与发布新闻、主管宣传的公报股长王次青、交际处长童位纲都是朋友，几乎每天必去采访。

有天在交际处突然碰到张主席，问我对湘西熟不熟？想要我去了解那些地方的真实情况，在报纸上反映政治情况和民间疾苦供省府参考。说实话，我祖籍是湘乡，却出生于湖北武穴，受业于汉口的宁波商人，工作自学于南京。回长沙后，举目无亲，靠在南京认识的友人才能滥竽于长沙《力报》，对湘西一无所知，只听说那里遍地土匪。以为张主席只不过偶然问我而已，想不到公报股长王次青却找我认真研讨，如何实施主席的愿望。当时我仅23岁，血气方刚，有一种争强好胜之心，对别人不敢涉足的湘西地区，倒想探险深入，观其究竟。乃与王商定：路费由《国民日报》、《大公报》、《力报》各支稿费40元，通讯稿《湘西之行》三报同时发表，路线和注意事

* 谭天萍，在长沙任《力报》采访主任时，曾赴湘西采访。

项，请素有“湘西王”之称的省府委员陈渠珍指导。

当时，陈渠珍住在长沙麻园岭。赴湘西前，我专程拜访了他。他听我叙明来意后，鼓励我说：“湘西民风犷悍，但慷慨好义，你肯冒险深入那里，报道民间疾苦，为民请命，湘西人感犹不尽，何致加害，可请放心。”至于行程他建议自沅陵开始，经辰溪、麻阳、凤凰、乾城、永绥、保靖、永顺之王村、古丈等9个县，并具函介绍各地旧部，给我照顾协助。

1938年元宵节日，我到了沅陵，得主笔王音彦（小说家）介绍，住在沈从文先生的傍山别墅《云庐》。

沅陵（古称辰州）是沅水上游的大码头，商贾云集，地方稳定。长篇通讯《湘西之行》从此开始，只记了征兵中的三件惨事；地方保甲鱼肉人民，逼民上山为匪；教育不发达等情况。

乘车到辰溪，向站长打听去麻阳的路线。他说：“此去麻阳160里，没有公路，全靠步行，沿途匪部，吕家坪有欧少华、高村有张杰坤、岩门有刑粤、谭家寨有谭汉卿等四股。官员来往得有一连保安团兵护送，象你文质彬彬，会寸步难行。”又问我是不是五湖四海或蓝衣社的，我说都不是的。他说：“你毫无凭藉，又怎能和土匪讲黑话打招呼，硬闯龙潭虎穴，就怕有理讲不清，性命难保。”劝我快回长沙，一瓢冷水泼得我凉了半截。凭陈渠珍的介绍信找到县中学的向校长，除了供食宿外，也无护送办法。不得已找县长，想不到他见了我大吃一惊，说：“你先生真冒失，土匪窝是你闯得的！要是你被杀害，省府追究责任，我乌纱难保，罢、罢、罢，你要资料，开一提纲我组织人写。回长沙的路费我给，只求你莫替我添麻烦。”其惶恐的神色，令人好笑。又访问了许多机关厂矿，异口同声劝我不可自寻死路。这真叫人煞费踌躇，寝食难安，想来只要能打通第一道关，以后定能迎刃而解。突然想到乡邮，据邮局

梁局长说，乡邮身穿标有《邮政》两个大字的背心，背着绿色邮袋，分由麻阳、辰溪出发，在中途会面，交换邮袋后，次日各回本县，除了正在枪战，从不侵犯他们。我在邮局写信托乡邮带给吕家坪的欧少华，说明我的身份、任务，准随下一班乡邮来见他。隔天乡邮回来说：“欧司令欢迎你老人家。”次早便随乡邮出发，沿途人烟稀少，走了5里才遇一愁眉苦脸的行人，行45里近吕家坪，见许多人携儿带女，担着衣被惊慌地迎面而来，说昨夜打了一夜仗。再走一段，见路边不少被击毙的尸体，许多房屋被烧毁，又见一号哭着的老人，诉说耕牛被匪抢走了，怎么活呵！那一种凄惨，铁石人也会落泪。过吕家坪会见麻阳来的乡邮，心上才较安定。他说欧少华已退过了河，不必找他了。再走几里，见对河有一群人奔逃。到腰村已步行了75里，乡邮找一小店住下，我已疲累得晚饭也懒得吃，在油灯下写了《湘西之行》（四），托辰溪乡邮发回报社。早饭后，步行20里到高村，是一较大的市镇，现在残垣破壁，关门闭户，衰败不堪，一群新收编的土匪，身着便衣，背着比他身体还长的步枪，用一种孩子气的神色望着我。在邮柜上一坐，就围上一些人，听说我是省里来的新闻记者，纷纷诉苦，说土匪掳去耕牛上千条，壮男妇女无数，春耕无牛也无劳力，怎么得了！我又专访了新收编的大队长张杰坤、张应明，他们头戴爪皮小帽，身着棉长袍，象一个小商人，令人难于相信，他曾占山为王，杀人越货。他说：“前方抗战，我们在后方捣乱，惭愧呀，惭愧！”似乎也不像一个全无心肝的人。

再行15里到岩门，寻见刑粤。过谭家寨见到谭汉卿，谈来他们也在叹惜：“我们湘西人民真苦！”步行两天，连闯四关，走进麻阳县政府，全惊呆了，再三打听我是怎么闯过4个匪窝的？

下一站是凤凰，原有一条大路，只70里，且有一连护送县

长来县的保安团官兵回防，同他们走安全多了。早听说新收编的龙杰驻在石羊哨，此人颇有家产，还是长沙兑泽中学的学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获得游泳奖牌，是一个很值得访问的人。仍与乡邮同行，倒回走到谭家寨，又见许多人民向县城逃奔。行至岩门与乡邮分手，只好找荆粤派人带路，我看此人面目凶横，令人生畏，但他沿途照顾却很周到。在一小镇上歇脚，散匪中有人想抢夺我穿的夹大衣，只见他横眉怒目，大喝一声，恶语相向，大有与之拼一死活之势，匪徒竟纷纷逃走。到达龙部天将傍晚，又饿又累，疲惫不堪。龙家大嫂听护送人介绍后，打热水给我烫脚，又忙着弄饭菜招待。龙杰回来，我看他言谈举止都极文雅，谈到他落草原因是拖枪保家，保地方。还对凤、麻两县情况作了分析，说只要春耕不误，人民有饭吃，乱子不会太大。次日派一年轻人牵来一匹马，送我去凤凰县。走约20多里，望见了城楼，他说城门是保安团的防地，不便送我进城，抱拳向我告别。我看他那憨厚的雅态，深有感触，若在太平年月，该是多么好的农民，如今成了见不得官兵的匪徒。匪患闹的“老无所养，壮无所归”，能不令人痛心！

凤凰县长谭巨涛，原是中学教员，后参加考试，才取得县长一职，因之有别于一般的官僚。他详细介绍了屯田的起因与造成今日匪患的猖獗，慨叹着不改革弊政，何能解决匪患，光靠招抚岂是办法。又对汉苗之间的隔阂，有所陈述，再三劝阻我莫去总兵营访苗王龙云飞，怕言语不通，易生误会，并深愧他无力护送。

龙云飞，苗族人，少年从军，1914年任巡访排长，1924年升为游击团长，1928年任七县屯田指挥，近又招抚为旅长。有人称之为苗王，或称为苗族军阀，住在总兵营，距县城45里。通过私人找到一位会讲苗语的向导，又借到一匹马，向步步高

的苗族聚居山地前进。出城八里过长宜哨，见许多背负婴儿的苗妇在田地上辛勤耕耘。到千弓坪又有成群的妇孺背着行李迎面而来，向导说是苗族军官的眷属随军移防。果然有大队苗兵随之而来，都只十七岁上下，队伍并不整齐，而尾声拖得很长的歌声、前唱后和，极为动听，使人忘倦。最后有一军服整洁的军官骑在马上，见了我滚鞍下马来招呼，说他是龙云飞的儿子龙恩溥，奉命驻守长宜哨，保护人民春耕。又说他已看过我写的《湘西之行》，知大驾不日光临，表示欢迎。

走到总兵营，有两位老人在村口迎接。见到龙云飞竟是鬓发斑白的矮胖老人，身着学生装，颇似一村老学究。亲自为我布置住处，并派一满姓老人陪我，他是麻阳兰里人，能讲苗话。承他陪我访问了龙部高级军官，听到攻打乾城的经过。又遍访附近苗乡村寨，观看了文艺表演打猴儿鼓。又参观了已停采的汞矿，停留了10天，成天忙于与苗胞接触，识其风俗习惯人情性格。感到他们天性淳朴，若能受到良好教育，都会是有用之材。更觉奇怪的是龙云飞每天必读“论语”，体会到孔子学说之伟大。

临别宴会后，他送来程仪一份，即大洋百元。我说新闻工作者，只能讲真实的话，可能歌颂你，也可能批评你。得了你一文钱，笔尖就不硬，写不出正确而真实的文章，因之盛情仅能心领。他见我谢绝，好不惊异地说：“省方来人，总只嫌钱给少了。有钱不要，前所未见！”

从总兵营骑马到乾城，休息了两天，走到所里，即今之吉首。那里地势较平，风景秀丽，且是商埠，文化教育也有规模，又是入川大路，正有成批的军校学生西进，顿使边城热闹起来。

到永绥（花垣）访问吴恒良。这是历来苗民起义首难之地，受害也最酷烈，农民无自有田地，却耕耘不息。往往有人

奋起，就会有成千的人附从。吴已收编为团长，他说：“我能白手拖出上千人的队伍，并非生有三头六臂，全由政府腐败，警察、保安团队保民不足，害民有余，欺压得人民忍无可忍，振臂一呼从者如云。乃至已成气候，就能越裹越大。人民支援我们却极恨官兵，尤其保甲长将许多年轻人逼上梁山。”

保靖的姜县长，披了件棉大衣，经常跑下乡和农民扯谈，有些小纠纷，他总就地解决，并不理睬豪绅大户。我在县城访问，士绅干部，都骂他是神经病，只老百姓称赞他不摆官架子。那个时代的是非倒置一至如此！临走他也未能免俗，派人送来程仪，也被我谢绝。

自保靖乘木船到永顺之王村，这是酉水（又名北河）中的大码头，繁盛过于县城。整个市镇建筑在大斜坡上，10米以上的平地也少，看来上层屋基就压在下层屋的檐上，我住在坡下杨姓小店里。占据此地的熊孝卿，临河设卡，拦路征税。他听知我到王村，派人邀我赴宴。我见他年近60，留八字胡，吸鸦片烟，房子设备简单，却有一浓装艳抹的女人和几笼黄雀。他说：“我保护了水上交通，使货畅其流，何患财源不盛，怎么能说我是土匪？”谈到我要去古丈，他说古丈太穷，边棚（散匪）太多，招呼不了，前几天罗衣溪赶场，竟遭洗劫。劝我千万不能去。

为了去古丈，我找区长用电话与古丈的警察巡官唐纯卿联系，回说地方不靖，要一路小心，许多好心人都劝阻莫去冒险。店主老夫妇说：你太文弱了怎么去得。后见坚决明天走，又劝我留下一切东西，空手出门，土匪看你无什油水，可能会饶了你的。我都依了，睡后老人又摸着将一双新草鞋塞在枕头边，盛情令人感激。次晨天犹未明，乡邮老罗来邀，先乘木船下行15里至罗衣溪登岸，为了少涉六道溪水，老罗带我走弯路，在涉其余三道水时，水流湍急，潺潺之声有如雷鸣，水寒刺

骨，石面苔滑，全赖老罗扶持。本地人即妇女亦毫不在意地涉水而过。走到地名杀人坳时，忽闻山头有响亮的口哨声。我还是自由自在地前进，老罗却紧张了，频频示意我注意。走了好几里，老罗才告知我，我们碰到散匪，可能是看你甩着空手，又衣着整齐，态度从容，以为你的来头不小，才敢单身闯关，吹口哨是令匪们闪开大路，这才如梦初醒。到了古丈县城，只一条街，25户人家，有人正在建水栅栏为防御工事，就迳投唐巡官家。此君健谈，见面就伸大拇指夸我好胆量。老罗讲了杀人坳的经过，他又说老弟洪福齐天，真不简单。谈到匪患，他说拖队伍也绝非容易事，一要有枪有弹，二要有粮食下锅，三五十人跟你去打家劫舍，没吃的谁跟你去卖命。能具此条件的，就只有土豪劣绅，他们先是为了保产，成了气候，招安就能做官，不根除他们又何能剿匪。他又长于打猎，餐餐有野味待客。县长则为一庸人，遇事离不开唐巡官。

回程仍与乡邻老罗同行。这次循大道面行，以免再遇上散匪，得涉几道溪。在过最宽的一条溪时，路遇一妇女问我是不是前几天走过杀人坳的先生，老罗说正是。她说你们走过后，她们三个女伴被擄，正惶急中有一女伴的堂哥正在匪中，才放了她们。她说你先生真大胆，并自告奋勇愿意背我过溪。我开玩笑说，那有个男子汉靠女娃背过溪的理，最终还是老罗和她挟持我涉水过了溪，我一双脚已被凉水浸的变色发麻，坐在石块上按摩了许久，才恢复了知觉。

回到王村，始知省政府已成立了沅陵行署，由陈渠珍兼任主任。

湘西之行，行程上千里，历时45天，结识了9个县的汉苗各路英雄。由于报纸大力呼吁，行署成立后，发放了100万元耕牛贷款，应了春耕之急。

回忆我的右派生涯

周守忠*

历史的长河，如烟云流逝。时间久了，过去许多事情，我都记不太清。我想，如果再过10年、20年，要我再写这类回忆性的文字，那就相当困难的了。

一、打入另册

1957年，我刚26岁，在湖南省文化局（现为文化厅）办公室当秘书。当年，我风华正茂，喜欢骀扬文字，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工作也十分认真负责，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厚爱，但谁也料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便成了右派，成了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1957年4月30日新华社公布了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从此，一个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逐渐在全国省、市开展起来。记得从5月8日起，中共中央统战部即邀请主要的党外政治活动家和知识分子在北京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党的批评。接着，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在各类组织的主持下也举行了类似的座谈会，我们湖南也不例外。当年整风分放、反、改、学四个阶段进行。放——就是大鸣大放；反——就是反击右派；改——就是整改；学——就是学马克思列

*周守忠，望城县人，当年在湖南省文化局（厅）工作，被错划为右派。

宁主义。在鸣放阶段中，中央规定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丑类（见当年《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还有一个党内文件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当年，我们局里的主要负责人就曾一再严格规定此事不能走露风声，不能让一般党员、团员更不能让党外人士知道，否则，就无法“放长线，钓大鱼”。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情况下，1957年6月8日，省文化局机关职工代表鸣放大会隆重召开。会上，局领导一再声称：“欢迎党内代表和党外人士多提意见，大胆热情地帮助党组整风，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一定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去接受各位的帮助和批评，坚决做到认真整改，开门整风，立见成效。”代表们见领导态度诚恳，平易近人，以为意见提得，于是大家便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针对局里当时存在的“三个要害”，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三个部分提了出来。会后，领导特意吩咐我加班整理，迅速在黑板上登出。5月13日，题为“严格的要求，热情的帮助——局机关职工代表大会侧记”的两块黑板报跟大家见面了。这时，领导喜气洋洋，不时走到黑板报前来察言观色，收集反馈信息。大约在5月20日左右，在这次职工代表鸣放会上发了言的代表，除个别人外，几乎全被打成右派，就连我这个以工会宣传委员身份列席会议旁听，且轮到我编黑板报的人也囊括其间。大家叫苦不迭，都说自己是

代表群众意见，只谈了一些有名有姓、有数字、有事实的问题，丝毫没有涉及到社会主义。更意想不到的：一是召开职工代表鸣放大会之日，正是党内《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之时；二是谁也不知道在会前早安排了四个记录员专门作详细记录；三是谁也没有料到当了代表就变成上了套钩的鱼。随后，一个当时只有52个编制的局机关，就有10人被划成右派，也就是说，平均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右派。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文曰：“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或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1957年10月，有些地方的反右斗争已基本结束，文化系统大批右派也先后一个一个地被揪了出来。这时，局领导说：“毛主席讲了，右派，性质属敌我矛盾，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党对右派分子是给出路政策的。”于是，在普选人大代表时，我们每个右派都发了《选民证》。每天，基本上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打扫庭院，绿化环境，清理厕所，样样都来。直到1958年3月底、4月初，才正式宣布各人的定性和处分，有的劳教、有的下乡监督劳动、有的留机关监督使用。我因患病，只好要求自谋生活回乡。

二、董 归 故 里

1958年4月8日，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带着一封比包袱更沉重的信件，回到了我阔别多年的家乡——今望城县杨桥乡。一位身穿蓝色干部服装，年约30左右的湛秘书接了信件。湛秘书在未拆信封之前，以为我是下放干部，忙叫请坐请坐。及至拆信看了两行，神色便开始严肃起来，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说：“原来是个老右！想不到我们杨桥这方圆10里还出了你这么个人才。”待他接着往下看时，他那紧锁着的双眉开始放松、平缓，还关心地问我曾经参加过劳动没有，买了

《劳动手册》没有，家里还有何人。问后，他便提笔给永丰大队和田坪生产队写了一信：

永丰大队及田坪生产队：

你队周守忠，原系省文化局干部，因在1957年大鸣大放被划为右派，受到“下乡监督劳动”的处分。现遣回原籍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望你们对他在政治上加以监督，在劳动工分待遇上同工同酬……

我回乡时正值农村大忙季节，满垅遍野都是参加“大跃进”的人们。我因无面见乡邻，只好呆在杨桥舅父家吃过晚饭，才溜回易家冲下罗家湾去。母亲见到了我，两行老泪夺眶而出，她说：“守儿，知子莫若娘，娘知道你生性老实、本份，决不会干出什么邪门歪道的事来。家里弟妹们都相信你，左邻右舍日后也会相信你的。娘年老力衰，经常患病，别无他求，只要你们都在眼前，好好劳动，能混口饭吃，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因怕耽误报到时间，次日一早，我便托五叔把信交给队部。谁知恰恰碰上队部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人人必须参加，当然也包括我这个老右在内。晚上，会场人声嘈杂，大家出出进进，人涌如潮，我悄悄地蹲在会场一角，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大会从头到尾，开了近3个小时，我关心的只是队部对我的“宣判”，可又压根儿没听到任何人提起我的名字，我反而更加惊慌失措起来。好不容易等到将散会时，才听到主持大会的谢裕光书记说：“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大家宣布一下，那就是下罗家湾的周守忠，他原省文化局办公室秘书，因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中有些问题，现在下放到我们这里监督劳动，大家对他在政治上可以进行监督，但在劳动工分上，还是要同工同酬，也就是说，他每天劳动该计8分的，你们不能只给他6分，7分……。会散了，夜深了，我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不知明日此身究竟如何迈出这艰难的一

步。

次日清晨，队长分配我跟妇女们一起上后山黄土坡铲草皮积肥。整整一天，左邻右舍，男女老少，都涌到坡里来看我。他们问长问短，只是不提“右”字。年轻人说：“曾在报刊上读过你的小说和文章，蛮有味道，如今你在家乡再体验一下生活，说不定将来也能当个把作家。”老年说：“在城里当干部不保险、浮动大，又没多少钱，倒不如我们这些靠山吃山的人，生活过得既稳当又扎实。”不少伯妈、婶婶还给我送来了鸡蛋、花生、谷酒，大家鼓励我打起精神，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同年5月18日，我的爱人唐士珉也回到了我的家乡。由于有些群众已经从报纸上得知她是“右派女闯将”，便以为她有三头六臂，是个背上插野鸡毛似的人物，直到进门一看，才知道她也只是一个20多岁、蓄着两条小辫的凡人。士珉能歌善舞，能说会做，又善与人交，很快便成了全体中、青年妇女们的朋友。当年大跃进时，农村讲究出工错把月亮当太阳，收工摸黑进厨房。大家干得十分劳累，趁着工间休息，士珉不是给她们讲故事，就是为她们唱山歌，有的还以镰代笔，就地取材，给他们上起文化课来。因此，队上分配任务，大家总是照顾她干点轻活。后来，她当上了队里的统计和公共食堂的管理员，我则跟着队上的主要劳力一直干着一些除扶犁、掌耙以外的农活，也同样受到广大群众的好评。

1959年，建国10周年国庆前后，公社根据《国务院关于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决定》精神，并结合群众反映，经大队鉴定，公社审查，县统战、公安机关批准，同意给我摘掉右派帽子，取消处分，重新安排工作（但当时并没有执行）。其时，我家老大已经出生，我给孩子取名“天牧”，乳名“扁子”。“扁子”二字，缘于当时农村接生条件太差，婴儿出生时，不慎将头部挤压，孩子后脑半勺不平，故名扁子。

“天牧”二字，则取自诗人闻捷的诗集《天山牧歌》这个被缩短、简化了书名。谁都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了我们飘泊新疆天山南北的预兆。

记得那是1959年11月14日，我正在晒谷石下面水库的堤上打靶，队上的富初哥把我从堤上叫到田边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希望你稳定情绪，经得起考验，不要声张。”我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你老婆昨晚抱着扁子走了，你妈叫你赶快回家！”我顾不上收拾劳动工具和绒衣，径直朝家里跑去。房中只坐着母亲、祖母和五婶三人，她们见我进来，赶紧各自扭干眼泪，齐哄着我说：“小吉带着扁子回醴陵探亲去了，过住几个月就回来……”我无心去听她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即刻朝住房的书桌走去，扯开抽屉，几页信笺、一本帐簿和一叠钞票、粮票，顿时映入我的眼帘。信上写着：

亲爱的舟：

请原谅我，请原谅我不辞而别，而且带着娃娃走了。我知道你是一个只能默默承受生活折磨而经不起这种突然袭击的感情脆弱的人，今日此情此景，很可能使你晕倒过去。然而，我有我的苦衷，我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舟：你可曾记得今年七月中旬我就向你提过有人邀我前往新疆的事吗？当时，你严词指责，折其刳弊，叫我不要盲目离乡。怎料今日上午，大队领导拆看了小易从武汉寄来关于约我一同逃往新疆的信，认为他是大跃进的逃兵，不但破坏了公共食堂化，可能还有经济方面的问题，需要从我这里进行逼供，打开缺口，才能找到线索。听说队上风车、皮带都准备好了，只等晚上10点抓人，我不先逃，哪有活路？

我们的苦命孩儿，我已决定喂饱奶后，把他装入缺了角的皮箱带走，你可放心，无论赴汤蹈火，有我在，就有孩儿在，即使我不在，我会仿效古人托孩，孩儿也会活下来的。

舟：随同此信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些粮票和钱，你可按照账面上的结算数字，如数将钱、粮交给公共食堂，以防有人乘机造谣，说我保管食堂经济手续不清，等等。我14岁参加革命工作，至今一无所有，唯一仅存的只有光明磊落，留得清白在人间。

亲爱的舟：我求您！我求您节哀息怒，擦干眼泪，好好劳

动，好好服侍祖母和母亲！千万要经得起生活中各种艰难和痛苦的考验，千万别生短念！

亲爱的舟：请相信你！我既然有勇气深夜带着孩子逃了出去，我就有办法替您找好工作，把您接了出来！请您耐心等待。

您的被迫出走的珉

1959.11.13夜

士珉出走后，队干们从此也改变了一些对我的看法，我的处境日益艰难，修铁路、疏沙河、建水库、挑石灰、烧木炭离不开我，就是四类分子开会，有时也叫我参加。我自己也弄不清，我头上的右派帽子到底是摘了还是群众拿着？

记得有一次，大队在谢家祠堂开会动员兴修水利，布置生产任务。起先，会场里“敌我不分”，社员们和四类、五类混在一起。易大队长宣布正式开会，四类、五类分子要立即滚出会场，等候民兵连长训话。这下，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怎么办？走与不走？如果跟着四类、五类分子走出会场，那就是说，自己承认自己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掉；如果不走，大厅会场里已经有几十双眼睛在瞪着我，我怎么办！正在这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之际，易大队长发话了，他说：“我知道，场内有不少同志都把眼睛瞪着周守忠，这说明这些同志心明眼亮，立场坚定，觉悟很高，是很可贵的。不过，我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对他已经取消处分，他是社员，也就不再是阶级敌人了。至于为什么没有及时向群众公布的原因，恐怕是因为他的老婆携子外逃，上面认为还有必要再对他考验考验。”

考验时间不久，1960年元旦，我第一次收到士珉从新疆南山牧场寄回的信；春节，我第二次接到她发自南疆色满公社的长函；同年6月，我又收到她从新疆阿克苏地区外贸车队汇回的钱和信，并正式约我起程前赴新疆。

1960年7月13日，我正式告别家乡，乘车西去，于同年7月25日到达新疆阿克苏城。从此，我又开始了我那历尽艰辛、

颠沛流离的生活。

三、风 雪 边 城

阿克苏，翻译成汉语就是白水。它是地委、专署机关所在地，同时驻有农一师生产建设兵团。这里离苏联边境只有百余公里，又名“塞外绿洲。”

1960年8月1日，经阿克苏专署民政科介绍，我到卡坡上参加阿克苏纺织厂的筹建工作。所谓工作，就我来说，实际上就是打杂，如打水井、挖菜窖、盖房屋、托土皮、种蔬菜、喂牲畜、做豆腐、运机器以及搭桥、修路等各种体力劳动。这里，也可以算是一个自流人员的集中营（所谓“自流人员”，即“盲流人员”。当地认为把盲流人员叫做自流人员，似乎客气而好听一点）。当时来自全国10多个省、区的自流人员都云集于此。这些人中，有工人、农民、转业军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青年学生、小商小贩以及个别偷鸡摸狗之流。至于象我这样的政治流犯，还不曾多见，即使见了，也不足为奇，因为新疆在1957、1958年反右斗争时期，全区只划了一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派”究属何种人也，他们不求其详。例如我在进厂后的第三天，便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向党交心，听凭发落。他们见我忠诚老实，又会写几句应用文章，反而顿生怜悯、取用之心，当晚就发急电向长沙县杨桥公社索取我的档案材料。不久，便在一次全厂职工会上宣布我的问题已经查清，可以任用，并随即当上了一班之长，领着一群盲流青年干活。

新疆，气候奇特多变，戈壁滩的气候更加干燥，一望无边，真是一块“黄羊不落脚、马儿不敢走”的神奇土地。我们在卡坡上劳动，人人有任务，个个有定额，而且口粮紧张，工地上经常发生为了一个馒头或半勺子菜汤，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殴打起来的事。自从1961年4月内地开始解散公共食堂以

后，吃饭问题有些好转，但新疆当时的副食品供应仍然较差，同时又缺少文化生活。为了防止闲聊，鼓舞士气和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厂部领导叫我充分利用晚间休息时间，把大家集合在大菜窖内大搞文化娱乐活动。搞什么呢？搞什么我都怕犯忌，只好摆起“龙门阵”来。不到一月，我把什么“武松打虎”、“桃园结义”、“秦琼卖马”以及“水浒”、“红楼”“西厢”都讲完了，只好又结合劳动中的好人好事，自编自演起零陵渔鼓、长沙弹词和山东快书来。

1962年5月2日，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天莉出生。当时，我们工资收入较低，请不起保姆，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的实际困难，于同年7月把我从纺织厂调到地区外贸局缫丝厂任成本核算会计，并兼做秘书工作，经常为厂长，写些报告、总结和大块文章，后来干脆把新闻报道、内外宣传以及编剧作词等文字工作都交我去做。

我爱人原就在缫丝厂担任工会宣传干事、文化教员，并兼做广播室播音员工作。我调进丝厂后，厂长和工会主席，从档案材料中得知我俩原是五十年代的文工团员，搞文艺宣传实属驾轻就熟，于是叫我们夫妻配合，把厂里职工文艺和生产宣传两摊子都包了下来。1964年8月18日，我们的第三个孩子天野出生，一家5口，生活自然更加困难。但我们只要政治上没有压力，心情舒畅，就是再多再苦的任务，我们都能够完成。在此期间，经我俩创作、排练、导演的不少节目，很快轰动阿城，在地、市频频获奖。例如我俩创作演出的《创业歌》、《缫丝工人的手》、《卡斯木、亚克西》，经录音播放后，被选入《阿克苏地区文艺创作专辑》；经我俩精心导演的话剧《年青一代》，歌剧《菊石魂》以及歌舞《花儿与少年》等，在选拔参加职工文艺汇演以后，还被邀请到阿克苏市中心剧场卖票公演。其时，我们外贸系统成了“阿克苏文艺之星”。

1966年5月16日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夫妻自然也在劫难逃。早在砸“三家村”、“四家店”时，就有人写出了一张题为《话剧‘以此为戒’是一株宣扬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的大字报，妄图把我当“小邓拓”抓。为了找点根据，他们煞费苦心，收集了我在湖南和新疆发表的部分作品与评论文章，加上“按语”，张贴在厂部走廊两壁，目的是先从文章入手，导向文如其人，然后将我搞臭。谁知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为在此之前，工人们只听说过我是“爬格子”的，但没有见到这么多纸上印了铅字的东西，现在涌向走廊，她们大都抛开“按语”导向，各看其所需，各读其所爱，尤有一些吃了豹子胆的青年工人，他们还拿出本本，将一些他们认为华丽的词藻、短句抄在上面。这个精心策划的“毒草展览”原计划展出7天，结果张贴不到4天就收摊了。

新疆“文革”时期，主要是以打不打倒王恩茂而分派：要打倒王的是红二司，要保王的是红一、三司。就我们一个小厂来说，那就以打不打倒陈金泰而分派：打倒陈的是红二司，保陈的是红一、三司。我们是“牛鬼蛇神”，是“死老虎”，当然没有资格参加哪个组织。同时，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的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再作处理。可是，造反派为了抢先拿到我们这两颗“炮弹”，去打倒厂里“最大的走资派”陈金泰和局里“最大的走资派”王敏智，他们迫不及待，提前拿我们开刀。

他们还是老办法：先从批判话剧《以此为戒》入手（该剧是由我编导的一个正面反映青年女工思想转变过程的剧本，在排演中就受到工人们的热烈的欢迎），硬逼着陈金泰厂长，要他承认他是批准毒草出笼的罪魁祸首和包庇右派、重用坏人的典型，并连续多次对他逼供。从保护我俩出发，陈厂长铁肩担道义，一手系安危，他俨然确有其事地承认：“剧本是我亲自审

查批准的，演出是我亲自批钱排练的，毒草是我精心培育的，一切后果责任都由我陈金泰一人承担”，他并在一份“认罪”纸上签了名、划了押。在回答为什么要重用右派问题时，他说：“我是当兵出身的粗人，自己没多少文化，所以特别器重有文化有学识的人，包括这两个老右派。也许，是我把他俩捧过头了，现在反而害了他们……”说到这里，陈厂长不禁伤心的哭了。他是一个有泪不轻弹的军人，拭干眼泪，接着又说：“不过我记得毛主席说过重在表现，周总理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即使是对右派分子，我们也要执行给出路的政策，让人家有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噼啪噼啪一阵耳光，陈的脸部红肿，眼镜掉了，室内空气窒人，灯光暗淡，他蹲下身去，两手在地上摸眼镜。

在另一间房里，另一派人正在揪斗出身不好的副厂长陈修身，要他交待技术权威罪行以及利用老乡关系跟“老右”搞了些什么名堂，怎奈此公是个修身严谨，一贯讲究科学论据的人，对于“莫须有”的人和事，他一言不发，因而激怒了那些造反围斗的人，他们用一根铁丝，两端各系一块红砖，挂在陈的后颈脖上，问一声，不回答，便把铁丝向左右移一下，问两声，不回答，便把铁丝移两下，真个活生生的血染罗衫，令人目不忍睹！次日，在地里锄草护苗时，我们都好言安慰着他，可他却十分开脱地说：“就象我们锄草，哪有不伤苗的，史无前例这么大的革命，哪有不伤人的，群众运动嘛，大家都要正确对待。”

从1966年“5·16”直到1967年10月，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在经过剃光头、戴高帽、游街串院以及假枪毙和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之后，在造反派私设的公堂里，他们借故追问“扁子”这个乳名的来历（他们硬说“扁子”是“变子”的谐音，取名“扁子”意即盼望儿子变天之含义）。我被打得鲜血直

流，妻被打得两次昏死，直到他们浇了凉水，叫来医生，才勉强苏醒过来。天快亮时，我一步一跛地背着士珉回家，三个小孩围着遍体鳞伤、皮开肉绽的妈妈抱头痛哭。其时，我家老大才8岁，老二才5岁，老三才3岁，他们哪里懂得当代“文革”的凄惶……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成为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有能力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记得当《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着《东方红》乐曲，经过新疆高空的时候，我出于好奇心和自豪感，一时忘记了自己当时的身份，竟然情不自禁地也欢呼雀跃地蹦跳起来。不料此一举动，也被人理解为我是“恨得跳起来想把卫星摘下”，当日告到工宣队，幸亏工宣队还实事求是，经过了解，视若罔闻。从此，我更加懂得自己的处境，更加懂得要谨小慎微，严格约束自己。

由于我时刻小心，深怕树叶子掉下来打了脑壳，他们在政治上找不到我半点岔子，又只好在我的小孩身上栽赃。例如有人诬告说我家老大在看电影时，讲过国民党好共产党不好的话；有人捏造讲我家老二、老三在玩游戏时脚踩红太阳。因此，我家老大无缘无故的被几个中小学生给他戴上高帽子，绑着麻绳子，穿街走院，牵着游斗；我家老三、老二被人钉在垃圾堆上不准起来；有一位造反派的女儿两次用砍土钎砸了我家炉灶，我们告到她家，她爸爸还笑着说：“你们两个老右还晓得要吃饭？吃什么饭！活该！”更使我们伤心的是：有一次，孩子们在幼儿园做游戏，一个姓高的女造反派头目别出心裁，她叫两个小朋友扮好人，而叫我家老二、老三当坏蛋，并当场叫大家牵着我的两个孩子游街。我的两个孩子躲着，那两个小朋友也不愿玩，高又心生一计，向大家问道：“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周天莉、周天野的爸爸妈妈是什么人？”小朋友们回

答：“是老右派”。高又问：“老右派是好人，还是坏人？”
回答：“是坏人！”又问：“既然老右派是坏人，那么小右派呢？”回答：“当然是坏人，是很坏很坏的人！”高接着兴高采烈地说：“对，大家回答得很好。现在，我教大家唱一支歌，歌名叫《社会主义好》。为了联系实际，我把歌中个别词句改了一下。下面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

以下摘录的，就是这位大姐当年作了个别修改的歌词：

“……人民江山坐得牢，大右派、小右派想反也反不了。
全国的小朋友大团结，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高大姐这回别出心裁的凌辱，大大地挫伤了我家两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从此，他姐弟俩死活都不去幼儿园了。我们家穷，请不起保姆，只好采取“一根绳子串着三个孩子”的办法，把他们关在院子里，让他们跟着猫儿、狗儿、羊儿一起去玩。我想，在当时，这恐怕就是他们唯一最安全、最自由、最愉悦的天地吧。

1970年6月，新疆大搞疏散城市闲杂人口。当时，我们虽在外贸有10年工龄，绝非城市闲杂人口，但由于我们尚在“牛鬼蛇神”之列，必须提前疏散。因此，我们又于7月30日被扫地出门，下到了阿克苏县托甫鲁克公社五大队二小队，开始了我们人生旅途中又一充满酸、甜、苦、辣的生涯。

我们被安置在小队麦场对面的一个“荒滩”上、面积约70多平方米、一大间在牛棚基地上用土垒起来的房子。围绕着这间土房，小队给我们分了一亩五分荒地和一株古老的桑树。从此，我们就在这些地上种玉米、高粱、烟叶、蔬菜、黄豆以及向日葵等。在那株象降落伞似的老桑树旁边，我们砌了猪栏，搭了羊棚，养了牲猪、绵羊和白兔，作为自谋生活的物质基础。

在此落户的第二天，小队就分给我们40斤玉米，2斤胡麻

油。我们叫老大背着玉米跟随一位维族老乡到离此10多华里的水磨上去磨成玉米面粉。谁知老大一去，直到当晚10点还不见回来。天啦，刚刚定居就丢了孩子，怎么办？去找队长！队长恰阿尼牙孜马上派遣3个民兵，骑上3匹骡马，兵分3路：一路直奔水磨，一路直奔戈壁，一路飞奔河滩。此时，这方圆40余里，到处响起了“汉族巴郎扁子”的呼唤，就是不见老大的身影。我们全家心情沉痛，四人哭做一团。突然，滩外犬吠声声，小小人影移动，啊，是老大回来了！我们的天牧回来了！他，背上背着面袋，右手抱着一只小狗，兴高采烈，气喘嘘嘘地走进门来。原来，他是绕道蚕种农场，那位同路的维族老人特地给了他这只“荒滩卫士”，我们给它取名“克济克以希米利”，也就是我家忠实可靠的守门神。

新疆农村不但气候奇特，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也迥然不同。例如，内地天旱了，人们盼下雨，新疆天旱了，农牧民反而盼天晴，因为新疆长年少雨，全靠天山的雪山灌溉，只有天晴，才能冰化雪消，让雪水浇地灌田。又例如，内地的人干活累了便不想活动，新疆的人累了反而要来个“麦昔若普”（即歌舞晚会之意），以便大家轻松轻松。特别是南疆农村，至今还保留着每年三次萨依勒节（意为游玩节）的传统习俗。如五月间春耕之后举行的玫瑰花萨依勒节，六、七月间举行的果园萨依勒节，八月夏收后举行的甜瓜萨依勒节等。我到小队一月之后，便参观过一次当地社员举办的甜瓜萨依勒节。那天，年轻的维族男女个个穿起自己心爱的衣裳，连老头子、老太太也戴上了崭新的花帽和头巾，各自带着自家好吃的瓜果来到队部聚会。起先，他们学着汉人的击鼓传花，鼓声突停时，碰到哪个就要哪个表演节目，演不出节目的，就由节目主持人记上帐，散会时罚他倒骑着毛驴回家。击鼓传花之后便是集体邀请舞蹈节目，于是，被邀请的出场了，没被邀请的也出场了，整个男

女老少都出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跳起来，那激动人心的音乐和婀娜多姿的舞步，真够妙趣横生。但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自始至终只有两个年轻漂亮的维族姑娘，一直远远地站在篱笆之外，并无一个人邀她入场，后来一问，我才知道原来她俩是巴依（即地主）之女。我曾以为新疆地广人稀，人丁分散，阶级斗争之较弦松，随后，见的多了，我才知道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文革”这么广泛深入……

从1970年7月到1974年7月，我们在托甫鲁克整整生活了4年。在此期间，我干过农活，守过麦场，喂过牛羊，赶过马车，拉过驴车，种过蔬菜，做过泥工，修过电站，然而，每年结算，总是家徒四壁，季子囊空，供不上一家5口，足见当年度日之艰难。

1974年8月，缫丝厂落实错误疏散正式职工的政策，将我们重新收回安排，我们一如既往，干劲倍增，为厂里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多次被评为全厂先进工作者，并在多项竞赛中荣获第一名。

1979年3月，湖南省文化局（厅）和中共衡阳地委根据中央（1978）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精神，决定摘掉我和士珉的右派帽子，推翻一切不实之词，取消一切处分，并收回原单位安排工作。至此，两桩因一篇文章、三条意见而导致被专政了整整21年的错案，才得到彻底改正。至此，也才正式结束了我们漫漫坎坷路上的漂泊生涯。

四、归 去 来 兮

我们在新疆阿克苏生活了19年多。19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于有限的人生却是漫长的。去疆时，我们正值而立之年；回湘来，竟有些发苍苍而视茫茫了。在疆19年，尽管我们历尽艰辛、磨难、凄苦，可是，留在我们记忆中

的却是洁白的雪，激情的风，巍峨的山，清澈的水，纯朴的友情，喷香的奶茶，酸甜的葡萄，以及许多曾经在政治、经济、生活上给予我们热情支持和帮助的同志。至于那些曾经骂过我们，打过我们，甚至百般凌辱过我们的，我们认为，既然事情发生在那样特殊的历史阶段和荒唐年代，又何必怨天尤人？

1979年4月上旬，当我们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湘的时候，局长、厂长对我们说：“过去你们的问题没有澄清，我们想重用又不敢用，稍许用了一下，还差点下不了台。现在，你们的问题澄清了、改正了，我们敢于大胆重用你们，你们也可以尽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至于各种待遇，肯定比内地要强。”不少同事、朋友也劝告我们：“新疆是11类工资区，湖南是4类工资区，你们回去，光工资收入两人就要减少百元以上，你们考虑过没有？”对于领导和群众的关怀与挽留，我们考虑过也掂量过。然而，新疆毕竟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只有湖南才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父母在湖南，事业在湖南，落叶归根，我们必须回去！我们毅然卖掉了全家所有的木器和家具，只留下必要的衣服、书籍和一只小木勺，一把旧铁铤，一把砍砍子。留下小木勺，意在不忘边疆艰苦朴素老传统；留下旧铁铤，意在继承农垦开拓创业风；留下砍砍子，意在披荆斩棘，继续前进。

1979年4月中旬，我们离开丝厂那天，我家的车前屋侧、多浪河边，到处是人，特别是我们曾经工作过的准备车间和机动车间，机器都人为地停止了转动，杏干、果脯、核桃、葡萄干等食物如雨点般的投去车箱。车上，我们全家人笑了，车下，不断挥动着手臂的同志们、朋友们哭了。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人们之于事于物，拥有时未必珍贵，而一旦失掉，便痛感其存在的必须，但后悔已晚，遂抱憾终生。”此亦其是之谓乎？

回湘途中，我们归心似箭，都嫌列车走得太慢，及至车过汨罗高家坊，行至望城境内的尚家田附近时，我们又恨不得将列车钉在杨桥，让我好好地看一看生我养我的家乡，教我育我的母校，以及我曾经付出过艰苦劳动的湖西冲水库、电站和杨桥镇的流沙河，还有那带有传奇色彩的寿字石、黑麋峰、坠石岭。

我们回湘工作后的10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伟大祖国改革开放的10年。10年，我们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全家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政治上，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多次被评为全省、全国组织指导少年儿童读书活动的先进工作者；在事业上，我主持过少儿图书馆的研究辅导工作，当过业务杂志的副主编；我还先后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过剧评、影评、书评、论文、电视小品以及各类体裁的文章近百篇，主要著述和主编的图书有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校图书馆工作》，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喜雨新蕾》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少儿图书馆》、《家庭教育面面观》等。此外，我还有多篇论文，在全省、全国荣获一等奖及优秀成果奖；在生活上我们住上了三室一厅，添置了一些高档家用电器，衣、食、住行，基本上无忧无虑；三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各人有着积极的理想 and 追求。

现在，我们唯一的祈望是：社会不再折腾，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祖国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